

天主教中國本籍神職人員培育史

History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Native Catholic Clergy in China

作者：田英傑神父 (Fr. Sergio Ticozzi, PIME)

前言：湯漢樞機主教

譯者：張維明先生

編輯：林瑞琪博士

香港聖神研究中心 2017年10月

出版：中國香港聖神研究中心
(ISBN): 978-988-16476-7-2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教宗诺森十一世 (1611- 1691)

“你們要知道，當我聽到你們祝聖了一位本土的神父，
比我聽到你們皈依了五千名新教友，更使我欣慰。”

目錄

前言

第一部分 1583 - 1845: 中國神職人員起步艱難

- 第 1 章 正式指令與實際障礙
- 第 2 章 本土神職人員的陶成類型
- 第 3 章 建立修道院

附錄

- 1. 中國神職人員的人數
- 2. 中國神職人員的陶成類型
- 3. 中國神職人員的角色和作用
- 4. 中國神職人員的素質

第二部分 中國神職人員陶成計劃的發展

- 第 4 章 綜述
- 第 5 章 1845 - 1900: 本土修道院數量的增加
- 第 6 章 1900 - 1930: “聯合修院”的興起
- 第 7 章 1930 - 1945: “總修院”的發展
- 第 8 章 1946 - 1976: 在共產黨當局下的狀況

第三部分 1978 年後中國天主教修道院的復興

- 第 9 章 地下修院
- 第 10 章 公開修院
- 第 11 章 修道院的現狀 (2011 年至 2015)

前言

田英傑神父詳細記述了中國本土神職人員的培育歷史。由于他對這一課題的濃厚興趣，源於 2007 年他對在香港和中國內地的本土神職人員的歷史的研究。回顧教會兩千年的歷史，田神父在他的第一章中就指出，教會一直有陶成本地神職人員的歷史。例如，聖保祿宗徒在地中海沿岸的許多城市福傳後，總是任命一些當地的長老，如弟茂德和弟鐸這樣的長老，來監管他所親手建立的社區。1622 年，羅馬教廷成立了傳信部 (SCPF)，在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後，傳信部更名為萬民福音傳播部 (The Congregation for the Evangelization of Peoples, CEP)。

正如田神父所指出，在傳信部成立早期的領導層就一直在推動建立當地神職人員的隊伍。然而，在中國的情況是，羅馬教廷面臨諸多問題，其中包括本土的神職人員候選人缺乏拉丁文知識，以及外國傳教士對此持有不知變通的心態。

例如，田神父記錄了中國第一位神父和主教羅文藻（他西班牙文的名字 Gregorio Lopez）在通往神父和主教職位的道路上所經歷的艱難困苦。羅文藻主教于 1616 年生于福建省，1634 年，他受方濟會傳教士李安當神父 (Antonio de Santa Maria Caballero, 1602 - 1669) 講道的感化而領洗奉教。然後他幫助李安當神父傳教，成為一名教理講授員。經過反覆的請求，羅文藻终于在 1650 年加入了道明(多明我)會。在馬尼拉學習之後，馬尼拉大主教卡薩索拉 (Michael Casasola, 1602 - 1667) 于 1654 年將他祝聖為神父。羅文藻神父當時不僅在福建，而且在中國的許多其它地方去傳教。1674 年 1 月 4 日，羅馬教廷任命羅文藻神父為南京的宗座代牧，以及直隸、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和朝解的宗座署理。然而，道明會的長上反對這項任命。最後，1685 年 4 月 8 日，意大利方濟會伊大任主教 (Bernadino della Chiesa) 在廣州將羅文藻神父祝聖為主教。

後來，中國教會不得不又等了 241 年，才终于等到下一批中國本土主教的祝聖。1926 年，在羅馬，六位中國本土的主教由教宗庇護十一世祝聖。教宗本篤十五世于 1919 年發布的“夫至大”宗座牧函 (Maximum Illud)，以及剛恒毅總主教 (Celso Constantini) 被任命為中國宗座代表 (1922 年至 1933 年在位)，都極大地推動了中國本土神職人員的發展。田英傑神父忠實地記錄了中國本土神職人員在那些動盪歲月中的陶成和發展，並將這段歷史一直寫到了當代。他做了辛苦而卓越的工作，我們應該向他表示祝賀。他的著作是對中國天主教歷史的巨大貢獻，在此，我衷心地向大家推薦此書。

湯漢樞機

2017 年 8 月 15 日

第一部分 1583 - 1845:

中國神職人員起步艱難



羅馬：宗座傳信部總部大樓

第 1 章

正式指令與實際障礙

1. 1. 宗座對中國本土神職人員的持續支持

早期教會在巴勒斯坦的傳教活動是基于耶穌的命令：“你們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物宣傳福音”（谷 16：15）。因此，宗徒們便离开了他們的祖國，把他們的新信仰帶到其它國家和文化中去。伯多祿和保祿离开巴勒斯坦，來到羅馬，在那里傳福音。其他的宗徒和他們的門徒為了同樣的目的去了其它几个國家。在接下來的几个世紀里，許多傳教士們也采取了同樣的做法：意大利本篤會神父奧斯定（Augustine）成為了英格蘭的使徒；來自加肋多尼亞（Caledonia）的巴特利爵（Patrick）前往愛爾蘭傳教；來自英格蘭的波尼法爵（Boniface）將福音傳播到了德國。在第一個千年，教會鼓勵本篤會的神職人員在歐洲國家進行傳教工作，後來，方濟各會和道明會的會士們到中東和亞洲去傳教。在 14 和 15 世紀，隨着地理的新發現，教宗們甚至要求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國王們，支持傳教士們和他們的傳教事業，給予他們在這方面的一些優待（Padroado，保教權）。¹

然而，教會始終意識到，外國傳教士的工作只是第一個階段。這是在建立一個擁有本土神職人員和機構的地方教會之前的基本需要。教宗庇護十一世在宗座信函 **Ab Ipsis Pontificatus Primordiis (1926 年 6 月 15 日)**，² 中明確指出了這一目標：“沒有人否認，福音的第一粒種子總是由外國傳教士播下的……我們問你，除了在這些國家建立穩固的基督的教會外，傳教士的目標是什麼？今天，在外教人的土地上，除了要有本土的神職人員和教眾以及修會人士之外，還應該包含什麼呢？”

這種意識是羅馬教廷所遵循的一貫原則，也是促進當地陶成神職人員的重要原因。

1622 年，教宗國瑞十五世（Gregory XV, 1554 - 1623, 自 1621 年在位）在羅馬建立了傳信部（SCPF），其目的是負責全世界的福傳工作。多年以後，于 1626 年 9 月 11 日，傳信部給當時在澳門的日本主教寫了一封信，敦促他把所有他認

¹ 欲知詳情，請參閱 Sergio Ticozzi (田英杰) 所著：“Ending Civil Patronage: The Beginning of a new Era for the Catholic Church in China, 1926” (終結政府保教權：1926 年中國天主教新時代的開始)，in 朱益宜 (Cindy Y.Y. Chu) 主編的 *Catholicism in China, 1900 - Presen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第 87 - 104 頁。

² 參閱拉丁文本 *Acta Apostolicae Sedis*, 1926, 第 303 - 307 頁。

為必要和合适的日本神職人員候选人都祝聖為神父。几年後，1630年11月28日，傳信部也向印度的主教們重復了同樣的劝誡。

关于祝聖印度本土神職人員的條款，我們同意應把印度人中最有能力的人們晉升為聖職，包括司鐸職；在經過認真和嚴格的教導之後，並在他們為基督教服務的一些年中，對他們的行為和虔誠進行檢驗。做出這一決定的原因如下：1) 因為從聖經和教會的歷史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早期教會各地的宗徒和主教們都遵循了這種方式；2) 本土的人士更能得到他們同胞的信任；3) 他們更熟悉本國同胞的語言、風俗習慣和愛好：正如葡萄牙的一位官員所寫的那樣，一個優秀的印度人所做的工作，要勝過一百多個歐洲人的工作。³

羅馬教廷不僅闡明，要把陶成本土神職人員作為基本原則，而且也付諸實踐。在1637年11月14日，羅馬任命印度的上層人士 Matthew de Castro Malo 為教牧（在1637年11月30日被祝聖為主教，?-1677），作為印度德干的宗座代牧。

羅馬教廷不斷鼓勵任命本土神職人員，然而，在與遠東國家打交道時，特別是在中華帝國，由於其特殊的政治和宗教背景，教會遇到了嚴重的困難和障礙。

1.2. 中國的政治和宗教背景（1552 - 1845）

1552年至1845年這三個世紀，對中國天主教來說，是一個相當漫長而艱難的時期。在此期間，教會取得了一些成功，但這是在教會內部的爭議和外部迫害的背景下取得的。迫害是在利瑪竇神父（1552 - 1610）去世後不久開始的。1616年5月，在中國官方的公告發起了一場反對教會的運動。結果，一些耶穌會士被迫離開北京，其他一些人則躲藏起來，許多皈依天主教的人被逮捕和受迫害。

不久之後政治形勢也變得令人失望。1644年，中國落入滿族征服者之手，他們建立了滿清王朝。

1644年9月，楊光先（1597 - 1669）發動和領導了第二波對基督徒的迫害。然而，幸運的是，1666年，年輕的康熙皇帝（1654 - 1722，從1662年起在位執政）他顯示出自己是天主教傳教士的伟大保護者。但是，此時“禮儀之爭”也達到了高潮，給教會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這是中國天主教歷史上使人刻骨銘心的一頁。這場爭論從17世紀中葉一直持續到18世紀初。它正式起始於1643年，當時道明會和方濟各會的神父們對耶穌會寬容對待中國敬孔和祭祖禮儀的做法，表示反對。耶穌會士認為這些僅僅是民間儀式。這個問題最終呈上羅馬教廷。1645年，傳信部頒布法令，宣布這些敬孔祭祖儀式為宗教禮儀，禁止天主教徒進行。然而，耶穌會士捍衛了他們的立場。1656年，傳信部確認，

³ 參閱 Celso COSTANTINI (剛恒毅), *Riccheche d' Archivio sull' Istruzione 'De Clero indigena'* (Roma: Edizioni 'Storia e letteratura', 1947), 第15頁。Pasquale D'ELIA, *Catholic Native Episcopacy* (天主教本土主教職) Shanghai, 土山灣出版社, 1927), 第8頁。

祭孔祭祖更多的是民间仪式，而不是宗教礼仪。1692年，康熙皇帝颁布了一项宽容的法令，允许天主教會自由地傳教及使人們皈依基督。然而，反對耶穌會寬容中國礼仪持的立場仍然存在。1704年11月20日，經教宗克勉十一世（Clement XI, 1649 - 1721, 自1700年在位）批准，教廷頒布法令，重申1645年對中國敬孔祭祖礼仪的譴責。教宗特使多羅（Charles Maillard de Tournon, 1668 - 1710）被派往中國。他于1705年12月到达北京。他受到康熙皇帝的召見，但他沒有向康熙皇帝透露1704年聖職部頒布的法令內容。

耶穌會士請求皇帝發表意見。1706年12月，康熙頒布了一項敕令，規定只有那些發誓接受耶穌會觀點的傳教士，才能繼續留在中華帝國。他們必須提出申請，以獲得帝國的准許，才能留在中國。作為對皇帝敕令的回應，多羅于1707年在南京，公布了1704年的傳信部的決定。康熙皇帝聞之，勃然大怒，隨即驅逐了多羅。多羅先去了廣州，然後到了澳門，在那里他被葡萄牙人俘虜，直到1710年去世。四位主教和許多神父遞交了申請書，並獲得了在華停留的帝國許可證。

1710年，教宗克勉十一世頒布法令，重申他1704年的決定和教宗特使多羅1707年的指示。在1715年，教宗印發了「自登極之日」宗座憲章 *Ex Illa Die*，再次重申了1704年的法令，並禁止進一步討論這個問題。1716年，該宗座憲章終於在北京出版，但康熙皇帝下令收回所有這些出版物，全部送回羅馬，並對基督徒發起了新一波的限制。當時，羅馬聖職部和北京的朝廷已經走到如此極端的地步，以至於，即使新的教皇特使嘉樂（Carlo Ambrogio Mezzabarba, 1685 - 1741）的政策更加溫和，也無法再消除這些誤解。1721年，特使向所有傳教士發出了一封牧函，重申了1715年的法令，但允許教友舉行八種特定的礼仪。特使嘉樂意識到，進一步試圖和解仍是徒勞的。於是，他于1721年3月3日離開北京，經澳門坐輪船返回歐洲。

1724年，康熙的兒子雍正繼承皇位（1678 - 1745 自1722年起在位），他禁止了教會的傳教活動，並下令除在朝廷任職的耶穌會士外，把所有在北京工作的傳教士都驅逐到澳門。本地的神父們被迫在還俗和接受懲罰之間做出選擇。雍正對基督徒進行了嚴厲的迫害。又在1736年頒布了更多反對基督徒的法令。1742年，教皇本篤十四世（Benedict XIV, 1675 - 1758, 自1740年起在位）頒布了「自從上主聖意」*Ex Quo Singulari* 法令，重申了1715年的決定，並廢除了嘉樂所授予的八項許可，並要求所有的傳教士宣誓放棄中國的敬孔祭祖礼仪。1784年和1785年清朝又頒布了全面的迫害令。然而，傳教士們，尤其是中國的神職人員，都盡其所能在地下從事使徒工作，但他們時刻面臨着苦難、監禁，甚至殉道致命。

1.3. 教會的各個修會及其傳教工作（1552 - 1845）⁴

⁴ 叙利亞東方教會（所謂的景教，*Nestorian*，7 - 15世紀）和方濟各會（13 - 15世紀）在中國的活动沒有考慮在內，因為他們對陶成中國本土神職人員究竟做了些什麼，這仍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然而，眾所周知，孟高維諾大主教（*John of Monte Corvino*）為了詠唱日課經，他先用拉丁文和希臘語訓練了40名蒙古青年，後來又訓練了150名，他並且把新約和聖詠翻譯成了蒙古語。

1552年，聖方濟各沙勿略 (St. Francis Xavier, 1506 - 1552) 病故于 (廣東省南面的) 上川島。他曾试图进入中國大陸傳教，但未成功。到1583年為止，大約有50位傳教士，包括耶穌會會士、道明會會士、方濟各會會士和思定會會士，都曾试图进入中國大陸，並希望在中華帝國定居，但均告失敗。

1565年，耶穌會會士在澳門建立了他們的第一个住所，1576年1月，澳門成爲一个教區，轄區兼及中國和日本。1578年，耶穌會神父范礼安 (Alessandro Valignano, 1538 - 1606) 于1573年被任命爲東印度群島 (包括日本和中國) 的耶穌會宗座觀察員，他前往日本途中，在澳門逗留了十个月。在此期间，他爲中國的福音傳播設計了一种“適應方法或融會貫通的方法”，(‘accommodation approach’) 其基础是學好漢語，適應當地的風俗習慣和文化心态。為了實施這一計劃，他要求羅明堅神父 (Michele Ruggieri, 1543 - 1607) 和利瑪竇神父 (Matteo Ricci, 1552 - 1610) 从印度來到中國。1583年9月10日，羅明堅和利瑪竇神父終於能在廣東的肇慶定居，天主教从而就开始持久存在于中國。與此同時，在1579年，方濟各會的修士們也在澳門開設了他們的第一个會院；1586年奧斯定會修士也在當地設立修女院。

1632年1月1日，道明會首位神父高奇 (Angelo Cocchi, 1597 - 1633) 來到福建，在福安建立了第一个傳教團；1633年，隨後而來的是另一位道明會會士黎玉範 (Juan Bautista de Morales, 1597 - 1664) 和首位方濟各會修士李安當 (Antonio de Santa Maria Caballero, 1602 - 1669)。1643年，如前所述，他們正式發起了“中國礼仪之爭”。

1680年，奧斯定會的神父，白萬乐 (Alvaro Benavente, 1646 - 1709) 从菲律賓抵達中國，並在江西省贛州建立了奧斯定會的第一所會院。1698年10月，他被任命爲主教 (1700年3月30日祝聖)，成爲新成立的江西教區的主教。後來，奧斯定會的會士們被迫撤出中國。然而，葡萄牙的奧斯定會會士們从1586年到1712年一直留在澳門。

1684年1月，巴黎外方傳教會的首批兩位成員：即陸方濟主教 (François Pallu, 1626 - 1684, 稍後我們還會更多地談到他)，他被任命爲中國的宗座署理和福建省的宗座代牧，他和顏當神父 (Charles Maigrot, 1652 - 1730) 一起，到达了中國的目的地。

1699年，最早的兩位遣使會 (或稱‘味增爵會’) 會士穆天尺 (Johannes Müller, 1673 - 1742) 和畢天祥 (Luigi Antonio Appiani, 1633 - 1732) 1702年來到廣州，後來他們开始在四川重慶工作。1711年，另一位遣使會會士德里格神父 (Teodorico Pedrini, 1671 - 1746) 來到北京，他在那里担任朝廷的音乐师。

由于葡萄牙1759年颁布法令，在葡萄牙管辖的所有领域，禁止耶穌會工作。1762年，澳門的24名耶穌會士被驅逐出澳門。1773年7月21日，教宗克勉十四世 (Clement XIV, 1705 - 1774, 自1769年起在位) 彻底废除了耶穌會。因此，所有的耶穌會會士离开了中國，或者躲藏起來。只有少數耶穌會神父能繼續留在

滿清朝廷內工作。1784年，葡萄牙正式邀請遣使會傳教士們到澳門，接管那里耶穌會士的全部工作。後來，1788年，在遣使會士們到達北京後，他們便接管了耶穌會在中國的所有的職位。

直到1842年7月，首批三位耶穌會士才回到上海。他們來自法國。

總結一下，從1583年到1845年，曾在中國工作的天主教修會有六個，即：耶穌會（SJ）、道明會（OP）、方濟各會（OFM）、巴黎外方傳教會（MEP）、遣使會（CM），和奧思定會（OSA，在華只是短期工作）。
還有一些由傳信部直接派來的教區司鐸（非修會神父），以及一些曾在國外和當地接受過培訓的中國神父。

1.4. 羅馬教廷的第一項新猷：宗座代牧

在17世紀，羅馬教廷和傳信部主要關注的是，到新發現的地區去傳播福音，在當地傳福音常遇到上迫害。羅馬教廷也開始擔心葡萄牙的‘保教權’（Padroado）制度的不良後果。因此羅馬的教會領導層設法尋找一種方法來克服這兩種問題。

法國耶穌會神父，羅歷山（Alexandre de Rhodes, 1591 - 1660）曾在越南工作，他向羅馬提交了一些有趣的報告。他贊揚教宗們熱心地為埃塞俄比亞和日本提供牧者，並委託他們擔負起培育當地神職人員的責任，以避免在嚴重迫害的情況下，在這些廣大地區會喪失基督教信仰。他鼓勵羅馬教廷對安南（東南亞）、中國和遠東地區也實施同樣的計劃。

教宗歷山七世（Alexander VII, 1599 - 1667，自1655年起在位）被羅歷山神父的論點所說服；教宗經過仔細考慮，並在傳信部的鼓勵下，開始在羅馬的直接管轄下，建立宗座代牧區。教皇歷山七世任命並派遣了三名宗座代牧到“中國和鄰近的王國”，他們都具有祝聖中國神職候選人和推動建立地方教會聖統制的權力。⁵

事實上，1658年7月29日，巴黎外方傳教會的兩位主要創始人，在梵蒂岡被祝聖為主教，即陸方濟主教（François Pallu, 1626 - 1684），和交趾（越南北部一地區舊稱）的宗座代牧，郎伯爾主教（Pierre Lambert de la Motte, 1624 - 1679），為安南的宗座代牧。1659年9月9日，教宗明確了他們要管理的領土：陸方濟主教管轄交趾（越南北部）、寮國，和中國南方五省（雲南、貴州、湖廣、廣西、四川）；郎伯爾主教管轄中國東南五省（浙江、福建、廣東、江西和海南）。

⁵ 1659年9月9日的 Super Cathedram 的宗座簡函。隨後，其他人也遵循了同樣的方法，如：1665年3月13日的 Iniuncti Nobis 和 1669年9月13日的 Speculatores。

1660年，巴黎外方傳教會第三位创始人，高多林主教（Ignace Cotolendi, 1630 - 1662），成為南京的宗座代牧，管轄華北五省，以及一些鞑靼地區和朝鮮半島。

關於這些任命，1659年9月9日的 Super Cathedram 宗座簡函中說：

在上述地區，為方便祝聖本土神職人員，並蒙主的降福，為天主教信仰奠定堅實基礎，我們，藉着宗座的權威，對上述的陸方濟主教、郎伯爾主教，和高多林主教，賜予七年的權威，管轄那些地區的本土基督信徒，然後以宗座代牧的身份，合法地把那些尚不懂拉丁文，但會讀出拉丁文，並能正確宣讀彌撒正典（成聖體經）和知道彌撒規程的神職候選人，晉升為聖品和司鐸，同時要保證他們達到所有其它的資格要求。他們也可給所有已經升任聖職的人以豁免，使他們可以自由地、合法地，和有效地履行聖事職責，他們也可以給予這些信徒以權力，在法定時辰念日課，並用他們本國語言做其它的祈禱。⁶

1659年，對前往中國和安南宗座代牧的指示（Instructio Vicariorum Apostolicorum Ad Regna Sinarum et Cocincinae proficiscentium），也就是說，給上述三位宗座代牧的指示，聖座傳信部主張陶成眾多的本地神職人員，他們也要適應當地的習俗和文化，傳教士也應得到靈修和知識方面的充分培育，謹守經濟獨立和保持傳教使命的純潔和精神。傳教士們將放棄任何政治和商業活動，並就所有重要的決定，如祝聖主教等，與聖座傳信部進行磋商。在“在傳教區里”第三節中說：⁷

這是聖座決定派遣你們，作為這些地區的主教的主要原因，就是要盡一切辦法照顧和教育當地的青年，使他們成為優秀的司鐸職務的候選人，要授予他們聖品，然後把他們安置在他們原來的地方，在那些廣闊的地區，擔負職責，在你們的指導下，以他們的热情，管理基督徒團體的生活。因此，你們應該牢記，要把尽可能多的適合條件的人引向聖品，培育他們，並在適當的時候，祝聖他們位神父。

隨後，在你已選拔（為聖品）的人中，你可能發現某些人適合主教的職位，但要小心，你要向教廷聖部報告他們的名字、資格、年齡和其它有關的信息，如：祝聖的地方、要負責的教區等，在未與教廷溝通之前，絕對不容許自行把他們祝聖為這種尊高的職位（這是絕對禁止的）。

因為整個教會的團結一致是建立在主教們服從聖座的基础之上，建立在諸聖相通功，和堅決反對異端和分裂。尤其在邊遠的地區，異端和分裂是一種可怕的危險。你們不僅要以身作則，服從羅馬聖座，還要盡其所能說服在你們管轄下的中國人和其他民族要敬重聖座，將聖座視為導師和聖神的工具；必須完全服從聖座的命令和安排，在困難中，在一切屬靈的事務上，要諮詢聖

⁶ <http://www.papalencyclicals.net>. 參閱 C. Costantini, Ricerche ..., op. cit., 第 56 - 57 頁。

⁷ 參閱拉丁文本，載于 Joseph METZLER, Sacrae Congregationis de Propaganda Fide Memoria Rerum, 350 anni a servizio delle Missioni, 1622 - 1922 年, Vol. III/2, (Rome-Fribourg-Wien: Herder, 1976), 第 696-704 頁。

座，能心悅誠服地接受聖座的指導。人們看到你們立下服從的榜樣，他們就會更容易接受聖座的領導。

所以，若沒有聖部的同意，就不要做出任何重要的決定，要把你們根據形勢完成本職工作的情況寫成書面報告，以便讓中國人理解到，在一些重大的事情上，有必要向聖座報告和諮詢。也要讓他們盡量經常地寫信給我們，並通過書信徵求教宗的指示 並等待他的答復…

要以高度的關切和實干精神，開辦學校，用當地語言免費給那些地區的青年教授基督教教義和拉丁文，也要竭盡所能，把教友的孩子留在你們的學校和你們身邊，避免把他們交給外教人去教育。

在這些學校，如果你們發現孩子們良好的品格，且熱心、虔誠、慷慨，適合文化學習，並有希望追求獻身生活，你們應該培養他們的熱情，盡力幫助他們繼續學習；當他們在熱心、虔誠和文化學習方面都有進步，你們可以把他們記錄在待培神職人員的行列，經過許多屬靈的操練，檢查他們的意向和聖召後，在適當時候，將他們升入聖品。

這三位主教為了完成各自的使命，不得不徒步穿越波斯和印度，因為葡萄牙拒絕讓不承認葡王保教權的傳教士上船。與此同時，荷蘭和英國的船隻拒絕運送天主教傳教士。郎伯爾主教 (Bp. Lambert) 於 1660 年 11 月 26 日離開法國，1662 年抵達暹羅 (Siam) 首都大城府 (Ayutthaya)。1664 年，陸方濟主教在這城市與他相遇，並和他在一起；然而，高多林主教在剛抵達印度後不久，於 1662 年 8 月 6 日不幸去世。

1659 年，聖座傳信部的指示啟發了法國現有的兩位宗座代牧，他們起草了一份“對正確履行宗徒職責的重要指示” (**Instructiones ad munera apostolica rite obeunda perutiles**)，1664 年，他們在大城府舉行的一次會議上，以這份文件作為大會的結論文件

1664 年 2 月 4 日，教宗歷山七世 (Alexander VII)，以 *Onerosa Pastoralis* 簡函的形式，對當地神職人員發出了類似的指示，後來，又分別於 1665 年 2 月 28 日，以簡函 **E Sublimi Sedis**，和同年 3 月 13 日，以簡函 **Injuncti nobis** 的形式，發出了這樣的指示。1669 年 9 月 13 日和 10 月 13 日，教宗克勉九世 (Clement IX, 1600 - 1669 年，自 1667 年起在位) 重復了這些權力。教皇克勉十世 (Clement X, 1590 - 1676，自 1670 年起在位) 於 1673 年 12 月 23 日，他以簡函 **Decet Romanun Pontificum** 重申了這種權力，聲明宗座代牧“可以根據信仰的增進和教友的數量，陶成本土的神職人員，建立當地的聖統制度…”⁸

⁸ Pasquale D'ELIA, *Catholic Native Episcopacy* (Shanghai, Tussewei Printing Press, 1927), 第 9 頁; C. COSTANTINI (剛恒毅), *Ricerche... op.cit.*, pp. 第 57-58 頁.

1.5. 伍朋·切里蒙席 (Urbano Cerri, ? - 1679)

傳信部的秘书伍朋·切里蒙席在 1677 年向教宗諾森十一世 (Innocent XI, 1611-1689, 自 1679 年起在位) 提交的关于全世界天主教會狀況的报告中, 重申了本土神職人員的必要性:

首先, 在我看來, 神父的使命, 无论是教區神父或是修會神父, 除非他們受到主教或宗座代牧以主教身份的关照, 否則永遠不會取得持久的進展。這種傳福音的方法, 不但由我們的主耶穌建立, 而且由宗徒們和使徒工作者們一直實踐着。他們教導人們, 然後祝聖當地的人為神父和主教, 以便能融合而及時地施行聖事。因此, 尤其是當傳教士帶着教理講授人或老師來教導當地人的時候, 這才是在外教人中傳播和建立基督教的真正方式。如果有好的機會, 我們學院的外國學生可以成為傳教士或教師。這種方法還會有另一個優勢: 我的意思是, 會眾在這種情況下將不必負責維持本地傳教士的生活, 因此, 即使受到異教徒的迫害, 因為這些傳教士理解當地語言, 了解國情和擁有親朋好友的人脈, 他們不需要逃跑, 這種情況曾發生在日本、中國和埃塞俄比亞, 還有其它一些國家, 而現在, 這種做法已被拋棄。我所說的是如此的真實, 以至于 (非天主教的) 主教們, 尽管在分裂和深深的無知中, 仍繼續能在土耳其人和偶像崇拜者中傳播基督宗教。⁹

教宗諾森十一世對傳教工作和本土主教的祝聖問題給予了極大的關注。這個問題于 1677 年 7 月 19 日在傳信部進行了討論。

實踐證明, 任何地方如果沒有主教, 天主教會就無法生存……即使我們把所有的教區和修會的神父們只是都派往亞洲, 他們也不夠用。此外, 不幸的是, 聖部還面臨着許多其它的困難、障礙和經費問題, 在目前只能維持一些傳教士在那裡傳教。再加上語言的困難, 還有當地人民的不信任, 以及當局對他們的懷疑, 這些問題一直是, 似乎永遠是無法克服的。還有一種危險, 就像過去發生過的一樣, 一旦遭受迫害, 他們的使命就可能會被放棄。但是, 將本地人祝聖為主教, 就是對這種情況的補救措施, 避免傳教工作中斷。而且, 如果第一代的外來主教遇到語言上的困難, 但他的繼任者, 也就是土生土長的本地主教, 就不會有這種困難。目前, 我們的學院可以錄取一些不同國籍的神職候選人, 這就可以為這樣使命提供合適的人才。

人民和當地政府將不會對他們有任何懷疑。他們在幾天內所得到的皈依人數可能比外國主教多年來的成績還多。正如中國宗座代牧的經歷所顯示的那樣, 通過任命本土的神父們, 他們在東印度群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當地的神父有親友的人脈, 知道這個國家的習俗; 他們可以把握合適的時間和條件, 知道什麼時候

⁹ 羅馬天主教世界概況: 由切里蒙席撰寫, 旨在為教宗諾森十一世所參考.... 第一次譯自一位可信的意大利手稿, 在此之前, 斯蒂爾爵士 (Sir Richard Steele) 從未出版。(J. Roberts 印刷, 倫敦, 1715).

要發言，什麼時候應保持沉默。當他們得知迫害的警訊時，他們能夠找到及時的補救辦法，不像外國傳教士那樣，容易受到欺騙和背叛，他們不知道躲藏到哪里，也不知道怎樣养活自己。但是，即使本地神職人員被驅逐出境，他們對這個國家和這些親人的愛，將驅使他們千方百計再返回來。他們也可能會找到最安全的藏身之處。。。¹⁰

傳信部在 1678 年 4 月 26 日頒布的一項命令中，和隨後在同年 7 月 15 日和 8 月 28 日頒布的另外三項法令中，向宗座代牧授予了權力，授權他們在中國祝聖六名本土的主教，其中兩名在安南傳教，四名在東京（越南北部一地區）傳教。傳信部承認，雖然混血兒像歐洲人一樣較容易被接受為聖職，但傳信部強調，真正和純粹的本土神職人員應得到優先考慮。¹¹

教宗諾森十一世於 1680 年 4 月 16 日更新了宗座代牧的職能，而教宗克勉十一世（1649 - 1721，自 1700 年起在位）於 1703 年 12 月 7 日以前任教宗為榜樣，發表了 *Dudum Felicis* 簡函。教皇克勉十一世強調了這樣做的動機：“為了以一種更容易的方式完成上述地區本土神父的任命，因此，在天主的保佑下，為天主教信仰提供更堅實的根基……”該教宗還授權宗座代牧有祝聖本土神父的權，並以“傳教之名義”使他們領受聖秩 (*Titulo Missionis*)。

教宗克勉七世（1652 ? - 1740 年，自 1730 年起在位）於 1736 年 4 月 16 日，接着是他的繼任者們，特別是庇護六世（*Pius VI*，1717 - 1799 年，自 1775 年起在位）於 1775 年 5 月 10 日，都曾重申，祝聖本土的神父和主教是教會建立和傳播的最有效、最必要手段。事實上，後一任教宗給安南的宗座代牧寫了一份通諭，鼓勵他們要通過開辦神學院，來加強陶成本土神職人員的努力。

1.6. 博爾吉亞樞機主教（*Cardinal Stefano Borgia, 1731-1804*）

1787 年 3 月 5 日，博爾吉亞樞機主教，當時的傳信部秘書長（自 1770 年任秘書長一職，後來成為傳信部部長），提交了一份紀錄，報告說，“上一次發生的迫害業已證明，在中國祝聖本土主教的必要性，以及有必要禁止外國傳教士在現刻再回到那些土地”（*Memoria sopra la necessità, che l' ultima persecuzione di Cina ne dimostra di stabilire Vescovi Nazionali, e sul divieto da farsi ai missionary esiliati di non rientrare per ora in quelle terre*）。這是為應對由於 1784 年在中國發生迫害所造成的形勢，所做出的反應。他後來又寫了第二份紀錄：“關於那些應該祝聖本土主教的中國地方的報告”（*Memoria sopra i luoghi nei quali converrebbe fissar Vescovi Nazionali in Cina*）。¹²

¹⁰ 引用 C. Costantini (剛恒毅), *Ricerche...*, op. cit., 第 20 -21 頁。

¹¹ 同上，第 59 頁。

¹² 參閱兩個紀錄文件的拉丁文本，載於 Joseph METZLER, *Sacrae Congregationis de Propaganda Fide Memoria Rerum, 350 anni a servizio delle Missioni, 1622 - 1972*. Vol. III/2, 1815 - 1972, op.cit., 第 716-726 頁；也請參閱 C. COSTANTINI, *Ricerche...*, op.cit. 第 62 - 65 頁。

他强调“某些人错误地认为，增加主教的數量會有害于傳教工作”，和“有必要建立當地的聖统制”，以及“关于本土神職人員，特别是祝聖本土的主教，有必要改变傳教士的心態”。

除了(语言的)困難之外，还有另一个困難，那就是在了解當地的风俗習慣，及當地人民的性格和素質方面，缺乏有效的經驗，不能與他們自由的交談和沟通。也許，正是這些困難阻礙了我們在中國的傳教工作。

一个迅速的补救办法是，最终庄严地决定祝聖中國本土的主教……一个外國人將永远无法成為一个优秀的牧者，因為，一方面，他不能够自由地指导和牧放羊群，另一方面，作為外國人，很難让人们與他建立像父親和孩子們之間應該存在的那种信任……

在整个教會的歷史中，從未有任何這樣的情況，即：對那些已經接受我們信仰的人們，並已經向他們充分宣傳了福音之後，而不為他們提供他們本籍的主教！……

我們應該尽力為本土的神職人員提供堅實和完整的教育；我們應該及早培育他們，根据他們的能力，使他們逐漸確定在教會中的最終方向，最終，我們將看到，在某個時刻，建立本土的主教職務對他們的影響，也會像曾對歐洲人的影響一樣……

我們有責任組建一個堅強而受過良好教育的本土神職人員的隊伍，我們在各地都能發現一些有能力、有雄心壯志的神職人員候選人，我不知道，他們目前被迫服從的局面如何維持下去？我們不需要對人和事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在這方面，我們會發現，在我們傳教區的神職人員與歐洲神職人員是一樣的：歐洲神職人員往往以同樣的方式，以同樣的理由，拒絕接受總是由他們自己故土之外選出來的領導人，本地的神職人員會認為這是一種不公平，完全拒絕這種無用的統治。如果我們有序地陶成本土的神職人員，對我們來說，這是一項義務，遲早會有一大批有能力、有勇氣、甚至有抱負的人脫穎而出。他們不會只接受低於歐洲傳教士的職位，因為他們的能力和各方面並不亞於歐洲傳教士，而且歐洲傳教士還往往有瑕疵，不那麼為當地人所接受。如今，這種難以忍受的差別對待已經在很多人心中產生了一種傷痛，以至於引起了一些人的抱怨，須知，抱怨和不服從之間，只有一步之遙……

我們請求和依靠教廷聖部的智慧引導，求他們指出，我們該怎么做才是更好的方法，去實現羅馬聖座建立一個本土主教制度的強烈願望，以及如何溫和而有力地實現這一重要事業，如何循序漸進、平穩地陶成本土的神職人員，因為這些神職人員直到最近還處於嚴重的自卑狀態……我們如何才能說服一些歐洲傳教士，讓他們摒棄自己的驕傲態度，並能在一個值得信任和尊重的本土神職人員的領導下工作。最後，我們一定要自問，我們是否應該繼續面臨這樣一個危險的選擇：要么，對自己頑固地認為本土的神職人員低人一等，而被迫譴責自己的傲慢態度，要么，讓自己面臨粗暴反抗的危險……

有人可能會反駁，說中國人並沒有明確表明他們需要本土主教。我們的答案是，中國無需這樣要求，天主教會本身就應該主動祝聖本土的主教。教會的整個歷史表明，一旦福音傳遍整個國家，教會就應該為當地的信徒提供本土的主教。

博尔吉亚樞機主教認為，歐洲傳教士在這種情況下秘密進入中國是不明智的，因為違反一個國家的民法會損害當地的教會，並引起當局的懷疑。此外，他又再次提出他的建議，即：要採用本地語言施行礼仪。

神父用教友們完全不懂的語言，用與他們的語言毫無關係，甚至相差甚遠的一種語言，來舉行彌撒有什麼益處呢？他們能有什麼收益呢？我明白，中國彌撒的問題比祝聖本土主教的問題更複雜。然而，我仍然相信用本地的語言舉行彌撒會帶來巨大的好處。其實，這樣的彌撒經書已經在中國印刷，並保存在傳信部的圖書館內。

博尔吉亚樞機主教的計劃於 1817 年 3 月，並在接下來的兩年裡，再次提出。這是根據傳信部在澳門的代理人和其他人士的建議，即：要祝聖中國神父為主教。然而，由於歐洲的幾位傳教士的反對，這個提議被放棄了。

1.7. 1845 年的指令

1845 年 11 月 23 日，傳信部向其管轄下的傳教領土上的領袖們，發布了關於本地神職人員的 **Neminem profecto 指令 (Instructio De Clero Indigena)**。¹³ 該指令強調，本土的神父不應僅僅被視為輔助人員。相反，他們應該與歐洲人地位平等。一個嚴肅的陶成計劃應該使他們適合教會的所有使命，包括主教的職務。這份文件成為本土神職人員，特別是中國本土的神職人員，在一個新時期陶成本土神職人員的重要因素之一。

毫無疑問，任何人都不能忽視，聖座為天主所托付的責任付出了何等樣的努力，以便將福音的法律之光傳布到整個世界，使那些還處在黑暗和死亡陰影下的人

¹³ 舉行了三次全體會議研究和討論了本土神職人員的問題，最終於 1845 年 11 月 23 日發布了這一指示。第一次全體會議於 1845 年 2 月 17 日舉行，討論了“1844 年宗座主持的主教會議所進行的審議”。“Ponente”（演講者）是樞機主教馬基（Vincenzo Macchi）；第二次全體會議於同年 5 月 19 日舉行，由樞機主教馬伊（Angelo Mai）主持，目的是澄清在本迪治里（Pondichery，印度南部一地區）舉行的會議的審議情況。第三次全體會議於 9 月 22 日舉行，目的是討論和將該指示草案最後定稿，該草案由前一屆全體大會所決定的，大會再次由樞機主教馬伊主持。草案對第 6 條和第 7 條作了一些修改、更正和增補。教宗克勉十六世最終於 1845 年 11 月 22 日批准了這一指令。傳信部部長，樞機主教弗蘭索尼（Giacomo Filippo Fransoni）於 11 月 23 日正式發表了這一指令。這個指令是發給傳信部屬下各傳教領土的所有領導者的。拉丁文本請參閱 C. COSTANTINI, *Ricerche...*, *op.cit.*, 第 68 - 76 頁。

們，能够认识到永恒真理的荣耀，获得和保持生命的聖言。對傳揚天主教信仰而言，有兩種工具显然非常重要和必要，即：要刻不容缓地地建起主教機構，“聖神將委派他們管理天主的教會”，以及严格地依照傳統，特别是效法宗徒們的榜樣和初期教會的见证，去陶成本土的神職人員。

該文件举出了宗徒時代和初期教會的一些榜樣，和聖座傳信部和最近几位教宗所提出的上述一些倡議。該文件列出了以下八項指示：

1. 首先，傳教區每一位领导，不论其職務如何，為了促进和加强其工作，都應尽其最大努力，尽早祝聖主教，到他們需要管理的傳教區去。當地域辽阔需要或允許劃分區域時，應努力增加主教的人數，以覆盖這些分區的領土，以便建立聖統制，來管理教會；

2. 他們最重要的職責是，首先應該非常认真地，从當地基督徒和居民中，挑选經過良好考驗的神職人員候選人，以便能使他們成為神父，随着信仰的傳播和信友人數的增加，教會训练的傳統應逐步加强，保证天主教有稳固的基础。正因如此，建立修道院即使不是必须的，也是極有好处的，因為建立了修道院，那些被天主召叫要成為神父的年轻人，就可以在那里受到良好而堅實的教育，充分學習和掌握聖教會的教义；

3. 應該向本土的神職人員候選人教导所有神聖的知识和虔誠精神，並在教會服務中受到精心的训练，這也是聖座所希望看到的，以便他們能适合担任教會的各种職務和使命，甚至具有能接受主教職務的品格。為了取得更好的结果並為我們教會的利益，最重要的是，應該让那些被预定担任這樣一个伟大職務的人，受到良好的训练，以便能履行這一職責。因此，傳教區的领导們應將他們認為较优秀的本土神職人員，提升到较高的職位，並在适当時候，果断地將他們委派為教區的领导人；

4. 將本土的神父置于较次要和辅助地位的習俗，必須受到拒絕和被廢除。所有的神職人員，无论他們是本地人或是歐洲人，都應該一視同仁。只能根据他們从事傳教工作中的時間長短，和他們在履行聖職中的功績，给予他們相應的榮譽、職務和升迁。

第5項談的是，因為本土神職人員不足以應付需要，應培育平信徒教理教授員。第6項說的是，根据教宗本篤十四世1775年7月16日颁布的宪法“关于遵守東方礼”（*Allatae Sunt*）的内容，主要是敘利亞的迦勒底礼仪（*Syro-Chaldaic Rite*）的事情。

第7項說的是，教宗歷山七世（*Alexander VII*）的宪法 *Sacrosancti Apostolatus officii*，警告神職人員不可參與世俗政治事務。整个第8項，是劝告傳教团体的领导人，考虑采取所有積極的方法，增加新教友的数量，要特别关照那些虔誠的善會參與祈禱和做補贖，进行社會和慈善服務，特别是在教育機構。它还告誡各傳教团体的负责人，要經常召集宗教會議，以便交流經驗，並為改进本土教會和福傳工作作出最佳決定。他們還應經常同羅馬教廷保持联系，以便加强沟通

與合作。

然而，傳信部做出了消極的最終結論：“如果曾有如此巨大而持續的努力，理應出現可預見到的效果，但令人遺憾的是，現實中並沒有圓滿地實現這些願望！”

剛恒毅總主教（Celso Constantini, 1876 – 1958）就這一長時期內，對本地神職人員的陶成問題，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1947年，他在擔任傳信部秘書長時候寫道：

*聖座傳信部自成立伊始，就對本土神職人員的陶成工作做出了明確的指示，（參閱1630年11月28日的文件 *Collectanea S. C. de Prop. Fide*, vol. 1, no. 62, Romae, Tip. Polyglotta MCMVII）。但是，這些指示遇到了一些困難，直到十九世紀中葉，才產生了非常少的成果。然而，這個問題，無論是傳信部或傳教士，都從來沒有被忘記… 實現這一目標的方法和手段，雖然對支持和維護傳教事業確實有用，但在更需要的地方，卻被忽視了… 陶成本土神職人員的必要性曾遭到了幾次反對，甚至被認為是不可能的事業。*

¹⁴

不幸的是，當時在中國的大多數歐洲的主教和傳教士們都認為，祝聖本土神職人員仍然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這種判斷是基於他們個人的負面經歷，尤其是基於他們對本土神職人員抱有文化和宗教上的偏見，這在當時的那些年代算是一種通病。

¹⁴ C. CONSTANTINI, *Ricerche...*, op.cit., pp. 5. 15 – 16.

第二章

不同類型的本土神父培育

2.1. 對祝聖中國神職人員，所遇到的拉丁文問題

傳教士來到中國的头十年，面临着建立本土神職人員的問題。這個問題涉及兩個主要問題：中國人應該被祝聖為神父嗎？他們在教會礼仪中，應該用拉丁文還是中文？在 17 和 18 世紀，人們對這兩個問題有不同的回答...¹⁵

對未來中國神職人員候選人，是否要求他們掌握拉丁文的問題，那時仍在討論中。各個修會，特別是耶穌會和方濟各會，自他們開始住在澳門時，就在中國的信徒中招募人員，但只是訓練他們成為修士。

在澳門，1594 年耶穌會開辦的“天主之母”（Mater de Deus）學校，在范禮安神父（Alessandro Valignano, 1538 - 1606）的推動下，由羅馬的耶穌會總會長升格為聖保祿學院。¹⁶ 這是設有藝術、哲學和神學系的一所大學，對準備到中國和其他國家的歐洲傳教士，進行培訓和深造。¹⁷ 還包括一所小學和一所音樂和藝術學校。一些中國修士曾在這裡受過訓練，但是他們沒有一個人被祝聖為神父，因為 1606 年，耶穌會總會長再次下令，不得祝聖中國神父。¹⁸

自 1603 年初起，范禮安神父受到澳門人民慷慨精神的鼓舞，考慮在中國的一個

¹⁵ Nicholas STANDAERT (ed.),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中國基督教史研究手冊). Vol. 1, 635 - 1800 (Leiden Brill, 2001), 第 462 頁。

¹⁶ 聖保祿學院一直運作到 1762 年，直到耶穌會被逐出澳門；這個地方變為被中國大陸驅逐的神職人員的避難所。它在 1835 年因一場大火被焚毀。

¹⁷ 該學院提供四年的哲學課程，三年的“決疑法”（casuistry）或倫理神學課程，最後一年是人文研究課程。要成為耶穌會修士的學生只學習倫理神學課程。

¹⁸ G. NARDI, *Cinesi a Napoli (Napoli, Edizioni Dehoniane - PIME, 1976)*, 第 392 頁。一些日本神職人員候選人接受了培訓，1623 年，耶穌會日本省的郭天庇神父（Francisco Pacheco，後來於 1626 年 6 月在長崎殉道）重新開辦了一所神學院，為日本國專門培訓日本的修道生，該神學院附屬於聖保羅學院。由於日本發生迫害，造成修道生短缺，再加上澳門耶穌會士百周年紀念（1564 - 1664）時經費不足，該神學院於 1701 年關閉。（參閱 Manuel TEXEIRA, *The Fourth Centenary of Jesuits of Macau, 1564 - 1964*, Macau, Salesian School, 1964, 第 26 頁）。

城市，而不是澳門，為年輕華人開辦一所修道院。翌年，他請求耶穌會的總會長“為中國青年開辦一個修道院基金會”。范禮安神父還寫了一篇文章，強調建立修道院的必要性。直到1608年3月，他才在南昌開設了一所初學院，招收了四位初學生，但是該處學院於1610年關閉了。¹⁹

不久，對培養本土神職人員便做了第一次嘗試。利瑪竇神父來到肇慶後不到八年，兩位來自澳門的（有葡萄牙語的名字）中國年青人，方濟各（Francis Martinez）和西巴斯善（Sebastian Fernandez），他們加入了耶穌會，並於1590年開始初學。後來，利瑪竇證明他們，品行端正，“他們對傳教士的幫助很大”，“忍受了許多痛苦和辛勞”。1605年，中國共有13位歐洲神父和“四位中國修士”。1608年，耶穌會又接納了四位攻讀哲學的修生，也就是說，他們想要成為神父。但是，毫無疑問，因為關於中國人是否可以被祝聖為神父的問題仍然懸而未決，為了避免萬一他們未被祝聖而可能引起的抱怨，這些年輕人在加入這個耶穌會時，就必須事先同意明確的條件，即：他們不能被祝聖為神父。他們的人數增長得相當快。1591 - 1634年間，有15位中國人加入了耶穌會，1650 - 1690年間又有10位加入，1709 - 1763年間，又有34位加入了耶穌會。²⁰

葡萄牙傳教士孟三德神父（Eduardo de Sande, 1531 - 1600）作為中國傳教團的長上，曾多次致信范禮安神父和總會長 Claudio Acquaviva 神父（1543 - 1615），請求授權予他在澳門開辦一所修道院。

1610年利瑪竇神父逝世時，有八位歐洲耶穌會士和八位中國修士住在中國。1616年，總會長 Mutio Vitelleschi 神父（1563 - 1645）批評了只讓中國人加入耶穌會卻不能被祝聖為神父的這種限制。然而，將本土神職人員候選人祝聖為神父的事還是被推遲了。

耶穌會傳教士們認為，必須調整對中國神職人員候選人的培訓。關於拉丁文，他們認為，教中國修生一門與他們自己的語言如此不同，且如此複雜的語言是困難的，甚至幾乎是不可能的。又由於實際上被選為神職人員的候選人，都只是成年男子或鰥夫，情況就變得更加困難。因此，耶穌會士們建議，中國的神職人員應該獲豁免學習拉丁文，並被允許用中文舉行彌撒和施行聖事。他們請求羅馬聖座批准中國一種中文禮儀，並承認漢語也是一種禮儀語言，可與東方禮教會中的希臘語、敘利亞語和科普特語相媲美。他們這樣請求是為了促進本土神職人員的發展。1613年2月，當時在杭州傳教的金尼閣神父（Nicholas Trigault, 1577 - 1628）奉命被派往羅馬懇請此事。1615年3月26日，為響應耶穌會士的請求，教廷的聖部頒布了一項法令，允許

¹⁹ 參閱 Pasquale D'ELIA, *Fonti Ricciane*, 3 vols. (Roma: La Libreria dello Stato 1942 - 1949), 第二卷, 448 頁, 注解 2, 在 N. 855 中, 解釋了文本: “Per questo in Agosto dell'anno 1607 comprorno (a Nanciam) una casa assai buona per mille e ducento ducati che, sebbene non era soperchio per una forma di collegio che pensavano di far quivi...” 請再參閱 第 466 頁的注解, 以及, 參閱 vol. I, *Introductione*, 第 CXXIX-CXXX 頁。

²⁰ P. D'ELIA, *Catholic Native Episcopacy*, op.cit., 第 19 頁。

用中文举行弥撒和诵读日課，並允許人們佩戴礼巾 (lijin)。此外，“尽管羅馬教會和年轻的教會之間，由于缺乏共同的礼仪语言，可能存在分裂的危險”，但中國的神職人員候选人仍被暫時豁免學習拉丁语。1615年3月26日，這個問題在聖座礼仪部和宗教裁判所舉行的一次會議上得到了討論和批准。1615年6月27日，教宗保祿五世（1550 - 1621，自1605年起在位）簽署了 **Romanae Sedis Antistes**，允許使用中文舉行彌撒、诵读日課和施行聖事。²¹

具体执行這一許可仍遇到障礙，原因很多。主要是因為缺少所需的中文译本，以及一些傳教士反對祝聖中國本土的候选人為神父。拉丁文的問題在1622年提交給新成立的傳信部，但是，他們那時並不希望作出最後的決定。大約在那個世紀中叶，教宗諾森十世（Innocent X, 1574 - 1655，自1644年起在位）反對在礼仪中使用中文。然而，教宗歷山七世（Alexander VII, 1599 - 1667，自1655年起在位）在1656年再次允許以前使用中文的權利。几年後，在1658年和1659年，正如前面提到的，教宗歷山七世重申准許新任命的遠東宗座代牧，祝聖中國神父，即使他們只會讀，而不會說拉丁文。

1665年，外國傳教士被驅逐到廣州。他們认识到，只依靠外國傳教士，傳教事業的基础就會很弱。因此，他們认识到陶成本土神職人員的緊迫性。由于聖座1615年的法令尚未執行，他們認為有必要進一步確認該法令。耶穌會神父魯日蒙（François de Rougemont, 1624 - 1676）于1667年寫了一份報告致羅馬，他強烈主張，把中國本土的神職人員候选人祝聖為神父是絕對必要的，並應允許他們使用中文作為他們的礼仪语言。後來，殷鐸澤神父（Prospero Intorcetta, 1626 - 1696）前往羅馬，向他的總會長和教宗面前，為這一事業呼吁。

1672年，殷鐸澤神父以修會代表的身份前往羅馬，他隨身攜帶了保護和發展教會的建議。第一個建議是，中國男人要在亞洲某個地方的修道院接受培訓後，再被祝聖為神父。在羅馬期間，他獲得了總會長Paolo Oliva神父（1600 - 1681）的許可，在澳門開辦一所大學。為此，他還獲得了葡萄牙國王佩德羅二世（Pedro II）的捐贈。但是，這項許可並不是作為一項授權，而是作為日後商議的基礎。事實上，在1676年，就是這位總會長下令給郭天庇神父（Pacheco, 1627 - 1687），這位負責遠東地區的視察員，就有关建立一所大學的問題，征求在中國的，特別是在北京的神父們的意見，同時也要問他們，將中國本土的神職候选人祝聖位神父是否合適。1677年夏，郭天庇神父向所有中國耶穌會會士們發出通告，征求他們對上述這兩個問題的意見。但是，磋商的结果，意見遠非一致。強烈倡導祝聖中國神職人員和實行中文礼仪的，是利類思神父（Ludovico Buglio, 1606 - 1682）和當時是傳教團的長上南怀仁神父（Ferdinand Verbiest, 1623 - 1687）。然而，羅馬的耶穌會總部花了數年時間才對1677年磋商的结果作出回應。

利類思神父是一位傑出的漢學家，他嚴肅地對待此件事。1654年至1678年間，他翻譯了聖多瑪斯·阿奎那的神學大全（31卷）的第一和第三部分。1670年，他出版了羅馬彌撒經書的中文译本，1674年出版了日課，1675年出版了礼仪

²¹ 引自 C. COSTANTINI, Recherche..., op.cit., 第 56 页.

手册。他还出版了一些教义和伦理书节选的中文译本，以及教會的其它一些著作。因此，他充分显示了，汉语可以作为福傳的媒介。

南懷仁神父寫了几篇报告，强烈主张祝聖中國神父的必要性。1660年，他派遣柏應理神父（Philippe Couplet, 1623 - 1693）到羅馬，除了其它一些事情外，还建議要求再次确认教宗保祿五世在多年前授予他的特權。柏應理神父寫了“1671年前後中國傳教事業的情況和質量”。他在1684年把它提交给了傳信部。但是，他們不願意落實教宗保祿五世的決定。

1695年8月15日，一份名為“关于需要祝聖中國神父，以及准許他們在举行聖祭中使用中文”的長篇文件，這份文件于1698年12月12日送达羅馬的耶穌會總部。它總結了需要祝聖本土的神職人員的所有論據，主張中國神父和主教，不需要首先學習拉丁文，可以用中文举行礼仪。不幸的是，這份呈上的报告未达到目的，結果成為耶穌會為此提交的最後一份文件。

巴黎外方傳教會的白日升神父（Jean Basset, 1662 - 1707）希望用中文祈禱和举行聖祭，他把日課經和聖經的一些部分的内容译成中文。然而，將中文正式作為礼仪语言的申請从未得到許可。²²

這一重大的事業，几乎延續了一个世紀之久，其本身就足以证明，來中國的傳教士們从一开始就深思熟慮過，如何陶成中國本土的神父，甚至祝聖本土的主教。但耶穌會士的計劃未能成功，這是事實，因為，當教宗授予這種特權的時候，那時並沒有礼仪和神學書籍翻譯成中文；後來，當有了中文書的時候，却没有主教來祝聖年青的‘利未人’（中國本地的修生），而當有書和主教的時候，羅馬又取消了給中國的這種特權。²³

通過早期在专门學校或备修院給年青的修道生教授拉丁文，就解决了神職人員候选人學會拉丁文的問題。他們中的一些人，如李安德神父（André Ly），就掌握了這種语言。

李安德神父對陶成中國神職人員的看法

李安德神父在大城府時，就精通了拉丁文，他並不完全同意羅馬教廷賦予宗座代牧特別安排，來祝聖他們不懂得拉丁文的中國本地人為神父。因為他指出，歐洲人對這樣祝聖的中國神父评价很低，認為這些中國神父並不能從聖經、教父們和教會文獻中获得灵感。

²² Robert E. ENTENMANN, “Chinese Catholic Clergy and Catechists in Eighteen-Century Szechwan” (十八世纪四川天主教神职人员与教理讲授员) 载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e Sinologie*, 1989年, 第6期 (Paris, 1955年), 第399页.

²³ P. D'Elia, *Catholic native Episcopacy*, op.cit., 第28页.

DIARIUM ANDREAE LY, Presbyteri Sinensis, Missionarii et Notarii Apostolici 李安德神父（中國神父、宗座傳教士和公証員）的日記。24

Praeter superbiam mortalibus innatam, qua extraneus quilibet linguae regionis, contemptui esse solet apud omnes nationes; sinensses linguae Europaeae experts, longam per experientiam, plusquam millies repititam, norunt antiquiores Presbyteri sinenses, quam contemptibiles ipsi coram Europaeis fuerint; quo pacto, quaeso, aliquis sacerdos sinensis absque notitia linguae latinae, suis e fontibus eruere posset fundamenta veritatis christianae religionis, quae Sacris dumtaxat in Scripturis, traditionibus tum apostolicis, tum ecclesiasticis, sactorum partum voluminibus et Ecclesiae auctoritate reperiuntur, maxime calamitosis hisce persequutionum in turbinibus in quibus solus saepe, atque unicus frequenter, absente Episcopo et Vicario Apostolico, et longe a peritioribus sacerdotibus Europaeis semotus plutes per annos inter christianos derelictus, quod tremendo suo in sacerdotale munere non hallucinetur, vix ac ne vix quide mihi persuasum sit? Si eruditissimi quique Europaei, et in theologia versatissimi Epsicopi, et praeclarissimi Ecclesiae Antistites, humanae infirmitatis ob fragilitatem nonnunquam in multis se erase non diffitentur, quid sentiendum, oro, de Presbytero supro me depict?...

(He quotes some cases of some apostolic Vicars, who refused

即使不考慮人性固有的驕傲，但人們往往都看輕那些忽視自己本土語言的人；知曉一種歐洲語言的中國專家們，從他們長期的、無數次的經驗中得知，歐洲人看輕那些忽略自己語言的中國年長的神父。

但我的問題是，一位全然不懂拉丁文的中國神父，他怎能從只源自聖經、宗徒、聖傳、教父，以及教會權威的書卷中，學到那些基本的真理呢？尤其重要的是，在遭受迫害的這些年代，他常常發現自己孤獨無援，遠離主教和宗座代牧，也遠離有經驗的歐洲神父們，自己只是多年在教友們之中。我簡直不敢，或不能相信，他能在這樣困難的神父職務上不會感到困惑！如果受過良好訓練的歐洲主教和教會的領導者們，他們都不否認，由於人性的弱點，甚至他們也會犯許多錯誤，請問，對上述的那些神父，我們又能說什么呢？……

(他援引了某些宗座代牧的案例，他們拒絕將不懂拉丁文的神職人員候選人祝聖為神父，即使這些候選人是宗座聖部的長上們推薦的)

考慮到所有這些情況，我似乎覺得，在目前形勢下，主教或宗座代牧不促進祝聖不懂拉丁文的中國神職人員候選人為神父，更為安全一些，除非他們的長上為他們發出了豁免信，准許他們被祝聖為神父並分配他們工作任務。然而，我不能不感到驚訝的是，宗座代牧和主教們從東京挑選

²⁴ A. LAUNAY (編輯), Journal of André Ly, 1746-1763 (李安德日記 1746 - 1763), Texte Latin (Hong Kong, Imprimerie de Nazareth, 1924), 第 518 - 519 頁。

<p><i>ordination of local priests ignorant of Latin, even if introduced by superiors of religious congregations).</i></p> <p>Hic omnibus perpensis, securius mihi videtur pro meliori missionis statu fore, si Episcopus et Vicarius Apostolicus nullum Sinensem, Linguae latinae ignarum, sacros ad ordines promoveret, nisi testimonialibus letteris ordinationis, aggregations ac dimissionis auae sibi a Praelatis datis atque praesentatis. Satis interea mirari non possum, quod plures a catechistis tunkinensibus, a se formati, latinam linguam legere solum scientes, ab Episcopis et Vicarlis Apostolicis ad sacerdotium erecti fuerint, evehanturque quotannis, incredibili cum laudatae missionis emolumento.</p> <p>Caeterum quidquid missioni magis proficuum nostris praelatis visum fuerit, id in praxim redigatur, aveo. Sufficiat mihi, quod sense nea coram Praelatis exposuerim, nec quidpiam juris in negotio tanti momenti praetendo.</p> <p>Intra urbem Tching-tou, hac die 4 augusti anni 1760</p>	<p>出來的只會讀拉丁文的幾位教理教授員，把他們提升，祝聖為神父。這項工作已經進行了許多年，竟為傳教事業帶來了難以置信的好處。</p> <p>因此，我歡迎我們的長上，將他們認為對傳教事業最有利的事情付諸實施。我只要把我的意見向長上表達就夠了，在這樣一個重要的問題上，我並不裝作自己有任何權威。</p> <p>1760年8月4日，于成都</p>
---	---

2.2 中國的第一位神父和主教：羅文藻 (Gregorio Lopez, 1616 - 1691)

道明會會士羅文藻神父（西班牙文是“Gregorio Lopez”）是中國歷史上首位本土的神父，非常著名。²⁵

²⁵ 根据 Miguel A. SAN ROMAN 在 KU Wei-ying (编) 的《Missionary Approaches and Linguistics in

羅文藻神父于 1616 年出生在福建省福安市附近的羅家乡，父母是外教人。他十七歲時，结识了方濟會傳教士李安當神父 (Antonio de Santa Maria Caballero, 1602 - 1669)。他聽了李安當神父的講道後，請求准許奉教。1633 年，他受洗，聖名叫額我略。然後，他幫助李安當神父，成為一名教理教授員。于 1637 年，在教會受迫害期間，他跟着神父到南京、北京和其它地方，他在福安與福州之間的寧德市被捕，關進監獄二十三天，遭受了酷刑。後來，羅文藻和李安當神父被逐到一個又一個城鎮。1644 年，他們被迫在澳門避難。1645 年 5 月，李安當神父以及被葡萄牙人驅逐的加辣會七位修女抵達馬尼拉。

在去馬尼拉的途中，由于遇到大風，在越南停泊，羅文藻神父滯留在那里幾個月。在馬尼拉，他在道明會管理的聖多瑪斯大學工作，在那里他被賦予了一個西班牙文的名字洛佩茲 (Lopez)。他還有機會學習了西班牙文、拉丁文和哲學。他要求加入道明會，但沒有被接受。他被派回福建幫助傳教工作。1650 年 1 月 1 日，他終於被接納加入道明會，並在那一天穿上了道明會的會衣。

1652 年，他回到馬尼拉，在那里開始初學，發願，並在聖多瑪斯大學繼續攻讀信理神學和倫理神學。1654 年，馬尼拉大主教卡薩索拉 (Michael de Poblete Casasola, 1602 - 1667) 把他祝聖為神父，為此喜訊，當地華人社區一片歡騰。開始時，羅文藻神父在馬尼拉服務，第二年，他回到中國。他走遍了福建省各地，宣講福音，鼓勵和加強教友們的信德。在 1664 年至 1671 年的迫害中，他充分展示了自己的使徒熱情。他當時是整個江南地區唯一一位照顧基督教社區的神父。1665 年 5 月，他前往馬尼拉尋求幫助，他帶回一些資金回到中國，幫助當時在廣州被拘留的傳教士和在澳門的難民。那些被拘留的傳教士請求他去探訪他們所服務的基督徒社區，因為那里的教友沒有神父照顧。於是，他便開始出發，訪問十個省份，他長途跋涉，從廣東到福建、山東、河北，甚至遠到吉林省。然後他再次南下，穿過江西和湖南到達四川。他花了數年的時間各地奔波，為人付洗，施行聖事，並鼓勵教友。僅在兩年內，他就為 2,656 位成人付洗，在隨後的 30 個月里，又為 2,556 位成人付了洗，尽管教會那時正值受迫害時期。

1673 年 8 月 29 日，道明會神父閔明我 (Domingo Fernandez Navarrete, 1618 - 1689)，和交趾 (越南北部一地區) 的宗座代牧陸方濟主教，上書羅馬教廷，建議祝聖羅神父為主教。1674 年 1 月 4 日，聖座任命羅神父為 Basilinopolis 教區的領銜主教、南京教區的宗座代牧，和直隸、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和朝鮮的宗座署理。為了紀念這一時刻，教宗克勉十世送給他一個華麗的胸配十字架，和一個由教宗親自祝福的戒指。但是，羅神父是一位謙卑的道明會會士，他在 1677 年得知此事後，認為自己不配擔任主教職務，況且他很現實地評估了當時 (歐洲傳教士) 對中國神職人員嚴重的偏見，以及主教職務的艱難，他請求免去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中國大陸和台灣傳教方法和語言學),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2001) 第 149 頁，迪奧尼西奧 (Dionisio de la Cruz) 是中國首位被祝聖的神父，緊隨其後的是安東尼奧 (Antonio de Santa Maria)，他們在十六世紀末，加入了葡萄牙在澳門的道明會。然而，他們可能是混血兒。

他担任主教的职务。教宗克勉十世的继任者，教宗诺森十世收到了他的信。诺森教宗赞赏这位中国神父的谦逊，但教宗仍认为罗文藻神父正是当时中国传教事业的主教的合适人选。因此，教宗请道明会的总会长命令罗神父接受任命。总会长的信于1681年到达中国。但是，马尼拉道明会的省会长，不同意对罗神父的任命，威胁说，如果罗神父接受任命，他将被逐出修会。这位长上给出的反对理由是，罗神父的神学陶成还不够，以及他对礼仪之争的态度宽容。罗神父被召回马尼拉，他的行动受到了限制。奥斯定修会的会长帮助了罗神父，他在该修会避难一年零八个月。罗神父向马尼拉最高的王室法官提出上诉。这位法官给了罗神父自由，并允许他返回中国。1684年11月初，当罗神父回到福建时，他本希望陆方济主教将他祝圣为主教。不幸的是，他发现陆方济主教在他到达前几天刚刚去世。最后，于1685年4月8日，方济小兄弟会的意大利伊大任主教（Bernardino della Chiesa, 1644-1721）在广州将罗文藻神父祝圣为主教。

罗主教继续过着简朴而艰苦的传教生活。他定居在南京，在那里他为自己建了一座房子，与耶稣会会士们的房子分开。他得到了意大利方济各会会士余宜阁神父（Giovanni Francesco da Leonissa, 1656 - 1737）的帮助，余宜阁是一位优秀的神学家，罗主教任命他为副主教。罗主教重新开始他的使徒之旅，他每年都向罗马汇报他的工作和他所面临的困难。1687年，他指出，他只能去江南地区，因为他不能再走得更远。在另一份报告中，罗主教提供了在他教区工作的17位传教士的名单：13位耶稣会会士和4位方济各会会士，其中7位在江南工作，5位在山东，5位在直隶。这么小的数目不足以满足基督徒社区的需要。因此，罗主教决心祝圣更多的中国神父。由于鼓励培育本土的神父，只要他们能读拉丁文，即使他们不懂其含义，也可被祝圣为神父。罗主教在殷鐸泽（Prospero Intorcetta, 1626-1696）神父的支持下采取了行动，殷鐸泽神父在1687年成为耶稣会的会长。1688年8月1日，罗主教在南京祝圣了三位中国耶稣会神父：57岁的万其渊神父（Paul Bahnez, 1631 - 1700）、56岁的吴渔山神父（Simon Xavier a Cunha, 亦名‘吴历’，1632 - 1718），和60岁的刘蕴德神父（Blase Verbiest, 1628 - 1707）。²⁶ 刘神父曾是天文机关（钦天监??）的高官，南怀仁神父（Ferdinand Verbiest）为他付的洗。他在劝诫新神父的时候，说：“你是谁，竟能得到这样尊贵的司鐸职务？我又是谁，将要成为一位主教？因为我们是中国人的基督徒，我们得到了天主的恩宠而成为神父，我们是天主的侍奉者。我们假若是在欧洲，你们的耶稣会和我的道明会甚至很难认为你和我适合担任他们的看门人”。²⁷ 在随后的10月3日，罗文藻主教发了一份信函给圣座传信部，解释了他祝圣三位神父的理由。

在那些年里，他修复了他的神师，方济会会士，曾为他付洗的李安当神父（Antonio de Santa Maria Caballero）那荒废了的坟墓。

²⁶ 参阅澳门利玛窦学院，Culture, Art, Religion, Wu Li (1632-1718) and His Inner Journey, Macau Ricci Institute, 2006 (文化, 艺术, 宗教。吴历, 1632 - 1718) 及他的内心之旅。吴历也是一位著名的国画家和诗人，来自江苏常熟。

²⁷ 参阅 P. D'ELIA, Catholic Native Episcopay, op.cit., 第35页。

1690年4月10日，羅馬教廷將南京代牧區提升為一個教區，並任命了羅文藻為其正權主教。然而，上任還不足一周年，這位中國的首神父和首位主教在1691年2月27日去世。他被葬在南京雨花台公墓。在他死前，羅主教利用1688年授予他的職權，任命他的繼任者。他選擇了他的副主教余宜閣神父（Giovanni F. da Leonissa.）擔任南京教區主教職務。

吳漁山是羅主教祝聖的三位耶穌會神父之一，始終對主教懷着敬愛之情。他是一名優秀的詩人，在羅主教去世時寫了一首悼亡詩，“哭司教羅先生”：其中幾句原文如下：

嗚呼訃至今信死，慟哭先生東鐸始，
初日西歸七閩鄉，鬚鬢蒼蒼稱清偉，
適遭物議盡遣粵，轍環四方獨勞矣，
勳榮超世主教尊，所傳鐸品只三子，
鳴道辛盡各遠方，惟我追隨久於此，
詎料衝寒又離去，奄忽長逝如眠爾，
北望金陵千里天，再哭淚血成紅雨……

（白話文可譯為） 啊，一位新來的人告訴我這一噩耗，我為這首位東方主教的去世痛悼。你作為一位榮耀尊貴的主教，越過了世界，將司鐸職授予我三人。你在許多遙遠的地方傳教，辛勤地耕耘，唯獨我跟你隨你的時間最久。誰會想到你竟在這寒冷中離去；你安然去世，好像睡着了一樣。我望着北方恬靜的長空，不禁又大聲哭嚎，直到眼睛哭得紅腫不消。²⁸

羅文藻主教在他的一生面臨了兩大問題，一是中國的禮儀之爭問題，二是祝聖中國本土神職人員的問題。關於第一個問題，他並不像他的道明會同會修士那樣，嚴格遵守禁止中國祭孔祭祖禮儀，而他在遵守禁令的同時，也明確指出，如果禁令執行得太嚴格，中國的教會將失去一半的成員。雖然所有的傳教士都必須宣誓服從禁止中國禮儀的命令，但是，羅主教在某些情況下，會給予教友們一些寬免。他對禁令高度忠誠的同時，也在運用常識來處理這個問題。

關於祝聖中國本土神職人員的問題，我們已經看到，羅主教確信這是必要的。但是他仔細認真地挑選神職人員候選人。他更傾向於祝聖那些有教授教理經驗的，成熟的成年人，以及知識份子階層的人士。因為看到他的同胞們道德上的缺點，他建議慎之又慎，避免倉促行事；他認為，年輕人學習拉丁文固然很容易，但他們保持忠誠和貞潔會更困難。他承認，那時在當地要找到他的繼承人的合適人選非常困難。這可能是他選擇一位意大利傳教士作為他的繼任者的原因。

在1656年，也就是羅文藻被祝聖為神父的兩年後，道明會不再允許把中國的神職人員候選人祝聖為神父，這一禁令一直持續到十八世紀七十年代。

²⁸ 參閱澳門利瑪竇學院, *Cultute, Art, Religion, Wu Li (1632-1718), op.cit.*, 第 236-237 頁。

2.3. 17 世纪其他的中國神父²⁹

中國第一位耶穌會神父是鄭馬諾（鄭維信，Manuel de Sequeira, 1635 - 1673）。羅歷山神父（Alexandre de Rhodes, 1591 - 1660）于 1649 年把他帶到意大利。1651 年鄭馬諾在羅馬加入了耶穌會，1644 年，他被祝聖位神父。³⁰ 1671 年，甚至更早，他回到了中國。他的耶穌會會友們對這首位中國人耶穌會會士寄予厚望，但不幸的是，他不久就在 1673 年 5 月 26 日去世了。³¹

1623 年，耶穌會會士郭天庇（Francisco Pacheco, 1566-1626）在澳門為日本神職人員創辦了聖依納爵修院，後來被派往日本和中國的外國傳教士以及中國神職人員候選人也都曾就讀于該修道院。然而，這所修道院在 1701 年關閉了。只有在 1672 年，耶穌會的總會長 Paolo Oliva 神父（1600 - 1681）才批准在中國建立一個正式的初學院，為培育青年人將來成為神父。³² 于 1681 年，柏應理神父（Philippe Couplet, 1623-1693）前往羅馬，以促進陶成本土神職人員的事業。在澳門，“長上們決定，為了向羅馬展示優秀的中國神職人員候選人，應帶上幾位年青的中國人陪柏應理神父一同前往。起初，他們選了五位，其中有吳歷（Simon Xavier de Cunha），但是，在出發前，他們決定僅應讓兩位，最年輕的，進行這次艱苦的歐洲之行”。³³ 事實上，最終只有沈福宗（Michael Shen, 1658 - 1691）陪同柏應理神父到了歐洲。他于 1685 年加入耶穌會，並於 1690 年 10 月 9 日在葡京里斯本發了初愿。然而，他于 1691 年 9 月 2 日，在他返回中國的途中，也就是船到達今天的莫桑比克的前一天，不幸去世了。

1688 年 8 月 1 日，如前所述，羅文藻主教在殷鐸澤神父的推薦下，祝聖了萬其淵神父、吳漁山神父和劉蘊德神父為中國耶穌會神父。吳漁山神父是著名的畫家和詩人，他在澳門聖保祿學院接受神學訓練期間，也創作了傑出的中國基督徒讚美詩：他在上海工作了 30 多年。劉蘊德神父主要在上海和南京工作，萬其淵神父則先後在浙江和福建工作。但萬其淵神父的事件卻造成了一些問題。1689 年初秋，萬神父“跳過上海耶穌會會院的圍牆，一夜失蹤”。次年 2 月，他出現在福建省北部，請求當地耶穌會士們的庇護和寬恕。這一奇怪事件的轉變引起了

²⁹ 被派往國外攻讀神學的中国神職人員的候選人，參閱賓靜，“清代天主教禁教時期中国天主教神職人員的海外培訓”，（*Training abroad of Chinese Catholic Clergy during the Prohibition against the Catholic Church in the Qing Dynasty*,）載“世界宗教研究”（*Studies in World Religions*）2015 年第 6 期，第 143 - 154 頁。

³⁰ 據其他消息人士透露，他是在葡萄牙的科因布拉（Coimbra）被祝聖位神父的。（據：澳門利瑪竇學院 Cultute, Art, Religion, Wu Li (1632-1718), op.cit., 第 19 頁。

³¹ P. D'ELIA, *Catholic Native Episcopacy*, op.cit., 第 34 頁。

³² 同上，第 23 頁。

³³ Theodore Nicholas FOSS, “The European Sojourn of Philippe Couplet and Michael Shen Fuzong, 1683 - 1692”, 載 J. HEYNDRICKS (ed.) *Philippe Couplet. S. J. (1623 - 1693) : The Man Who Brought China to Europe*, (Nettetal, Steyler Verlag, 1990), 第 122 頁。被庫普萊神父帶到歐洲的中国神職人員候選人還有 陸希言（1631 - 1704 年），他在 1682 年加入耶穌會，因為他不能掌握拉丁語，只能作修士。他後來在上海工作。

對殷鐸澤神父的一陣批評聲浪。殷鐸澤神父自己也感到受到了懲罰，承認這一事件“是一個災難性的事件”，這將促使他在今後需要格外謹慎行事”。³⁴

1691 年，伊大任主教 (Bernardo della Chiesa, 1644 - 1735) 在澳門祝聖耶穌會士何天章 (Francis Xavier a Rosario, 1667 - 1736) 為神父³⁵ 何天章神父當時年僅 24 歲，是那時中國耶穌會士最年輕的神父。他在南京舉行了他的首台彌撒，後在山西工作，是當時山西省唯一的一位神父。他於 1735 年 5 月 11 日在北京去世。³⁶ 中國耶穌會其他的神父是：龔尚石神父 (Peter Thomas of the Cross, 1666 年出生，1690 年由澳門主教祝聖，於 1745 / 46 年 12 月去世)，張依納爵神父 (Thomas Ignatius Zhang, 出生於江西，約在 1698 年去世)，郭若望神父 (John Pacheco Kuo, 生於 1668 年，他雖然是日本人，但是在中國被祝聖為神父的，且在中國工作。他於 1724 年在暹羅 (Siam) 去世)。此外還有沈福宗神父 (Michael Alfonso) 和豐塞卡神父 (Cajetanusa Fonseca)，他們兩位也是耶穌會神父，但他們是否是中國神父並不確定。

菲律賓的方濟各會錄取日本的神職人員候選人，但不錄取中國的神職人員候選人。1639 年，三位中國的神職人員候選人來到馬尼拉附近的聖方濟各會院，但沒有他們的進一步消息。到 1700 年底，中國神父的總數約為 10 位。

³⁴ Liam M. BROCKEY, *Journey to the East, The Jesuit Mission to China 1579 - 1724* (東方之旅, 耶穌會中國傳教事業), Harvard University, The Belknap Press, 2007, 第 151 頁。

³⁵ 參閱 John W. WITEK, "Confucian Practices and Christian Principles in Qing Period : a Jesuit Pastor, Francis Xvier do Rosario, 1667-1736"(在清朝時期的儒家實踐和基督教原則：耶穌會主任司鐸何天章神父 1667 - 1736), 載 Lu An - P. Vanhaelemeersch (編輯), *Silent Force: Native Converts in the Catholic China Mission* (沉默的力量：中國天主教傳教事業中本土的新教友), (Leuven: Ferdinand Verbiest Institute, 2009), 第 59 - 70 頁。

³⁶ P. D'ELIA, *Catholic Native Episcopacy*, op.cit., 第 34 - 35 頁。

第三章

建立修道院

3.1. 位于暹羅 (Siam) 的巴黎外方傳教會的修道院

1664年，在暹羅首都大城府兩位法國主教，郎主教和陸方濟兩位主教（Lambert and Pallu）根據羅馬的指示，決定為來自遠東各國的修生們開辦一所“總修院”。於1665年5月25日，他們正式向泰國國王拉瑪提波迪三世（Somdet Phra Ramathibodi III, 1633 - 1688）提出建立神學院的請求。國王納萊（Narai）賜給他們湄南河附近的一大片土地。因此，1666年他們在大城府建了一所修道院，名叫聖若瑟修院。國王要求修道院接受10名暹羅學生，以便他們學習歐洲語言。神學院的其他學生來自果阿、澳門、印度支那和交趾（越南北部一地區）。佩雷斯（François Perez）是最早畢業的兩位神父之一，他的父親是菲律賓人，母親是暹羅人，他於1668年被祝聖為神父。³⁷ 1670年，來自暹羅、中國、安南、印度、中國和日本的33名大修生和50名小修生加入了該修院。該修院通常被稱為“總修院”（Collège Général）。它的標準可以與歐洲的那些修道院媲美，從它的學生平托（Anthony Pinto）就可以證明這一點。他在教宗諾森十一世面前發表了一篇精彩的神學論文後，他被批准立即被祝聖位神父。1675年，拉諾神父（Louis Laneau, 1637 - 1696）被任命為暹羅的宗座代牧，並於1674年3月25日被祝聖為主教，並成為這所修院的院長。

1679年至1680年，這所總修院搬到了馬哈弗拉姆（Maha Phram，現名叫 Amphur Bang Ban）地區較大的地方，並更名為“聖天使修院”。國王納萊在那裡為學院恩賜了一塊土地，以村舍的形式建造，學院開始時有30位年青修生。1865年前後，國王的希臘顧問法烏爾康（Constance Gerachi, 1647 - 1688）探訪了馬哈弗拉姆地區。他想把修院搬回大城府。他很快安排一處土地，求得國王恩准。1688年，暹羅革命事件見證了法國軍隊從暹羅被趕出，拉諾（Louis Laneau）

³⁷ 1687年2月5日，他被任命為安南的宗座代牧，1691年7月29日被祝聖為布加教區（Bugja）的主教。他於1728年9月29日去世。

主教，以及修院一半的修生被監禁。1692年4月25日，神父們被釋放並返回修院。他們發現修院家具已經被一掃而光。於是，他們又搬回馬哈弗拉姆繼續上課。1713年後，隨著來自交趾（越南北部一地區）和中國修生的大量涌入，修生人數再次增長。與此同時，在大城府（Ayutthaya）為修生建起了一座新建築，可容納50多位的修生團體食宿。1767年，由於國內動亂和緬甸人入侵暹羅首都，總修院不得不從大城府轉移到位於安南（今越南）的洪達（Hon-dat），1769年又被轉移到位於法屬印度的**本地治里**（Pondichery）附近的維拉帕特南（Virampatnam）。後來，於1781年，因為戰爭、革命和其它原因，總修院被迫關閉。

從1666年到1682年，共培育了39位修生：其中交趾（Tonkin，越南北部一地區）11位，安南8位，馬尼拉3位，孟加拉國1位，暹羅3位，中國1位。其他的是葡萄牙、緬甸或日本人的後裔。多年來，聖座傳信部每年資助1000埃斯庫多（escudos，葡萄牙貨幣）。那里的中國修生並不多。1710年，有七位中國修生從雲南派往這裡。因此，中國的修生便後繼有人了。

到1760年，只有兩位中國修生被祝聖為神父。但不久，該修院幾乎完全變成了一所中國修院。因為當地天氣太熱，很少有來自其它地方的修生。大約在1770年，該修院有中國修生29位。到1781年關閉之前，該修院總共有17位中國修生被祝聖為神父。

1807年，有一位來自澳門的新長上羅利維神父（Michel Lolivier, 1764 - 1833），他帶著五位修士來到馬六甲半島的檳城（Penang）。這個地區在1786年已成為英國的屬地。第二年，這所修院在浮羅池滑（Pulau Tikus）開始了新生活，共有20位中國修生。不久，其它國家的修生們也紛至沓來。由於貧窮和缺少來自法國的教授，他們在頭幾年過得很艱難。一些傳教士在去往傳教地的路上，也曾為這些修生提供過臨時的服务。該修院儘管有這些困難，但在面對苦難時，他們那種堅定而熱情的精神總是占了上風。修院的許多修生都來自遭受迫害的傳教地，他們在不久後還要返回到那里；這樣，這便使這所修道院不僅成為培養神父——而且成為培育殉道者的溫床。

到1845年，在檳城陶成的中國神父，包括在暹羅陶成的17位，神父的總數已達50位左右。³⁸

3.2. 最優秀的中國修生

大城府的修院中，最傑出的兩名中國修生是李安德（André Ly, 1692 - 1774）和黨懷仁（Antoine Tang, 1695 - 1744）。1703年，巴黎外方傳教會的白日升神父（Jean Basset, MEP, 1662 - 1707）從西安回來，途經陝西南部的漢中。他從成都招募了三位二十多歲的男青年，他們都決心獻身於為教會服務，極有可

³⁸ 參閱 Gennaro NARDI, *Cinesi a Napoli*, op.cit., 第402頁。

能作為教理教授員，另外還有三位年齡在七歲至十二歲之間的男孩（李安德、黨懷仁和徐德望），白日升神父將訓練他們為教會服務...³⁹

這些修生在梁宏仁神父(Francois Martin de la Baluere, 1668 - 1715) 的監護下開始了他們的學習。他們早期的訓練包括學習拉丁文和“儒家四書”。他們的課程很嚴格。除了學習，他們還完成指定的其它任務，如：管理教堂的聖物、做園丁和幫廚工作。這些工作每次都讓他們從書本離開好幾天，但這使他們取得了很好的進步。後來，這兩位法國傳教士不得不離開四川，和他們的修道生一起去了廣州。在那里，白日昇神父於1707年12月突然去世，梁宏仁神父因為他拒絕申請帝國票證，即在中國居留的許可證，而被迫前往澳門。他帶著兩個修生，於1708年3月抵達澳門。

當時在澳門的教宗特使多羅(Tournon)，在聽取了教區和修會神職人員的意見後，（除了梁宏仁神父以外，所有的人都持反對意見）圖農決定對李安德和黨懷仁舉行（接受神品前的）削髮禮。梁宏仁神父於1713年從澳門被驅逐出境，但他帶著他的學生秘密返回四川。他們在成都發現了教理教授員張鳳(Linus Zhang, 1669 - 1743)，在他們缺席的八年里，他一直照顧著教友們。幾個月後，梁宏仁神父死於肺炎。臨死前，他向李安德吐露心聲：“安德，我請求你聽從教理教授員張鳳的命令……”

李岱(Philibert Le Blanc, 1644 - 1720)於1696年被任命為雲南省的宗座代牧，負責照顧修生們。1717年，他把7位中國修生送到暹羅的修院。其中有李安德和黨懷仁。在大城府郊區的修院蓬勃發展。院長是羅斯特神父(Andrew Roost, ? - 1729)，他是巴黎索邦(Sorbonne)大學的畢業生。中國修生的到來增加了修生的數字，因此，在1718年已有50位修生，被分成六個班。課程包括：哲學、神學、古典文學、拉丁文和東方語言。1725年，陸主教(Louis Champion de Cicé, 1648 - 1737)是暹羅(Siam)的宗座代牧，他把(33歲的)李安德和黨懷仁祝聖為神父。⁴⁰

更多的中國修生繼續被送往暹羅。其中就有朱里官(Adrian Zhu, 又名：朱興義)。他的父母是福建的基督徒。他晉鐸後，在自己的家鄉工作了將近一年，但於1752年8月，他和一名教理教授員一同被監禁。朝廷把他流放到山東省西北部。北京的耶穌會派了一位基督徒醫生到他那里開了一個藥店，他在那里悉心照料朱神父。後來，將軍蘇若瑟(Joseph Su)被派去掌管山東。遵照耶穌會士的建議，他邀請朱神父來為他們修理鐘表。但實際上，將軍是讓他為基督徒施行聖事。然而，朱神父於1785年3月再次被捕，並被押送到北京。然後，他

³⁹ R.E.ENTENMANN, "Chinese Catholic Clergy and Catechists in Eighteenth-Century Szechwan: 李安德(1692-1774), 黨懷仁(1695-1745)和徐德望(1694-?)", 載 *Actes du VI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e Sinologie*, Chantilly 1989 (Paris 1995), 第395 - 396。參閱 *André Ly, Sichuan, Cronique d'une Mission aux XVII^e siècle*, *Journal d'André Ly* (Colette Donet 譯, 2015年, Paris, Ed. You Feng, 第10 - 13頁; 也引用白日升神父(Jean Basset, 1662 - 1707)的日記。

⁴⁰ 參閱 Jean P. CHARBONNIER, *Christians in China* (中國基督徒)(San Francisco: Ignatius Press, 2005年), 第278頁。

和其他一些神父被流放到伊犁，1785年12月，朱神父在那里去世。

3.3. 中國神父和四川的第一所地方修道院

李安德神父于1692年出生在陝西省漢中宗座監牧區。他的家人似乎在明朝华北傳福音初期就信奉了天主教。如前所述，他是在小的時候由白日昇神父把他帶到四川來的。梁宏仁神父首先给了他文化训练，包括學習拉丁文。在澳門，李安德跟随巴黎外方傳教會的傳教士何神父（Pierre Hervé, ?- 1710）繼續學習，何神父是继多羅主教之後來到澳門的。那時，康熙皇帝將他驅逐出北京。1717年，李安德从澳門被派到大城府的修院。他留在那里约十年之久。1726年，他离开那里去了廣州，在9月份到达廣州。巴黎外方傳教會给他生活费。从廣州，MEP的會長代理人把他派到當時由法國人管理的福建省興化地區。1726年12月1日，他與一位张神父（Thomas Sanchez Zhang）在那里开始了他的使徒傳教生涯。1729年，當迫害蔓延到那个地區時，他到靠近漳州市的林通小社區去避難。

1731年，他病了，回到廣州治病，稍事休息。然後，他被派往四川工作，但是，那里的宗座代牧穆天尺（J. Müllener, 1673 - 1742）沒有接受他。于是，在途中，他就在湖廣工作了一段時間。後來他被四川接受。當李神父抵达成都時，全省有兩位遣使會的中國神父，苏宏孝神父（Paul Su, 1691 - 1770）和徐德旺神父（Stephen Xu, 1694 - ?）。⁴¹ 第二年，另一位曾在拿坡里聖家修院學習的中國神父加入了他們的行列。他是顧耀文神父（顧若翰，1701 - 1763）。1740年，他的老同學黨怀仁（Antoine Tang）也來到了四川。由于1746年的迫害，歐洲的神父們被流放到澳門，苏神父和顧神父离开了該省，許神父搬到了湖廣。黨神父已經去世。因此，李神父成為四川唯一的使徒。然而，一位年青的神父李世音（Lukas Li, 1719 - 1798）很快加入了他的行列。1742年至1763年，李安德神父用优美的拉丁语寫了他的日記。1756年，為父母們“將自己的儿子奉獻給聖教會”，他起草了一份合同書樣本。

1735年，來自暹羅的兩位神父：傅瑪竇神父（Matthew Fu, ?- 1749年）和张神父（Michael Zhang, ?- 1744）从暹羅來到福建，幫助张神父（Thomas Sanchez）。1759年至1767年間，另外四位中國神父抵达四川，他們都是在大城府接受的陶成，但没有一人是四川省本地人。他們分別是严己益（Thomas Yan, 1721 - 1795）、曾林梅（Paul Zeng, 1731 - ?）。然而，郑神父（Paul Zheng）和严嘉祿神父（Charles Yan, 1730-?）在到达後不久就被逮捕，並被流放到福建，而顧瑪竇神父（Mattheus Gu, 1732-?）則返回了廣東。

李安德神父首次尝试在中國开办一所修道院。1763年，他在一个基督徒社區退休，在他艱苦卓絕的人生最後十年里，他致力于培养年青人成為神父。

⁴¹ 穆天尺主教（J. Müllener）将他们祝圣为遣使会的神父（见后面内容）。

此時，李安德神父几乎完全失聰，无法照顧基督教社區。但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對他看好要成為神父的修生們的教育中去。他建立了一所別樣的神學院。1765年，他住在离成都不远的一座山上(凤凰山)，附近有一个大约700人的基督教社區。一位教友刘馬谷向李神父捐獻了一处房子。這所房子，之所以被稱為四川省第一所修道院，不是没有理由的。它鋪着稻草，家具簡陋，李安德神父把它比作白冷郡的馬廐。沿着同樣的思路，他把當時有7位修生的修道院稱為耶穌聖誕修道院。這位老人在苦難中表現得相當沉着冷靜，在祈禱中熱情洋溢。他在傳教士中名聲鵲起。⁴²

李神父給他的學生們講授天主教教義和拉丁文，以及歷史，地理和中國文學。五年後，因為當局的迫害，他被迫關閉了神學院，但至少有四位修生最終被祝聖為神父。⁴³ 到1770年，儘管神父住得地方是私宅，他还是有人向總督告發，總督強迫房主拆掉他租給神父的房子。並下令讓李神父搬走。這位老神父不得不順從，於是，他的修生們被送往暹羅。他隱退到一個村庄，1774年1月23日，他在雙椏子去世。

3.4. 拿坡里的聖家修院

馬國賢神父 (Matteo Ripa, 1682 - 1746)，是一位意大利的教區神父，1711年，宗座傳信部將他派往中國，他曾在清朝宮廷擔任繪畫和雕刻師。在他到達北京的幾年之後，意識到有必要陶成中國本土的神職人員。1714年，他請求羅馬教廷批准他開辦一所小修院的計劃。教皇克勉十一世 (Clement XI, 1649 - 1721, 自1700年起在位) 明確而莊嚴地授權他：“...你的這個計劃是在這個遼闊的帝國中，穩固建立基督教，並把它從一個外國宗教變成一個本地宗教的唯一途徑...”⁴⁴

儘管受到了幾位傳教士的批評，他还是在朝廷里召集了一些學生，開始教他們天主教教義。後來，當他離開中國時，他也帶走了他的這些學生。1724年11月20日，馬國賢神父携5位中國留學生抵達意大利拿坡里。⁴⁵

⁴² 參閱 Adrien LAUNAY (編), *Journal of André Ly, 1746 - 1763*. 拉丁文本 (香港, 拿撒勒出版社, Nazareth Press, 1924), 第 xxi 頁。

⁴³ 參閱 R.E. ENTENMANN, “Chinese Catholic Clergy and Catechists in Eighteenth-Century Szechwan” (十八世紀四川天主教神職人員與教理講授員), 載於 *Actes du VI^e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e Sinologie*, 1989年6期 (Paris, 1995), 第397頁; R. G. TIEDEMANN, “The Controversy over the Formation of the Indigenous Clergy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atholic Hierarchy”, 載於 R. Malek - G. Cliveller (eds.) *Light a Candle, Encounter and Friendship with China* (Sankt Augustin, Institute Monumenta Serica, 2010), 第342頁。

⁴⁴ 參閱 G. NARDI, *Cinesi a Napoli...*, op. cit. 第388頁。

⁴⁵ 他們是: 谷文耀 (John Gu, ca. 1700-1763), 尹若望 (John Yin, ca. 1704-1735), 黃 (Philip Huang, ca. 1711 - 1776), and 吳 (Lucio Wu, ca. 1712 - 1763) 和他們的老師。

于“在耶穌基督聖家的名稱下，聖部為中國人建立大學的奠基歷史”（Storia della Fondazione della Congregazione e del Collegio dei Cinesi sotto il titolo della Sacra Famiglia di Gesu Cristo）的論文中，他寫道：“很久以來，我就想建立一所修道院，為向外教人的福傳事業提供服務。1714年，我着手在中國創辦一所修道院。但是，由於種種障礙，我未能成功地實現我的願望。現在，在天主的特別幫助和恩惠下，我和五位中國學生安全地抵達歐洲，我在北京一直支持和指導他們。為了光榮天主，我希望能和這些中國人一起，並在那不勒斯聚集一些教區神職人員，這些神職人員都覺得自己肩負着向外教人傳教的使命，為完成這一使命，我決定竭盡我的綿薄之力。”

1734年，**聖家修院**首批畢業的兩位年青神父，分別是谷文耀（John Baptist Gu）和尹若望（John Evangelist Yin），他們被派往四川工作。他們於1734年9月10日離開**拿坡里**，裝扮成水手的模樣，經過漫長和危險的航程，於1735年8月抵達澳門。8月31日，他們從澳門通知馬國賢神父他們的到埗。耶穌會神父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 1665 - 1741）也在一封信中把他們到來的消息告訴了馬國賢神父。由於教宗允許把中國本土的神職人員候選人祝聖為神父，所以，即使候選人不懂拉丁文，耶穌會仍然祝聖了四位神父。

不幸的是，尹神父於1735年9月15日在前往四川的途中去世，而谷神父則達到了目的地，並先後在四川和北京工作，直到1763年1月25日去世。⁴⁶

1751年7月26日，**聖家修院**又有四位中國神父離開**拿坡里**回國，他們分別是趙道明（Dominic Zhao）、趙西滿（Simon Zhao）、郭若瑟（Vitale Joseph Guo）和蔡保祿（Paul Chai）。1755年10月，隨後，又有另外三位神父到來，他們分別是李若瑟（Joseph Lucius Li）、大劉碧岳（Pius Liu, senior）和小劉碧岳（Pius Liu junior）。在1869年，意大利政府關閉該學院時，這裡已有106位中國神父從這裡畢業。

從1773年耶穌會會士被壓制，一直到1838年意大利方濟各會會士受托建立了一個新的宗座代牧區，在這段時間，幾乎都是由**聖家修院**培養出的中國神父們，確保了華中地區（湖廣）天主教社區的牧靈工作。⁴⁷

3.5. 耶穌會會士的培育新風

耶穌會士繼續他們的政策，培訓本土的神父成為他們的成員。在整個關鍵的18世紀，幾位由耶穌會會士陶成的本土神父對中國教會的幫助最大。他們不會像歐洲人那樣很容易被辨認出來，因為他們更容易掩護自己，而且他們可以設法麻痹官員們的警惕性。但是在雍正王朝（1723年）初期，中國只有四、五位神父，而且他們都是年邁的神父。迫害使傳教士更深刻地認識到，迫切

⁴⁶ 同上，第367-369頁。

⁴⁷ 參閱 J.P. Charbonnier, *Christians in China*, op.cit., 第270頁。

需要培养本土神職人員。几年後，也就是在 1733 年，我們又發現了十多位中國神父。他們曾在澳門或北京，从葡萄牙或法國耶穌會會士那里，接受過宗教的和神父職務的培训。後來，一些年青的中國人不僅被送到澳門，还被送到果阿，或者羅馬的羅馬學院，或者巴黎的聖路易大學（Louis-Le-Grand College）。其中五位在 1740 年去了法國，其他人隨後在 1754 年也去了法國。他們學習法文和拉丁文，哲學和神學，在法國加入了耶穌會，被祝聖為神父，然後回到中國。他們在那里孜孜不倦地工作。耶穌會會士們目标更远大。為了扩大和巩固這一被認為是最重要的工作，他們决心要在中國本土开办严格意义上的一所真正的修道院。但是，耶穌會很不幸（後來遭到攻击，不久之後，在 1773 年被禁止）导致了這個計劃的失败。⁴⁸

1717 年，范守义神父（1682 - 1753）在意大利被祝聖為神父。艾逊爵神父（Giuseppe Provana, 1662 - 1720）是耶穌會派往康熙皇帝的使者，1708 年，范守义陪伴這位使者去见教宗。1709，他加入耶穌會，並於 1720 年返回中國。⁴⁹

1728 年，耶穌會士成功地在澳門开办了一所修道院，名為聖若瑟修道院。那時，耶穌會的代表紀類思神父（Louis de Sequeira）寫道 1728 年 2 月 23 日，耶穌會中華省的神父們，奉副省會長楊若翰神父（Joao de Saa）的命令，从聖保祿堂迁移到聖若瑟堂的新居。

1622 年，Jorge Miguel 先生在聖奧斯定教堂附近建造了這座住宅，由兩座房子组成，供他和他弟弟居住。到 1732 年，這座住宅被稱為聖若瑟神學院。陈若望（John Francis Chen）于 1738 年在澳門被祝聖為神父，隨後，陈伯鐸（Peter Chen）于 1740 年被祝聖為神父。1730 年 5 月 27 日，聖若瑟修院的院長秉多神父（Manuel Pinto）要求政府给他一座名為馬托莫菲諾（Mato Mofino 崗頂??）的小山，這里將附属于聖若瑟修院。這一請求于 1730 年 6 月 21 日获准。聖若瑟教堂于 1746 年奠基，1758 年完工。修院的管理權先後經過了許多人的手：1728 年到 1762 年由耶穌會士管理，1762 年到 1784 年由教區神職人員管理，1784 年到 1856 年由遣使會的神父管理。遣使會也用這里培训他們自己的會士。⁵⁰

神父的候选人也在北京接受陶成。1729 年 10 月 10 日，宋君荣神父（Gaubil）寫道：在那里，他必須對即將被祝聖為神父的兩位老教友教他們阅读拉丁文。1732 年 6 月 13 日，這位神父又寫道：“有一位非常聰明、优秀的滿清官員，他身為基督徒，既没有妻子也没有孩子，已經退休，住在我們這里，我們要接纳他入我們的修會，让他做好成為神父的准备。我們都認為他是一个很好的人选”。那時，在北京的法國耶穌會士得到了三位中國同會神父的幫助，其中兩位曾在直隸和江西傳教。1754 年 9 月 17 日，宋君荣神父从澳門寫道：“要尽可能培养本

⁴⁸ 参阅 P. D'ELIA, *Catholic Native Episcopacy*, op.cit., 第 35 -36 页.

⁴⁹ 参阅 Paul RULE, “Louis Fan Shouyi and Macau”(“范守义与澳门”) 载于 *The Jesuits 1584 – 1994, Macau and China, East meets West, Review of Culture*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94), 第 249 - 258 页.

⁵⁰ 更多细节请参阅 Manuel TEXEIRA, *The Fourth Centenary of the Jesuits at Macao* (Macau, Salesian School, 1964), 第 27 – 29 页。

土的神父。傳教士應從他們的幼年起就開始培養他們，教他們拉丁文，並一点一点地指導他們從事傳教的工作。當他們到了一定的年齡，傳教士應把他們培養成教理講授員，考驗他們一直到 40 歲，並在這個年齡將他們祝聖為神父。”⁵¹ 因此，在 1741 年，五位中國耶穌會士繼續以極大的熱情和堅定的精神，在直隸省傳播福音。他們負責照顧着 4 萬多位已領洗的基督徒，僅憑他們自己，這幾位神父每年就為 1200 位成年人施洗。例如，范守義神父，他打扮成一個小販，機警和巧妙地扮演了一個偉大使徒的角色。⁵²

1740 年，耶穌會士派五位神職人員候選人前往法國，他們分別是劉漢良、蘭方濟、曹貌祿、陶某和康斐理。他們在完成學業和被祝聖為神父後，於 1750 年至 1753 年間返回中國。

同時，在 1751 年，另外兩名神職人員候選人，楊德望和高類思，被派往法國。他們分別於 1765 年和 1766 年回到中國。⁵³

1775 年，中國對耶穌會士的開始鎮壓時，那時已有 20 多位中國耶穌會士被祝聖為神父，其中一些人是在法國陶成的，特別是在 1749 年，但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是在中國陶成的。18 世紀下半葉，在中國，耶穌會士的大約三分之一是中國人，他們几乎都是神父。⁵⁴

1843 年，首批三位法國耶穌會士已在前一年回到上海，他們開辦了一所修道院。開始時有 22 位修生。第二年，又有 5 位外國耶穌會士來到這裡，1846 年又來了有 13 位。到 1848 年，上海地區的耶穌會傳教士的人數已達 37 位。

3.6. 遣使會會士的努力

駐重慶的遣使會傳教士為培養神職人員所作的努力也卓有成效。四川的宗座代牧穆天尺（J. Müllener）管理教會，1715 年，他在當地建立了一所小修道院。

1718 年至 1719 年，六位年青的中國修生和他們唯一的老師穆天尺住在一起，穆天尺準備把他們培養為神父。其中兩位已是神職人員，他們已接受了小品（五品以下的神品）。穆天尺教這些修生基本的倫理和哲學知識，但他向宗座傳信部抱怨說，16 歲和 17 歲的中國男孩不像同齡的歐洲男孩那樣決心堅持自己的聖召。他還要求傳信部為他的修院提供資金。每年撥給 100 個銀幣（斯庫多，scudi）就足夠支持修生們的所需費用了。由於他是一人獨居，而且一年的大部分時間里，他經常要在他那遼闊的省內旅行，所以他的實際工作十分有限。1722 年 3 月，八位中國青年被他們的父母送到穆天尺那里，和他住在一起。1725 年，

⁵¹ 參閱 P.D'ELIA 的摘錄, *Catholic Native Episcopacy, op.cit.*, 第 35 – 36 頁。

⁵² 同上, 第 48 頁; R.G. TIEDEMANN, "The controversy over the formation of an indigenous Clergy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atholic Hierarchy in China", a. c., 第 344 頁。

⁵³ 參閱見賓淨, "海外培訓... (Training abroad...)", a.c., 第 150 - 151 頁。

⁵⁴ 參閱 N.STANDAERT,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op.cit.*, 第 635 - 1800 頁。

穆天尺將他的修院迁往廣州，並計劃最終在澳門開辦。但是傳信部命令他在四川重建修道院，最後，在毕天祥神父（Appiani）的指导下，在廣州建立了另一所修道院，而不是在澳門。穆天尺（J. Müllener）回到四川，為大約十位青年男子建立了一所神學院，他從法國得到了 4800 個斯庫多。一些未來的神父被派往歐洲深造神學。⁵⁵

如前所述，穆天尺主教在 1725 年祝聖了三位中國神父：蘇宏孝（Paul Su, 1692 - 1770）、許德望（Stephen Xu, 1694 - ?）和朱伯鐸（Peter Zhu, 1729）。朱神父不幸於 1732 年 11 月 14 日死於肺結核。然而，穆天尺的繼任者，道明會的主教陸迪仁（Luigi Maria Maggi, 1744），由於對本土的神職人員有偏見，他關閉了該修院。

1746 年，遣使會會士德里格神父（Teodorico Pedrini, 1671 - 1746）在北京去世時，遣使會的官方消息稱：“我們在中國只剩下兩位神父，他們都是穆天尺主教的學生。”⁵⁶

1784 年 10 月 1 日，遣使會葡萄牙省的兩位遣使會會士：瓦倫特神父（Manoel Correa Valente, 1735 - 1804）和維拉神父（Giovanni - Agostino Villa, 1752 - 1803）來到澳門，從耶穌會會士手中接管聖若瑟神學院。

1788 年，在遣使會的羅廣強神父（Nicolas-Joseph Raux, 1754 - 1801）和吉德明神父（Jean-Joseph Ghislain, 1751 - 1812）抵達北京，接管被鎮壓的耶穌會的工作四年後，他們在北京開辦了一所修道院。但是，自 1792 年 12 月李若瑟被祝聖為神父以來，他們那時似乎沒有再取得進一步的成功。

1812 年以後，遣使會的中國神父薛瑪竇（Matthew Xue, 1780 - 1860），由於受迫害的緣故，他將修院的學生轉移到河北省的西灣子，並在那里定居下來。1820 年，薛神父把修道院的學生送到澳門聖若瑟修院，而當地的修道院於 1856 年在北京重新開放，當時那里的條件有所改善。⁵⁷

1820 年末，遣使會派了 6 位中國神職人員候選人到法國留學，幾年後他們回到了中國。在 1841 年，遣使會在江蘇省無錫市的湯灣開設了另一所修道院。在 1784 年至 1820 年，遣使會的傳教士中，只有 28 位神父來華，1820 年至 1830 年，他們又有 4 位神父來華。在湖廣，劉格來神父（St. Francis Regis Clet, 1748 - 1820）就是其中之一，他與八位中國的遣使會神父一起工作。1836 年，來華的董文學神父（St. John Gabriel Perboyre, 1802 - 1840）在一封信中寫

⁵⁵ 參閱 Claudia von COLLANI, “Per Pedes Apostolorum, Bishop Johannes Müllener, CM (Mu Tianchi) in Sichuan”, 載於 R. Lu An - P. Vanhaelemeersch, *Silent Force: Native Converts in the Catholic China Mission*, op.cit., 第 118 - 119 頁。

⁵⁶ 參閱 G. NARDI, *Cinesi a Napoli*, op.cit., 第 374 頁。Lorenzo M. BALCONI, in *33 Anni in Cina* (Milano: PIME, 1945), 第 108 頁。

⁵⁷ 參閱 R.G. TIEDEMANN, “The Controversy over the Formation of an Indigenous Clergy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atholic Hierarchy in China...”, a.c., 第 343 頁。

道：中國神父的總數約為 80 位，而近年來來華的外國傳教士只有 40 位。⁵⁸

3.7. 其它修會的首創精神

主要在福建省工作的道明會會士們，又開始推動祝聖本土的神職人員。1732 年，後來成為殉道者的西班牙人桑多祿主教 (St. Petro Sanz, 1680 - 1747) 敦促他在馬尼拉的道明會會長，要培養這樣的神職人員，特別讓他們為迫害時期做準備。⁵⁹

不久，中國學生被送往馬尼拉：三位來自福安，一位來自漳州。其中包括一位未來的殉道者，馮德 (John Baptist Feng de Santa Maria)。神職人員候選人被派往聖若望拉特朗學院，和聖多瑪斯大學攻讀，為被祝聖為神父做準備，費用由西班牙國王承擔。被祝聖為神父後，他們要回到福建工作。白多祿主教還把神職候選人蔡保祿派到那不勒斯的聖家學院學習。他於 1748 年被祝聖為神父。⁶⁰

馮德神父是中國的第二位道明會傳教士，他在 1744 年被祝聖為神父，1747 年乘船回福建。1753 年，他來到福建傳教，但於 1754 年被捕，關進了福安監獄。後來，他被流放到廣西，並於 1755 年 7 月 1 日去世。

第一位在 1747 年回到福建，最後一位是在 1771 年回到福建。回來的人包括：馮若翰 (Juan Bautista Fung, 1719 - 1761)、年伯鐸 (Petro Ngien, 1728 - 1797)、繆伯鐸 (Pedro Meu, ?- 1797)，徐文生 (Vicente Huy, ?- 1789)，羅西滿 (Simon Lo, 1728 - 1761)，徐斯德望 (Esteban Huy, 1731 - 1784)，年保祿 (Pablo Domingo Ngien, ?- 1797)，何本托 (Benito Ho / Hang, ?- 1795)，

⁵⁸ 參閱 Pontificium Opus a S. Petro Apostolo, *Una Porpora in Cina* (Roma, Instituto Grafico Tiberino, 1946), 第 24 頁。劉格來神父 (F. Regis Clet) 在 1820 年殉道致命，他在 1900 年和 2000 年分別被宣布為真福和封聖，1840 年殉道的董文學神父 (J.G. Perboyre) 也分別在 1899 年和 1996 年被宣布為真福和封聖。

⁵⁹ 1732 年 5 月 10 日，白主教 (Sanz) 寫信給道明會馬尼拉的省會長說，鼓勵本土人的聖召是非常有用的，因為在他們接受了良好的培育後，必會在傳教中結出豐碩的果實，尤其是在迫害時期。白多祿主教的請求由菲律賓的道明會轉交給民事當局。這一請求被提交到西班牙的法庭，國王在 1738 年 11 月 7 日在 *El Escorial*，通過王王室法令批准了補貼計劃。每名學生每年可獲得 100 比索，條件是在任何同一時候，修道生的人數不得超過 6 人：Miguel A. San Roman, "Fr. Juan Feng Wenzhi [馮文子，福安人], out and out Missionary in Diffcult Times" 載於 R. Lu An - P. Vanhaelemersch (eds.), *Silent Force: Native Converts... op.cit.*, 第 186 頁。

⁶⁰ 參閱 Jose Maria GONZALES, *Missiones Dominicanas en China* (Instituto Santo Toribio de Mofroejio, Madrid, 1952), 第 261 - 263 頁。在那那不勒斯聖家學院的中國學生的名單中，還提到了來自福建省的其他學生：蔡伯鐸 (Peter Ts'ai, 1739 - ?)，他在 1761 年進入該學院，並於 1766 年被祝聖為神父，任雅各 (James Jen, 1736 - 1762 年，他 1756 年進入該學院)，任文生 (Vincent Jen, 1757 - 1794，他於 1777 年，進入該學院，並在 1784 年晉鐸後，在湖廣工作)，任道明 (Dominique Jen, 1774 - 1832, 1795 年進入學院)，於 1806 年晉鐸。

王斐理(Felix Uang, ? - 1782), 以及约雅敬 (Joaquin de Santa Rosa, ?- 1782)。

⁶¹

回到中國的其他神父是：唐保祿 (Pablo Tang de la Cruz) 他于 1810 (?- 1820) 年回到中國。徐文生 (Vicente Huy de Santo Domingo) 在 1810 年 (?- 1832), 徐安東 (Antonio Huy del Rosario,) 在 1810 年 (?-1819), 康多摩 (Thomas Kang de Santo Domingo) 在 1819 年 (?-1827), 康若瑟 (José Kang de Santo Tomas) 在 1840 年 (?-1857), 徐方濟 (Francisco Huy de Santa Rosa) 在 1840 年 (?-1857), 以及杜方濟 (Francisco Tu, ?- 1895), 分別回到中國。⁶²

在 1734 年和 1762 年, 方濟各會的神父們都曾试图把神職人員候選人送到馬尼拉, 但没有成功。1729 年, 他們开始在太原附近召集一些學生, 但是, 只有郭维塔 (Vitale Kuo, 1711 - 1778) 在拿坡里學習後, 成功地晉鐸。18 世纪下半叶, 山西 - 陝西宗座代牧區在北京开设了第一所修道院。19 世纪初, 方濟各會在山西祁县村开设了一所修道院, 服务于陝西和山西兩省。1803 年、1804 年和 1810 年, 在那里举行了晋鐸仪式, 但在 1812 年, 由于迫害, 這座修道院暫時关闭, 1815 年又一次关闭。方濟各小兄弟會的主教艾若亚敬 (Giacchino Salvetti, 1769 - 1843) 不得不在 1824 年再次关闭這座修道院。他把修生們派往澳門。1835 年, 另一所小修道院在金立村开办。它在 1839 年关闭, 然後又重新开放。1844 年以後, 這所神學院只服务于陝西省。⁶³

巴黎外方傳教會主教, 博四爷 (Francois Pottier, 1726 - 1792) 自 1769 年起担任四川省的宗座代牧。在豁免學生學習拉丁文的情況下, 在 1777 年至 1791 年, 他祝聖了大约 10 位中國神父。其中包括在 1777 年祝聖的孙本篤神父 (Benedict Sun, 1747 - 1786) 和 1785 年祝聖的羅瑪竇神父 (Matthew Luo, 1750 - 1807)。

在博主教 (Pottier) 的领导下, 慕雅神父 (Jean Martin Moye, 1730 - 1793, 1734 年被列為真福)、艾神父 (Jean Gleyo, 1734 - 1786) 和韩神父 (Thomas Hamel, 1745 - 1812) 于 1780 年成功地在云南省龙溪开设了一所神學院。1787 年, 這所神學院迁至四川省落壤沟 (离叙府不远, 現宜宾)。這所神學院是一所為准备出國深造的預科學校。韓神父担任修院院長 32 年之久 (直到 1807 年), 共培养了 21 位中國神父。⁶⁴

随着龙溪修院的开办, 學校进行了重要的改革, 以便根据暹羅培养神職人員候选人的标准, 既向學生教授拉丁文, 又教授實際牧灵經驗。

⁶¹ 参阅 N. STANDAERT 的报告,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op.cit., 第 466 页。

⁶² J.M. GONZALES, *Historia de las Misiones Dominicanas de China, 1900 - 1954*, Ediciones Studium, Madrid-Buenos Aires 955, 第 448 页。因为名字是根据当地的发音写的, 所以很难猜出他们是谁。

⁶³ 参阅 Arnulf CAMPS - Pat - McCLOSKEY, *The Friars Minor in China* (中国小修士们), 1924 - 1955 (*General Secretariate for Missionary Evangelization, Rome 1955*), 第 24 页。

⁶⁴ *Repertoire des Membres de la Societe des Missions Etrangeres 1659 - 2005* (巴黎外方传教会成员汇编), Paris 2004 年。

在 1816 - 1819 年遭受迫害期间，修道院关闭了，修生們和个别的神父們，分別地在一起生活和學習。在那些迫害的年月，傳教事业失去了 2 位主教和 12 位中國神父。

後來，冯類思主教 (Louis Fontana, 1781 - 1838) 在四川盆地西部的天泉县重新开办了修道院。1836 年該修道院迁至宝興县登池沟，更名為“报喜神學院”。下面的這項研究资料記述了四川神職人員的情況：

在 18 世纪在那里服务的 33 位中國神父中，只有 20 位是本省人。此外，1750 年以前出生的 15 位中，只有 3 位是四川省本地人。其他人中，在 1759 年以前出生的人中，5 位是福建人，陝西、廣東、贵州，各有兩位，有一位谷耀文 (John Baptist Gu) 神父，他是北京人…赵思定 (Augustinus Chao)，贵州人，1774 年皈依基督，在這一群体中，他是唯一一位不是从小接受天主教教育的神父。他在 1815 年殉道致命…。至少有兩位神父：唐安東 (Antonius Tang) 和苏保祿 (Paulus Su)，是教理講授員的儿子。

這種寬免安排(祝聖只能读‘而不必懂’拉丁文的中國本土人為神父)在 18 世纪晚期的四川，偶尔藉此寬免安排來祝聖神父。其中至少有六位是在不懂拉丁文的情況下被祝聖的。1781 年，時任四川教區宗座代牧的博四爷 (Francois Pottier)，尽管有某些保留意见，他仍祝聖了三位這樣的神父。若不是那些训练他們的傳教士們的恳求，他是不會祝聖他們的。1 排後來，羅馬教廷對四川六位只受過“非拉丁文”训练的神父，只授予他們十年举行还愿弥撒的權力，直到他們學會了更多的拉丁文和規則為止。除了一个人例外，這樣任命的神父都是在中國接受训练的，要么是由傳教士私下里培训的，要么是在龙溪和洛瀼沟的神學院里培训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些中國神父，尤其是那些在海外留學多年的神父，竟對自己的母语不能运用自如。1759 年，波蒂埃注意到，新來的中國神父严多默 (Thomas Yen Zhiyi) 需要學習更多的漢字。严神父是福建人，他也不太懂當地方言，聽告解有困難。唐百荣 (Stephenus Tang) 曾在本地治里 (Pondichery, 印度南部一地區) 留學八、九年之久，當他在 1775 年回國時，只能記得“一点点漢語，”。中國神職人員的核心職能是非神職人員无法履行的職能：举行弥撒、聽告解、為病人傅油和举行婚配聖事。由于神父人數不多，要走很遠的路，他們執行這些職責就變得復雜。李安德在他的日記中提到了 130 个這樣的社區。因為他們分布在一個和法國一樣大的省份里，神父必須不斷地奔波，為教友們服務。1757 年，他訪問了 37 个天主教社區。而大多數的教友不可能經常接觸到神父。1782 年，法國神父博四爷報告說，一些教友已經有七、八年沒有見過神父了。這意味着教友們很少有機會參加聖事。例如，許多婚姻都沒有在教會為其施行婚配聖事下舉行……中國的神職人員還負責教會的許多世俗事務，而這些事務是歐洲神職人員无法公開進行的。例如，1741 年李安德 (André Ly) 和唐安東 (Antoin Tang) 簽署了在成都買房的合同；1743 年，苏保祿 (Paul Su) 買下了毗鄰教堂的夏四乡社區一塊價值 130 銀元的土地。苏保祿還對一名有地位的人提起了訴訟，因為這個人試圖在成都附近的双樣子搶占教堂的土地。

在世俗當局的眼中，獨身主義是可疑的；因此，中國神父有時聲稱自己是

鰥夫，尽管馬青山 (Joachim de Martiliat, 1706-1755) 反對，苏保祿、唐安東和李安德都曾收養過兒子，根据羅馬法律，只有已婚男子或鰥夫才能收養兒子。

幾十年來，中國的神職人員，至少是那些接受過巴黎外方傳教會 (MEP) 培訓的神職人員，都得到了該修會的補貼。在 18 世紀 40 年代，李安德和唐安東每人每年要得到 80 兩，相比之下，法國傳教士的每年得到 120 兩，教理講授員張夙 (Linus Zhang) 的每年得到 30 兩。1760 年，博四爺主教得知，法國的該修會正在考慮終止對不是該會成員的中國神職人員的補貼。於是，他們將只能仿照在交趾 (越南北部一地區) 越南神職人員的先例，依靠本國基督徒的捐助……到 1781 年，中國神職人員完全靠中國天主教徒的支持，不再接受法國教會的補貼…⁶⁵

總而言之，“當傳教士們一旦發現他們認為適合做神父的年青人時，他們就把他們送到修道院。穆天尺 (J. Müllener) 把他們托付給那不勒斯的聖家中國學院；馬青山和博四爺則把他們委托給暹羅的總學院。其中，有 8 位在 1720 年至 1749 年間被祝聖為神父，另有 8 位在 1725 年至 1777 年間被祝聖為神父。因此，從傳教開始到 1777 年，也就是長達 137 年的時間里，總共有 16 位中國神父參加了傳教工作，後來，從 1777 年到 1813 年，也就是說，在 32 年的時間里，有 39 位修生被祝聖為神父”。⁶⁶

3.8. 羅馬的傳信大學

毫無疑問，傳信大學在 1627 年成立之初，主要從周邊國家招收學生，以便日後將他們送往“全球各地” (universum terrarum orbem)。第一個登記的學生來自阿爾巴尼亞，後來，他以尊貴的主教身份和使命回到了他的祖國…⁶⁷

從 1627 年到 1700 年，羅馬的傳信部大學接收了大約 450 位學生，其中只有 6 位來自中亞，12 位來自中東，2 位來自非洲。從 1700 年到 1815 年，共有 635 位學生在該大學學習，其中 37 位來自中東，1 位來自越南，65 位的國籍不明。⁶⁸

最可能的是，傳信大學不接受來自遠東的學生，因為那不勒斯的聖家學院，和暹羅（後來在檳城）的巴黎外方傳教會的修道院，是為遠東的學生而設的。然而，另一個原因可能是，傳信部在遠東的宗座代表已經開始在他們自己的修道院培訓修生。目前還不清楚是什麼時候開始的，但是教宗特使多/鐸羅 (Charles Maillard de Tournon, 1668 - 1710) 於 1705 年在廣州設立了傳信部代理處，

⁶⁵ 參閱 E. ENTENMANN, “Chinese Catholic clergy and Catechists in Eighteenth-Century Szechwan”, a.c., 第 398-403 頁。

⁶⁶ 參閱 Adrien LAUNAY, *Histoire des Missions de Chine, Mission du Se-Tchoan (中國和四川省傳教史)* (Paris: P. Tequi, 1920), 第二卷, 第 274 - 275。

⁶⁷ 參閱 Maksimilijan JEZERNIK, “Il Collegio urbano”, 載於 J. METZLER (ed), *Sacrae Congregationis de Propaganda Fide Memoria Rerum*, vol. I/1, op.cit. 第一卷 / 1, op.cit., 第 470 頁。

⁶⁸ 同上, 第二卷, 第 288 頁。

他想要在馬尼拉與當地大主教合作开办一所修道院，培訓中國神父。他想要把這所修道院命名為做聖伯多祿修院。但是西班牙國王不允許建立這所修道院。⁶⁹

根據傳信部的指令（*instruções ad munera apostolica rite abunde peritiles Missionis Chinae, Tunchini, Cochinchinae atque Siami addomdatae a Missionariis S. Congregationis de Propaganda Fide, Romae* 1807），傳信部遠東地區的代表們要盡其所能培訓本地的神職人員。1842年，在香港建立了宗座代表處，由於這違反葡國王對保教權，葡萄牙當局便把宗座代表若瑟（Theodore Joset, 1804 - 1842）驅逐出澳門。若瑟悲嘆道：

然而，更使我感到痛苦的是，驅逐令不僅牽涉到我本人，僅僅認為我是罪犯，但是，這對我所有的同事都造成了前所未聞的嚴重傷害。其中包括兩位神父和 20 多位神學院的學生。⁷⁰

這裡提到的兩名神父分別是裴神父（Antonio Feliciani, 1804 - 1866），他是一名意大利方濟會會士，曾在宗座代表處協助若瑟神父，另一位神父是潘神父（Luke Pan, 1772 - 1843），他曾是拿坡里聖家修院的學生，在神學院協助若瑟神父的工作。他們於 1842 年 3 月 3 日抵達香港，先在一間小屋瑞安頓下來，但位於灣仔第一個公墓上方的磚房一完工，他們就搬到了那里。由於環境困難，空間不足，他們決定派四位修生到意大利繼續學習。留下的修生之一，會說廣東話的羅多默（Thomas Lo），被委任負責建設傳教會的房屋和教堂。8 月底，當傳教會的建築幾乎完工時，修生們就搬到了那里，但只住了很短的時間。由於他們身體不好，決定又把他們送回原來的住處。羅多默留了下來，但他的健康也不好，並於 1844 年初去世了。⁷¹

⁶⁹ 參閱 G. NARDI, *Cinesi a Napoli*, 在已引用的作品中，資料來源是“梵蒂岡秘密檔案”（the Vatican Secret Archives）Albani 249, 第 117 - 144 頁，以及“SCEP 檔案”，*Scritti rif, nei Congressi Indie orientali e Cina*, IX 第 466 - 468 頁，X, 第 97 - 100。915 頁。

⁷⁰ 參閱 Joset > Propaganda, 18-04-1842 (HK-CDA, Sec. II Box 1)。

⁷¹ 參閱 田英杰（Sergio TICOZZI）“香港天主教掌故”/ *Historical Documents of Hong Kong Catholic Church*（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館，1997），第 64 頁。

附錄一：中國神職人員人數

从天主教傳入中國伊始，到 19 世纪初到中叶，中國神父的總數約為 250 位。

1723 年，中國有四、五位老年神父，到 1733 年，這一數字已超過十位。他們分別在澳門和北京受耶穌會會士，和在四川受遣使會會士，培育而陶成的。⁷²

1775 年，大約有 25 位中國神父生活在中國，19 世纪初，有 33 位。1810 年，他們的人數增加到 35 位，而外國傳教士的人數為 78 人。

1815 年，中國神職人員有 30 位，外國神職人員有 80 位。

1842 年签订“南京条约”時，中國神父有 130 位，1848 年，16 个教會轄區共有 84 位外國傳教士和 135 位中國神父。⁷³

特别是关于耶穌會會士：*在前兩個世紀（1582 - 1780 年）在中國服務的 456 位耶穌會會士（神父和修士）中，有一位來自東京（越南北部），81 位（其中 48 位是神父）來自中國。1754 年，在中國居住的 48 位耶穌會會士中，有 13 名是中國人（10 位神父、2 位經院哲學家，和 1 位修士）。約在 1773 年，也就是耶穌會被鎮壓的那一年，耶穌會的中國神父大約有 15 位。*⁷⁴

就遣使會而言，从 1697 年到 1844 年，他們接受了 60 位中國成員加入他們的修會，其中 58 位是被祝聖為神父。1840 年，遣使修會有 20 位中國會士。

在四川傳教中，中國神父的人數有時超過歐洲傳教士的人數：1781 年和 1782 年，46 位中國神職人員候選人被祝聖命為神父。

“中國基督教手冊”（The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提供了傳教士和中國神職人員的綜合人數。⁷⁵

在天主教傳入中國的最初五十年間（1582 年至公元 1630 年），在中國僅有耶穌會會士，外國傳教士的總數很有限，大多在 5 至 15 位之間，僅在後來十年才超過 20 位。當時，平均也有四或五位中國或澳門的耶穌會修士...1701 年和隨後的几年中，中國共有約 140 位傳教士，這标志着在整個 1580 年至 1880 年間，在中國的外國傳教士人數達到了頂峰。

18 世纪初，中國或澳門的中國神職人員人數仍然非常有限：6 位神父和 3 位修士，他們全部都是耶穌會士。被驅逐的事件却鼓勵了各修會（除了方

⁷² J. P. CHARBONNIER, *中國基督徒（Christians in China）*，在已引用的作品，第 27 頁。

⁷³ 參閱 N. STANDAERT(編)，*“中國基督教手冊”（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在已引用的作品中，第 308 頁。P. D'ELIA, “天主教本土.....”（*Catholic Native...*）在已引用的作品中，第 50 頁。

⁷⁴ 參閱 P. D'ELIA, “天主教本土的...”（*Catholic Native...*）, op.cit., 第 46 頁。

⁷⁵ N. STANDAERT (編.),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op.cit., 第 300 - 304 頁。

濟各會和奧斯定會以外) 重视训练和祝聖中國人成為神父。例如, 在 1739 年, 除了大约 83 位外國傳教士外, 中國大陆上已經有大约 18 位中國神父 (另有 8 位是修士或准备成為神父的人)……在 1800 年, 外國傳教士似乎總共有 26 位…在此期间, 大约有 10 到 15 位傳教士在滿清朝廷任職。主要的变化是中國神父的人數在增加。1775 年, 耶穌會在中國境内解体後不久, 除 26 位外籍前耶穌會會士外, 还有 12 位华人和澳門人的前耶穌會士, 在 16 位道明會會士中, 有一半是中國人。19 世纪初, 在神父的總數中, 大约三分之二的神父是中國人。

附錄二： 中國神職人員的陶成類型

這一時期, 中國本地神職人員的陶成遵循兩個标准, 主要通過四種方式實現。

這些标准與拉丁文的知识水平有关: 神職人員候選人或者被允許只學會如何誦讀舉行礼仪的拉丁文, 或者被要求能理解和运用這種語言。

陶成的類型可以简单地描述為:

第一种是由澳門的葡萄牙耶穌會會士和海外華人修道院所支持的類型: 挑选年青的候選人, 要求他們學會拉丁文, 這是按照歐洲神父的陶成類型。

但是, 多年來, 這種陶成方法並沒有產生很多和很好的效果。

第二种是, 由北京的耶穌會會士所采用的陶成類型: 他們挑选成熟的男人, 教他們誦讀舉行礼仪所用拉丁文。豁免他們學習說拉丁文和阅读拉丁文书籍。但是, 由于缺乏漢語礼仪文本和神學文本, 這種方法也乏善可陈。

第三种是, 前兩種方式的折衷, 但被認為是一種權宜之計, 這包括祝聖成熟的男人, 他們能誦讀拉丁文, 理解弥撒正典和聖事規程。正如我們所看到的, 這一特權是由几位教宗曾授予的, 第一批中國神父就是根据這一特權被祝聖的。

第四种是, 陶成的類型由當地的培育人員做決定, 根据神職人員候選人的个人才能和反應能力來決定, 並沒有一致和統一的教育方法。

附錄三： 中國神職人員的角色

1784 年, 乾隆皇帝 (1711 - 1799 年, 自 1736 - 1795 年在位) 震惊地發現, 在國外接受教育的中國神父多年來一直在中國工作。于是他颁布了一项敕令, 禁止中國男子成為天主教神父。

然而，1803 年在四川召开的中國首次教區會議上，中國本土神父的作用受到高度重视和肯定。那時，主教和他的助手是僅有的兩位外國傳教士。13 位中國神父參加了會議。羅馬宗座批准了這次會議的決議，並根據 1832 年 10 月 4 日傳信部的指示，對這些決議稍加修改，並隨之在全中國生效。四川會議建議在中國開設修道院，並重視神父的陶成工作。然而，因為當局的迫害，這一切只有在非常有限的條件下尚得以進行，阻止了傳教士全面落實這一建議。

誠然，中國基督化的不俗成果，主要常常歸功於外國傳教士。他們的故事已在流行的聖人傳記中和傳教史上被多次講述，而本土基督徒所作的貢獻只是順便一提。然而，仔細審視中國的傳教史，你會發現一幅截然不同的圖景。從一開始，中國本土的神父和教友對基督宗教在滿清中國地區的傳入、保存和隨後的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雖然傳教士的記述中並沒有明確和詳細地說明這一點，但福傳的成功從一開始就依賴於中國基督徒慷慨無私的援助。⁷⁶

附錄四： 中國神職人員的素質

總的來說，中國神父的生活和他們的热情表明，他們所接受的訓練，足以應付他們未來在非常艱難的時期所面臨的挑戰。在西部交趾（越南北部一地區）的宗座代牧雷托主教（Pierre Retord, 1803 - 1858）在 1841 年 12 月 28 日的總結報告中，準確地談到對中國神職人員的看法。他是這樣描述的：

就其虔誠度而言，有一些人是不冷不熱，性格懶散，然而，大多數人都很好，其餘的人都是非常、非常的優秀，在受迫害的時候，有他們在，是非常必要的。他們對我們的教會有很大的用途。若沒有他們，即使遇到輕微的迫害，信仰也會被人征服；有了他們，即使在受逼迫的時候，信仰也能堅持長久。除了少數人而外，多數人雖然沒有表現出亮麗的美德，但也沒有顯著的缺點或惡習；然而，他們能夠毫不猶豫地為自己的信仰而英勇獻身，事實證明，這是否是對他們最好的贊揚呢？⁷⁷

另一個判斷是：本土神父的工作是非常值得讚賞的。幾乎所有人都達到了他們長上的期望。關於他們中的一些人，當代文獻稱他們為“中國教會的支柱”，是“充滿熱情、坦盪和智慧的傳教士”。這些品質在決定性審判的那些日子中，得到了驚人的驗證。當外國傳教士遭受最激烈的迫害，導致驅逐出境、監禁，或慘遭處決時，中國本土的神父們便在那里，勇敢地擔當起支持和鼓勵他們的基

⁷⁶ 參閱 R.G. TIEDEMANN, "The Controversy over the Formation of an Indigenous Clergy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atholic Hierarchy in China, 1846 - 1926", a.c., 第 338。

⁷⁷ 原文：“Plures sunt pietate tepidi, indole formidolosa; plurimi etiam sunt vere boni, et reliqui optimi; tempore persecutionis sunt omnino necessarii; magnamque religioni utilitatem praestant; sine illis enim Religio paulitum persecutione vinceretur, cum illis, etiam vigente persecutione, adhuc longo tempore stabit. Paucis exceptis, inclitas non habent virtutes, nec insignia vitia: attamen pro sua fide fortiter mori non dubitant, ut factis constat; et hoc est eorum optimum elogium.”

督教同胞的重任。⁷⁸

在履行職務時，他們表現出很大的智慧和独创性，以及视死如归做殉道者的勇气。赵荣神父 (Augustine Zhao, 1746 - 1815) 于 1815 年死于狱中，袁在德神父 (Joseph Yuan, 1766 - 1817)、保羅·刘翰佐神父 (Paul Liu, 1778 - 1819) 和刘瑞廷神父 (Thaddeus Liu, 1773 - 1823) 分别于 1817 年、1819 年和 1823 年被处以绞刑。1900 年，教宗良十三世 (Leo XIII) 列他們為精修真福品，并于 2000 年 10 月 1 日，聖座册封他們為聖人。其他神父则因信仰而遭受苦難，如朱里官神父 (1717-1785) 和刘子正神父 (1718-1778)。如果说中國的教會没有在迫害期间完全灭亡，那确实是得益于本土神職人員們的热情和牺牲。

然而，也不乏消極的偏见；由于一些外國傳教士的自我优越感，以及人們普遍認為本土神職人員不够成熟，还不适合担任领导職務，而需要在監督之下工作，因此常常出現這種武断的看法。

這種偏見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上面提到的遣使會的薛玛窦神父 (Matthew Xue)。在 1800 年後的迫害中，外國傳教士被迫离开中國時，他被任命為华北地區遣使會的會長，那時該修會的中心已从北京迁至河北省西湾子。在那里，薛神父在其他中國神父的幫助下繼續工作。但在 1835 年，一位名叫孟振生神父 (Joseph M. Mouly, 1807 - 1868) 的法國遣使會會士來到這裡，取而代之，担任遣使會的會長，从而使原本已自治的中國神父們，再次服从于外國傳教士的控制。新來的孟振生神父只有 28 歲，而薛神父 54 歲。尽管如此，薛神父还是谦恭地接受了新的長上。

在一些地方，歐洲傳教士和本土神職人員之間確實出現了緊張局勢。李安德在他的日記中記錄了一些抱怨。羅馬必須指派宗座視察員來解決宗座代牧和本土神父們之間，以及與平信徒團體之間，對一些嚴格的強制規定而發生的衝突。當主教們試圖重新將傳教士掌控當地教會團體，奪去團體的領袖的臨時職務以至屬靈職責時，他們便激起本土神職人員和教友們的反對。⁷⁹

外國傳教士與中國本土神職人員發生衝突的原因有很多。也許是外國某些傳教士的不良行為，或者是某些領導人的傲慢態度。但衝突也由於羅馬教廷對葡萄牙在中國教會事務中的角色而形成的挑戰。這發生在羅馬將北京和南京教區變成宗座代牧區的時候。當地神職人員不得不放棄從葡萄牙政府獲得的補貼。事實上，19 世紀 30 和 40 年代，在“葡萄保教權”的南京教區的衝突尤為激烈。

在 1845 年 11 月 23 日，宗座傳信部頒布的 *Neminem profecto* 訓令”中確定了一個藍圖：培訓本土神職人員是建立一個真正本土教會的先決條件。這就創造了一種新的氣候，為本土神父的陶成制定了明確的指導方針。從此，本土神職人員的新時代便開始了。

⁷⁸ 參閱 P.D'ELIA, *Catholic Native Episcopacy, op.cit.*, 第 338 頁。

⁷⁹ 詳情請參閱 R.G. TIEDEMANN, “The Controversy over the Formation of an indigenous Clergy...”, a.c., 第 344 - 345, 和第 349 - 350 頁。

第二部分 1845 - 1976:

中國神職人員培育計劃的發展



1926年10月28日，

教宗庇護十一世（Pius XI）在羅馬祝聖了六位中國主教

第四章

綜述

4.1. 社會與政治背景 (1845 - 1976)

19 世纪下半叶，天主教傳教士在中國傳教頻繁地遭到迫害和孤立。在政治方面，各种麻烦不断出現。西方列強對中國發動的战争給中國帶來了失敗和屈辱。由于當時政治與宗教的緊密联系，不幸被人們把政治與宗教混為一談，西方列強的政治勝利也為基督宗教的傳播獲得了特權，首先是在一些沿海港口，然後是在內地。以商業和政治利益為主導的西方列強，迫使中國敞開大門。這種對宗教寬容的開端在 1844 年與法國簽訂的條約中得到了保證，並在 1858 年的“天津條約”和 1860 年的“北京條約”中再次重申這些保證。以前所有反對天主教的法令均被廢除。

太平天國（1851 - 1864）起義也影響了基督教的傳播。然而，負面的結果是，普通民眾對外國人和傳教士的敵意增加了。這種敵意在地方官員和紳士（文人）群體中尤其如此。1900 年，清政府利用這種敵對情緒，煽動義和團攻擊所有的外國人和基督徒。其間，大約有 3 萬名基督徒被義和團殺害。

這些悲劇發生後，政治局勢繼續緊張和復雜，因為期間又發生了多次反滿清的革命起義混合，而最終導致了 1911 年底的滿清帝國的崩潰。中華民國成立於 1912 年。但是，即使在取得這一重大成就之後，情況仍然非常不穩定。其中最主要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 - 1918）的爆發。隨之而來的是，地方“軍閥混戰”，中國內部的衝突加劇。1927 年，隨着蔣介石大元帥（1887 - 1975）地位的鞏固，國家達到了一定程度的統一和穩定。但是好景不長：1931 年日本入侵滿洲。由于反對共產黨的活動，中國的內部衝突加劇。1937 年 7 月，發生中日戰爭，隨着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事態更加嚴重。即使在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國民黨和共產黨軍隊之間的內戰，使中國的情況變得更糟。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國共產黨取得勝利，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新政權起初在較短的一個時期，允許人們進行宗教活動，然而，他們很快就開始驅逐所有的外國傳教士，並對當地的宗教信徒施加種種約束和限制。當局開始關閉或將所有宗教機構國有化，以便完全控制所有信徒和所有的宗教活動。當局最終目標是徹底消滅宗教，這一政策在文化大革命（1966 - 1976）期間達到頂峰。

4.2. 中國教會的發展

上面曾引用的 1845 年傳信部頒布的訓令 **Neminen profecto**，強調了教會應遵循的方針。從那時起，本土神職人員就不再僅僅被視為輔助神職人員。嚴格的陶成應該使他們能適合教會的任何職責，包括主教職位。這項訓令：決定陶成本土神職人員，這成為新時代的一個重要因素。

1847 年，遣使會的傳教士秦噶啞神父 (Joseph Gabet, 1808 - 1853) 與古伯察 (Evariste Regis Huc, 1813 - 1860) 在中國已工作了十二年，他們一起造訪過蒙古和西藏。他向教宗和傳信部呈交了一份五十頁的文件，報告在中國的傳教情況，和陶成本土神職人員的問題。關於後一點，他批評讓修生們接受的那種教育，致使這些修生在他們自己的國家，似乎成了外國人。他寫道：他們停止成為中國人，但也並沒有成為歐洲人。秦噶啞神父還強調，有必要培訓本土的神父，並讓他們與歐洲神父們處於平等地位。根據他的說法，天主教信仰在中國傳播緩慢的真正原因，是歐洲傳教士之間的爭議和對立，他們在很大程度上，疏忽了為本土神職人員提供良好的培訓，和外國神職人員對中國語言的無知。⁸⁰

由於秦噶啞神父對傳教士方法的批評，他的書在中國不受歡迎。宗座傳信部在香港的代理人曾被要求發出一封通函，聲明秦噶啞神父所寫的從未得到羅馬的批准。嘗試藉此平息爭論。

然而，1851 年 9 月 8 日，遣使會的宗座代牧在寧波召集的宗教會議，強調在所有時間和地點，都必須把中國本土的神父待如兄弟，甚至，如果他們以虔誠和規範證明了自己的價值，要任命他們適合其能力的職務。⁸¹

1850 年，中國有 16 個教會管轄區，而 1800 年只有 6 個。幾年後，1856 年，為了挑戰葡萄牙的對神職人員的保教權，北京教區改為三個宗座代牧區（北、東南和西直隸代牧區）。南京教區成為江南代牧區，湖廣教區分為湖北代牧區和湖南代牧區。因此，當時中國共有 20 個宗座代牧區，外加澳門教區和香港宗座監牧區。

方濟各會的徐類思主教 (Luigi Celestino Spelta, 1818 - 1863) 作為宗座視察員，在 1860 年至 1861 年，他對中國傳教所作的最後一次報告中，談到他已注意到，在宗座代牧與本土神職人員之間的關係，存在的困難。然而，他在報告中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建立教會聖統制的问题上，在當時，這是傳信部最常遇

⁸⁰ 參閱 Elisa GIUNIPERO, "Propaganda Fide between European Missionaries and Chinese Clergy" (於歐洲傳教士與中國神職人員之間的傳信部)，載於 A. GIOVAGNOLI - E. GIUNIPERO (編) *The Catholic Church and the Chinese World between Colonialism and Evangelization, 1840 - 1911*), (Urbanian University, Vatican City, 2005), 第 69 - 79 頁。

⁸¹ 引用於 R.G. TIEDEMANN, "The Controversy over the Formation...", a.c., 第 354 頁。

到的一个課題。⁸²

在 1869 - 1870 年的梵蒂岡第一屆大公會議上，駐中國的宗座代牧們必須填寫一份傳信部發布的一份問卷（共 72 個問題），並討論一些共同感興趣的主要議題。關於本土神職人員的問題，主教們覺得，讓中國神職人員承擔負責的職務的時機尚未成熟。相反，中國本地的神職人員還應繼續處於歐洲的監管之下。不幸的是，對中國本土神職人員的普遍評價是負面的，只有少數例外。但是，具有積極的一面是，法國主教們在其建議報告中強調，必須在傳教區的國家開辦學校、神學院和隱修院，為了培訓當地神職人員。遺憾的是，由於爆發了普法戰爭，他們的提議備忘錄，未能獲准。⁸³

1877 年，傳信部向所有的宗座代牧發出了一個通函，提醒他們在他們的年度匯報和述職（ad Limina）報告中，要特別提到本土神職人員的問題，也就是說，要報告他們的素質、修道院的管理和形勢，陶成和提供的教學，以及責成中國本土神父擔任更高職務等情況。

1879 年 6 月 23 日，教宗良十三世（Leo XIII，1810 - 1903，自 1878 年起在位）將所有在中國的傳教區劃分為五個教會區域，要求每一區域在接下來的一年里舉行一次宗教會議，目的是使他們的活動在某種程度上保持一致。與會者們再次認識到，培訓更多中國本土神職人員的緊迫性，包括建立新的修道院的必要性。事實上，一些代牧區已經取得了一些進展，而另一些代牧區尚未開始培訓本土神父的工作。該會議的報告指出，中國本土的神職人員還沒受到他們的歐洲同行足夠的重視。如果中國神父試圖澄清他們的地位，會被解讀為反叛和不聽命。傳信部對 1880 年各地區的宗教會議的決議作出了反應，於 1883 年 10 月 18 日，發布了訓令 **Quae a praesulibus**。它對未來的宗教會議發布了指導方針，並在不冒犯主教的情況下，鼓勵逐步建立一個不受歐洲人控制的地方教會。在培訓本土神職人員方面，敦促建築更多的包括地方神學院在內的陶成設施，以及對待中國神職人員要一視同仁，並任命他們擔任更高的負責職務。雖然後來地方的宗教會議也制定了相關政策，並導致了中國神職人員的成長，但不幸的是，他們的從屬地位並沒有得到實質性的改變。

1900 年義和團運動後，隨着中國民族意識的增強，人們對教會事業作出批判性的反省。1907 年，法國教區司鐸，若利神父（Leon Joly，1847 - 1909）在其著作“基督教主義與極端的東方”（*Le Christianism et l' Extrême Orient*）中指出，本土神職人員在教會發展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是至關重要的。然而，若利的書在某些領域也受到了批評。除了這場辯論，也是部分為回應若利的指責，瑞士耶穌會士霍恩德（Anton Huonder，1858 - 1926）在 1909 年發表了一篇更

⁸² 參閱 L.C. SPELTA, *Osservazioni generali del visitatore Apostolico della Cina su le necessità delle Missioni cinesi* (1862), APF, Acta, vol. 242, Additional Index to the 1874 Ponzona on China, n. XII, 第 298 頁。

⁸³ 參閱 Giovanni B. TRAGELLA, *Pagine di Storia e di Attualità Missionaria* (Roma, Unione Missionaria del Clero, 1947), 第 22 - 23 頁。

客觀的研究本土神職人員問題的論文。不過，這篇論文保留了歐洲人的優越感。但是，在中國人的眼裡，第一次世界大戰使歐洲人的優越感喪失殆盡。這也加劇了中國本土神職人員與外國傳教士之間的緊張關係。

教宗本篤十五世 (Benedict XV, 1854 - 1922, 自 1914 年起在位) 全面啟動了對傳教工作的重新定位。羅馬的積極態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一小群直言不諱的外國傳教士，和他們以天津的遣使會的湯作霖神父 (Antoine Cotta, 1872 - 1957) 和雷鳴遠神父 (Vincent Lebbe, 1877 - 1940) 為中心的支持者們的啟發。1914 年，科塔神父在北京的一次主教和專家會議上大胆發言，他贊成賦予中國本土神父更大的責任，並為他們擔任主教職務做準備。

1918 年 8 月 15 日，耶穌會的總會長 Włodzimierz Ledochowski 神父 (1866 - 1942) 也給直隸東南代牧區寫了一封信，這與中國耶穌會會士的普遍態度形成了解明的對比。他鼓勵傳教會的長上們，要在平等的基础上，發展中國本土的神職人員，無論是教區的還是修會的神父，並為他們擔任更高的職務做好準備。

教宗本篤十五世聽取了所有這些觀點後，於 1929 年發表了“夫至大” (Maximum Illud) 通諭，特別將中國教會的形勢和本土神職人員記在心裡。教宗對傳教的方式進行了引人注目的批評，並提出了兩個主要問題：克服歐洲國家主義的必要性，和提升本土神職人員的地位。教宗強調，必須在傳教的領土上，建立一個教會，要委託給本土神職人員管理教會，並設立修道院，以便陶成本土的神職人員。

對於本地神職的培育，不是要他們受訓後僅僅能擔當卑下的職務，充當外籍司鐸的副手。相反，他們應平等地肩負上主的工作，好能終有一天可以擔任他們的同胞的靈性生活的領導。… (MI 15)

然而，令人難以接受的實況是，儘管歷代教宗不斷的努力，在世界上有許多已得到信仰傳播已達數世紀的區域，尚有本地神職質素低劣。同樣，有許多地方由深受信仰光芒照耀數百年，其文明已達一定程度，並在其世俗領域中產生出眾多優秀人物，數百年來他們的地方亦深厚地受教會及福音的薰陶下，可惜依然未能產生出管理他們靈性發展的主教或提供靈修指導的司鐸。這些事實明確地反映出在不少地區一般培育未來傳教士的體制，至今仍是脆弱及充滿缺陷的。要解決此等困難，我們已授意傳信部在各地採取補救措施，為個別的地區以及聯合多個教區的區域建立大修院。在已設有修院的地方，傳信部會檢視其有否得到適當的管理。但無論如何，傳信部的任務就是要盡全力關顧我們的代牧區及其他形式的傳教區，確保本地神職得以成長及發展。(MI 17)

本土的神職人員不應僅被訓練去履行更卑微的職責，只充當外國神父的助手。相反，他們必須平等地擔負起天主的工作，這樣，有一天他們就能踏上他們子民屬靈的領導地位。然而，令人遺憾的事實是，即使教宗們一直堅持這一信念，在世界上仍有一些地區的人們，幾百年來他們一直宣傳這種信念，即：本土的神職人員素質很差。誠然，有些國家已經深深地滲透著信德之光，而且達到了相當文明的程度，在世俗生活的所有領域，都能夠產生傑出的男性，然而，儘管他們生活在福音和教會的強大影響之下，但是，數百年來，他們仍然不能為他們的屬靈管理，產生主教們，或為他們的屬靈指

導，產生神父們。從這些事實來看，很明显，到目前為止，在一些地方，通常用于培養未來傳教士的制度，仍是薄弱和有缺陷的。為了克服這一困難，我們命令傳信部，對世界各地區因地制宜，採取適當的補救措施，要特別關注為各地區和各教區建立修道院…

與此同時，1919年，羅馬任命廣東省的宗座代牧，光若翰主教（Jean B. Budes de Guebriant, 1860 - 1935）為中國所有傳教區的宗座視察員。第二年，他向教廷報告了各傳教區的一般情況，及其存在的問題。

然而，由於外國傳教士們長期對羅馬的改革持反對態度，教宗本篤十五世和光若翰主教的建議，卻沒有受到很多人的歡迎。

教宗庇護十一世（Pius XI, 1857 - 1939，自1922年2月起在位）根據本篤十五世制定的指導方針，不顧持續不斷的反對聲，他仍在這種背景下進行了傳教事業的改革。傳信部部長王老松樞機主教（Willem M. van Rossum, 1854 - 1932）全力支持教宗。

1922年5月22日，他把聖伯多祿宗徒宗座善會（Pontifical Society of St. Peter Apostle），置於傳信部的監督之下。該學會為傳信部服務，其宗旨是建立修道院，陶成本土的神父，建立修道院，以及傳信部屬下的協會。⁸⁴

此外，於1922年8月9日，教宗庇護十一世成立了宗座駐華代表處，任命剛恒毅總主教（Celso Costantini, 1876 - 1958）為宗座駐華代表。剛恒毅總主教於次年11月抵達中國。赴中國代表團此行的主要目的是，緩和外國神職人員與本土神職人員之間的緊張關係，將傳教區領土托付給中國神職人員領導，並終止了對天主教傳教區的政治上保教權。

由於法國保教權（French Patronage）的沉重負擔仍然存在，這位宗座代表盡其所能擺脫它。他試圖減少“西化傾向”、“歐洲國家主義”和“基督宗教的西方形式”。⁸⁵ 另一個需要克服的大問題是“以修會為中心的關切”，這是基於現有“*ius commissionis*”（將一個教會分區完全委託給一個修會）宗旨的幾個修會所追求的。這始於1753年。剛恒毅蒙席敦促所有傳教機構和人員，要將自己與曾授予歐洲人的特權分離開，為了消除這種危險，即：“在中華國度內成為一個異類，從而利用給予傳教士們的治外法權，讓他們創造一個國中之國”。⁸⁶

剛恒毅總主教很快就開始致力於提升中國神父在教會中的領導地位。1923年12

⁸⁴ 1899年，兩位女士，母女倆，Stephanie (?-1903年) 和 Jeanne Bigard (1859 - 1934年) 創建了該協會。

⁸⁵ “西洋化”、“愛國主義”、“修會主義”及相關概念，也出現在 Paolo MANNA 於 1929 年所寫的“*Osservazioni sul metodo modern di evangelizzazione*”一本小書中，但該書直到 1979 年才出版。這些術語取自當時的一些作家，注定非常受歡迎。參閱 G.BUTTURINI, *Le Missioni cattoliche in Cina tra le due Guerre mondiali (Bologna, EMI, 1998)*, 第 117-127 頁。

⁸⁶ 參閱 C. COSTANTINI, *Con i missionary in Cina* (Roma, 1946, I), 第 45 - 46 頁。

月 12 日，他任命方濟各會的中國神父成和德 (Odoric Cheng, 1873 - 1928) 為湖北蒲圻宗座監牧。1924 年 4 月 15 日，遣使會的神父孫德禎 (Melchior Sun, 1869 - 1951) 被任命為河北安國的宗座監牧。

作為實現傳教改革目標的另一種手段，剛恒毅總主教召開了計劃已久的中國天主教全國宗教會議。大會於 1924 年 5 月 14 日至 6 月 12 日在上海徐家匯舉行。這標誌著中國的傳教事業又邁出了重要的一步。關於神學院，理事會法令(第四卷，第四編，第一至第九章)鼓勵所有教區盡力建立各修院，以及小修院和大修院。如果不可能，敦促建立公共的或地區的修道院。在學習內容方面，鼓勵修生們學好拉丁文，並學習所有主要的傳統哲學和神學課程。大會還鼓勵特別注意選擇優秀的教師和培養員。

1926 年 2 月 28 日，教宗庇護十一世發布了教會事務通諭，*Rerum Ecclesiae*)。與“夫至大”通諭(1919 年)，這兩個教宗文獻構成了，被認為是陶成本土神職人員和建設地方教會的“大憲章”。教宗庇護十一世強調，修道院需要良好的管理。他還主張在聖座的直接關懷下，開設地區的修道院，由傳信部批准修道院的規章制度，並任命院長。

1926 年 6 月 15 日，教宗庇護十一世發表了宗座牧函 **Ab Ipsis Pontificatus Primordiis**，譴責傳教士參與政治，並廢除了法國和其它民事機構的保教權。1926 年 10 月 28 日，該教宗在羅馬祝聖了六名中國主教，這是中國朝着建立教會聖統制邁出的又一重要的一步。被祝聖的這幾位主教是：蒲圻方濟小兄弟會的成和德 (Odoric Cheng, OFM, 1873 - 1928)、安國的孫德禎 (Melchior Sun, 1869 - 1951 年)、宣化的趙懷義 (Philip Zhao, 1880 - 1927 年)、汾陽的方濟小兄弟會會士陳國砥 (OFM, 1875 - 1930)、海門的耶穌會會士朱開敏 (1868 - 1960 年)，以及浙江台州遣使會的胡若山 (CM, 1881 - 1962)。

1933 年，剛恒毅總主教奉召返回，蔡寧 (Mario Zanin, 1890 - 1958) 接替他，成為中國的第二位宗座代表。1939 年 12 月 8 日，傳信部對中國禮儀發出了訓令，題為 **Plane Compertum Est**，結束了長期以來的禮儀之爭議，允許中國天主教徒舉行祭祖儀式。

把教會領土委託給中國神職人員，這是一個自然前進的過程。1935 年，地界(管轄權)委託給 125 位神職人員中的 21 位中國神職人員。1946 年 2 月 18 日，教宗庇護十二世 (Pius XII, 1876 - 1958, 自 1939 年起在位) 設立了青島的宗座代牧，田耕莘主教 (Thomas Tian, 後為樞機主教, 1890 - 1967) 調至北京，任北京教區主教。

1946 年 4 月 11 日，羅馬教廷終於在中國確立了聖統制，共劃分為 20 個地區，分為 137 個教會分區 (20 個大主教區、79 個主教區、38 個監牧區或獨立的傳教組織)。中國神職人員管理了其中 28 個地界。黎培理總主教 (Antonio Riberi, 1897 - 1967) 被任命為駐中國的首位教廷公使。

中國首位樞機主教：田耕莘（1890 - 1967）

他出生在山東省陽谷地區。1901 年領洗奉教，他在兗州修院學習，並於 1918 年 6 月 9 日被祝聖為神父。然後，他在陽谷做傳教牧靈工作，直到 1939 年。1929 年 3 月 8 日，他在荷蘭加入了聖言會，並於 1935 年 3 月 7 日發了終身願。1934 年 2 月 2 日，他被任命為陽谷的宗座監牧。1939 年 10 月 29 日，教宗庇護十二世將田神父祝聖為主教，任命他為宗座代牧。1942 年 11 月 10 日，田主教被調任為青島教區，任宗座代牧。

1946 年 2 月 18 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召開的第一次教宗御前會議上，田主教被擢升為樞機主教。同年 4 月 11 日，隨着中國教會聖統制的建立，他被任命為北京總主教。

1951 年，他被共產黨當局驅逐出中國，前往美國治療心臟病。1958 年，他參加了選舉教宗的秘密會議，那次會議選出了教宗若望二十三世。1959 年至 1966 年，田樞機擔任台北總教區宗座署理。1962 年至 1965 年，他參加了第二屆梵蒂岡大公會議，以及 1963 年參加了選舉教宗的秘密會議，選舉出教宗保祿六世。田樞機在台北去世，享年 76 歲，安葬在當地的主教座堂。

1950 年，教會劃定的區域總數為 144 個：20 個大主教區、90 個教區，和 34 個監牧區或獨立的傳教區。

4.3. 外國修會及其神職人員的資料

從 1842 年開始，隨着中國的門戶被強行打開，天主教傳教士在中國的人數迅速增加。在中國已經存在一些修會的會士（耶穌會會士、方濟會會士、遣使會會士、道明會會士、巴黎外方傳教會會士等）他們繼續在中國工作，起初，他們主要是通過他們當地的會士，但後來，他們同許多新的外國會士一道工作。⁸⁷

耶穌會會士們在受到鎮壓（1773 - 1814）後被解散，他們 1842 年回到上海，1857 年回到河北省。他們在河北省東南部的獻縣宗座代牧區工作。

與此同時，新的修會來到中國。米蘭外方傳教會修院（後來稱為：宗座外方傳教會，拉丁文縮寫字 PIME）的首批成員，於 1858 年 4 月 10 日來到香港，1870 年 3 月 19 日來到河南省。1885 年，羅馬傳教會聖伯多祿和聖保祿修道院（後來稱為 PIME）的第一批成員來到陝西南部，於 1887 年負責此地的傳教工作。1865

⁸⁷ 例如，1845 年初，有 26 位小兄弟會的修士在中國工作，同年又有 9 位修士來到中國。參閱 Arnuff CAMPS - Pat McCLOSKEY, *The Friars Minor in China, 1294 - 1955* (*General Secretariate for Missionary Evangelization, Rome, 1955*) 第 21 頁。

年，聖母聖心會（Scheut 傳教士，CICM）的會士們抵達蒙古。1879 年，西班牙的奧斯定會的會士們從馬尼拉回到中國，並在湖南省重新開始了他們的傳教使命。

聖言會的头兩位神父于 1879 年抵達香港，開始培訓，他們在 1880 年從方濟各會會士那里，接管了魯南代牧區的傳教工作。

因此，到 1900 年，10 個修會的傳教士在中國開展工作，更不用說熙篤會隱修團體（Trappist community），他們已于 1883 年就在河北楊家坪工作；1875 年以來，在香港的基督學校修士會（La Salle Brothers of the Christian schools），以及 1891 年被邀請到中國的聖母小昆仲會的修士們（Marist Brothers），都開始在中國工作。

到 1935 年，國際修會增加到 25 個，到 1940 年增加到 33 個。此外，還必須加上 6 個修士修會（其中包括兩個中國男修會：主徒會和若翰小兄弟會）和 58 個修女會。

中國的教區神父們與外國傳教士一道，正如我們在各個修道院中已經看到的那樣，訓練有素的他們，正在福傳和宗徒事業中繼續發揮着重要的作用。下面提供了統計數據。⁸⁸

中外神職人員、教會地界及天主教徒人數

年份	中國神職人員	外籍神職	地界	天主教徒人數
1848	135	84	16	ca. 320,000
1865	167	199	22	390,000
1886	320	534	35	460,000 /567,000

⁸⁸ 源自：Fr. P. D. ELIA, *Catholic Native Episcopacy*, *op.cit.*, 第50、60、64 頁；P.A.M. CRACCO, *I Missionari della Cina nella Statistica (Scuola Tipografica Don Bosco, Shanghai)*, 1936 年，第 19 頁；R.G.TIEDEMANN, *Controversy over the Formation of Indigenous Clergy*, 在已引用的作品中，第 375 頁；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SPCK, London, 1929)；19 世紀末，天主教徒有 532,448 位，中國神父 409 位，天主教外國傳教士 759 位”。Antonio RIBERI, *Epistola ad Ordinarios Sinarum de Sanctis Vicationibus Promovendis* (Internuntiatura Apostolica in Sinis, 1 July 1949)。

1900	470	886	41	741,500
1905	547	1,143	43	880,000 / 1,000,000
1910	638	1,391	47	1,292,300 /1,365,000
1915	809	1,462	54	1,560,000 /1,750,000
1920	963	1,364	54	1,994,500
1925	1,203	1,803	65	2,338,000
1926	6 bishops			
1930	1,504	2176	65	2,530,843
1935	1,753	2,340	125	2,764,244
1940	2,044	2,711	137	3,119,849
1946	2,348	21 主教	137	
1948	2,661	24 主教	144	3,275,000
1950	2,842	2,859	144	3,300,000

第五章

1845 - 1900 年：地方修道院數量的增加

1848 年，天主教在中國開辦着 14 所修道院。在羅馬和各種批評的壓力下，外國傳教士的心態逐漸發生了變化。此外，人們感到迫切需要神父的聖召。因此，各修會和修院的幾位宗座代牧開始在當地開辦修道院，從年青人入手，培訓神職候選人成為神父。想按照西方模式和方式培養他們，便要求學生們學好拉丁文。然而，不幸的是，大多數外國傳教士，特別是領導者們，仍然持有將傳教領土發展為自己領土的态度。他們認為本土的神職人員水平低，還不适合在教會擔任較高的職務。

方濟各會的傳教士們分別在湖廣（湖南和湖北）、山東、山西和陝西等地做傳教牧靈工作。

1839 年 8 月，在湖廣，方濟各小兄弟會的代牧李文秀（Giovanni Domenico Rizzolati, OFM, 1799 - 1862）在漢口附近的百泉開辦了一所小修院，但同年被當地人們搗毀了。第二年，在武昌新開辦的一所修道院也遭遇了同樣的厄運。這迫使主教將學生們遷移到天門鎮。在 1844 年 5 月 19 日的一份報告中，李文秀主教寫道：

我有五位歐洲神父和六位中國神父……修生有十位；但並不是所有人都可能最終被祝聖為神父，其中只有八位有可能性。我們沒有一個固定的住所和修道院；他們借住在佛教僧侶的寺廟。我們租用了寺廟的一部分，作為修道院，我們關閉了所有的門，以免修生們與和尚之間有任何交流。和尚們並沒有意識到我們租房的用途；他們只認為我是一個富有的商人，做慈善事，開了一所學校。他們不知道我是一位主教，他們跟我說話的口氣，就好像我是一個來自陝西的商人。⁸⁹

1854 年，滿清當局逮捕了李文秀主教和在修道院教書的其他外國神父，遂被驅逐到香港。主教把修道院的修生們也搬到了那里。但在羅馬把里佐拉蒂主教召回羅馬，並任命他為傳教事務的顧問後不久，這所修道院就關閉了。但該修道院很快又在湖北天門重新開辦。後來，它又不得不移動到楊家河，但不幸被燒毀了。神學院最後又重新開辦，然而在 1860 年，由於當地的迫害，這修道院被解散了一段時間。1864 年，這湖北的修院有 17 位大修生和 9 位小修生。方濟各小兄弟會的明位篤主教（Eustachio Zanoli, 1831 - 1883），在 1862 年接替了李文秀主教，在武昌建了一所新的修道院。

1856 年，湖廣代牧區分拆為湖北代牧區和湖南代牧區，湖北代牧區再分拆為東北西南代牧區。在 1870 年東代牧區在漢口開辦修院，北代牧區在老河口，南代牧區在宜昌也開辦本地修院。

⁸⁹ 引用：C. COSTANTINI, *Ricerche...*, 在已引用的作品中，第 6 頁。

1887年，鄂東的宗座代牧，方濟小兄弟會的江成德主教（Epifanio Carlassare, OFM, 1844 - 1909）邀請湖北、湖南主教到武昌開會，討論對中國修生的教育問題。他提議在該市為湖南和湖北建立一所核心修院，並在附近設立一所修會會院，以培育方濟各會的修生。傳信部沒有批准這個計劃，認為在每個宗座代牧區，應把陶成中國神職人員的任務放在優先地位。

在湖南，方濟小兄弟會的陸懷仁主教（Miguel Navarro, OFM, 1809 - 1877）在衡陽附近的黃沙灣開辦著神學院。自1856年起，湖南成為自治傳教區。1860年，這所修道院遷往衡陽。1852年，為了躲避當地的迫害，院長和修生們逃到漢口，但後來又遷回黃沙灣。

1879年，湖南分為兩個代牧區：南部的長沙代牧區和北部的常德代牧區。西班牙的奧斯定修會會士們管理著後者，他們建立了自己的修道院。

在山東，羅類思主教（Lodovico de Conti Besi, 1805 - 1871）於1839年被任命為當地宗座代牧，並於1841年在古城區的十二里莊開辦了一所修道院。他在1848年退休後，由方濟小兄弟會的主教江類思（Luigi Moccagatta, OFM, 1809 - 1891）繼續管理這所神學院。1851年，他祝聖了該修道院第一批神父。1863年，為了安全起見，修道院搬到了濟南，在那里存在了好幾年。然後又搬到附近的洪家樓村。1887年，攻讀神學的學生們返回了濟南，並一直留在那里，直到1906年洪家樓新建了一所大修院。⁹⁰

1844年，陝西與山西分割，但與甘肅合並，成為一個宗座代牧區，開始計劃成立一所修道院。1845年，該代牧區的首長方濟小兄弟會的馮尚仁主教（Alfonso Donato, 1873 - 1848）將修院設在西安市，但不久之後就將修院遷到三原縣的通遠坊鎮。馮主教親自在修院里教書，並編寫所需的拉丁文課本。1878年，甘肅成為分拆出來的新代牧區，並由聖母聖心會（CICM）的神父們托管，1887年陝南成為一個代牧區，則通遠坊修道院繼續為陝北代牧區服務。

在陝西南部，羅馬為外方傳教服務的聖伯多祿和聖保祿傳教會（後來成為宗座外方傳教會，PIME）的成員們，於1885年來到這裡，並於1887年從方濟各會的手中接管了陝南宗座代牧區的管理權。他們繼續監管現有的小修院，1888年有8位修生在此學習。

山西於1844年成為宗座代牧區。1890年，它又分拆為山西北部（太原）和山西南部（潞安，今日的長治）兩個代牧區，這兩個代牧區均由方濟會的傳教士照管。

⁹⁰ 參閱 A.CAMPS - P. McCLOSKEY, *The Friars Minor...*, op.cit., 第21頁。

在山西北部，艾士傑主教 (Gregorio Grassi, OFM, 1833 - 1900, 他于 1946 年 11 月 24 日列為真福，並於 2000 年 10 月 1 日封聖) 重建了修道院，這所修道院于 1890 年转移到洞儿沟。同時，攻读神學的學生留在太原繼續接受训练。随着代牧區的劃分，這所修道院繼續為山西北部宗座代牧區服务。1900 年，該修道院有 37 位修生，但是义和团運動之後，修道生在 1903 年减少到了 18 位 (其中包括五位學神學和兩位學哲學的修生)。五位修生被义和团杀害，他們在 1946 年 11 月 24 日獲列為真福品，在 2000 年 10 月 1 日列為聖人。這些聖人是：张景光 (John Zhang, 1878 - 1900)、董博第 (Patrick Dong, 1882 - 1900)、张志和 (Philip Zhang, 1880 - 1900)、张焕 (John Zhang, 1882 - 1900) 和王锐 (John Wang, 1885 - 1900)…。⁹¹

晋南代牧區也在潞安开设了一所修道院。

张景光 (若望)，山西太谷人，年幼丧父，他的母親在他就读洞儿沟小修院時去世。尽管他為喪親十分悲痛，但他从未放弃他的聖召。1894 年进入太原大修院，在灵修和學業上都取得了長足的进步。1897 年，他晋升了小品。在迫害的威胁下，他做好了准备，鼓励同學們也准备殉道。1900 年 6 月 27 日，一座新教教堂被烧毁後，院長允許所有修生們回家，但其中有五位留了下來。7 月 5 日，他們和一些外國傳教士一同被捕。其中有一人看见张景光像一个要回家度假的孩子那樣，興高采烈地在監獄的院子里玩耍，就對他喊道：“若望，記住，這可不是闹着玩的時候！”“為什麼不呢，神父？”他回答说，“如果我們被杀，難道不是直接升天堂吗？”四天後他被杀了。

张志和 (斐理伯)，山西省山清峪人，十六歲进入洞儿沟小修院。他努力學習，升入太原的大修院，在那里他在遵守规则和服从纪律方面表現突出。面對迫害，他坚持留在修院，把自己完全托付在天主的手中。他于 7 月 9 日英勇殉道，時年 20 歲。

张焕 (若望)，山西阳曲人，1896 年考入小修院，表現出谦虚、善良的品質。後來他升入太原的大修院。面對迫害的威胁，他聽从院長的建議後，回到家里。但几天後，他又返回太原，決心與他的主教、長上和同學們一起殉道。

董博第 (巴特里爵) 出生于山西太原的古城营村，1893 年考入洞儿沟小修院。兩年後，他进入太原的大修院。他的举止成熟，同學們都叫他“老先生”。他非常恭敬聖母。他對學習非常投入，还學會了好几门外语。1897 年，他和另外三位修生被选為陪同主教富格辣 (Francis Fogolla)，参加在都灵举办的國際傳教展覽會，並前往其它一些欧洲國家為傳教事业筹集资金。1899 年，他們回到太原。1900 年，當迫害迫在眉睫時，他决定繼續留在修院。他祈求殉道的恩典。他致命殉道，時年僅 18 歲；他的父母和三个兄弟，于同一日在大教堂祈祷時，與

⁹¹ 详见 Nicola CERASA, *Breve Storia della Missione di Taiyuan* (Provincia Romana dei Frati Minori, Roma, 第 138 页) 并参阅“中华殉道圣人传略”。

130 位天主教徒一起被杀害。

王锐 (若望)，山西文水县人，十歲時进入小修院。他以坚定的信仰和优美的嗓音而闻名。1897 年至 1899 年，他也被选為陪同富格辣主教去欧洲。回國後，他在太原开始了學神學。在長上让回家躲避迫害的建議下，他宣布：“我要為天主致命！”他被杀了，時年僅十五歲。

1842 年，耶穌會的神父們回到上海，在南京教區宗座署理，羅類思主教领导下工作。1856 年，這片土地要成為江南宗座代牧區，包括上海、江苏和安徽。1843 年 2 月 8 日，在耶穌會士返回六個月後，他們在松江縣開設了一所修道院，取名為“聖母聖心修院”。1843 年有 22 位修生，1845 年有 32 位。起初，除了在镇压之前耶穌會會士們留下的一本老旧的拉丁文语法书而外，並沒有其它的教科书。1847 年，修生有 37 位。1850 年，修院迁往浦東，那里有一个很大的天主教社區。随着修院人數的增加，有必要將大修院和小修院分开。1853 年，大修院迁回河的對岸，坐落在徐家匯大教堂旁边。1858 年 9 月 19 日，祝聖了首批三位神父。後來，小修道院也被迁移到徐家匯，在徐匯公學的一側。

1857 年，耶穌會會士們前往河北，掌管直隸代牧區的東南部。1860 年 2 月 4 日，他們在威县的赵庄开办了一所修道院，共有 13 位修生。但由于条件不安全，1861 年 7 月迁往獻县的张庄，在那里建筑了聖心堂（1866 年 3 月 28 日），後來又建了一所學校，1874 年甚至还建了一所印刷社。1878 年，該修院有 38 位學生。

在澳門，葡萄牙籍耶穌會士在 1856 年遣使會离开宗座署理區之後，于 1862 年重新掌管聖若瑟修院，直到 1871 年他們再次被驱逐。教區的老师取代了他們，他們把該修院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學院。修院成為世俗化的學校一直持續到 1893 年。从那年起，這學院再次托付给耶穌會會士們，他們又把它作為一个修院加以管理，直到 1940 年。1940 年，耶穌會把神學院的管理權移交给了教區的神職人員。

1845 年，北京教區、河南、蒙古（包括辽東半島西部、滿洲西部）、江西和浙江等地的代牧區，均由遣使會的會士們负责管理。

1856 年，北京教區分拆為北直隸代牧區及西南直隸代牧區，由遣使會管理，而直隸東南的代牧區则由耶穌會管理。

1856 年，北直隸代牧區將修院从西灣子迁回北京。1884 年，有 29 位小修生和 15 位大修生在那里學習。⁹²

⁹² 参阅 E. MALATESTA – 高志宇 (编): *Zhalan, The Oldest Christian Cemetery in Beijing* {大栅栏, 北京最古老的基督教墓地}, (I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Ricci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Macau, 1995), 第 69 页。

西南直隸代牧區于 1880 年在正定创办了修院，修院有 11 位小修生，以及 7 位大修生，其中兩位于 1881 年被祝聖為神父。

江西和浙江于 1838 年在遣使會的管理下建立了一个代牧區，並於 1845 年凭借他們本身的實力，成為兩個分立的代牧區。1879 年，江西代牧區被分為江西北部（九江，今日南昌）和江西南部（贛州）代牧區，1885 年又进一步设立了東部（余江）代牧區。从九江开始，每个代牧區都在本地开办了自己的修道院。1899 年贛州也新建了一所修道院。

在河南，遣使會的安若望主教（John Henry Baldus, 1821 - 1869）于 1854 年在南阳附近的金家港开办了一所小修院。⁹³ 1870 年 3 月，當米兰外方傳教會（Milan Institute for Foreign mission）的會士們接管河南代牧區時，已有遣使會的三位中國神父和十几位修生住在那里。該代牧區于 1871 年祝聖了首位本地神父，1873 年又祝聖了第二位本地神父。1884 年豫北代牧區成立後，他們在小庄开办了自己的修道院，後來，該修道院迁至卫辉。

同一所米兰修院的成員，在 1858 年抵达香港後，繼續负责管理該修道院，這所修道院是宗座監牧區于 1846 年开办的。1858 年祝聖了首位神父。到 1900 年，在香港的修院已培养出 11 位神父。

1845 年，巴黎外方傳教會的神父們，在辽東（中國東北）宗座代牧區工作，該代牧區成立于 1838 年。他們在小八家子村开办了一所修道院，後來搬到了吉林。1898 年，辽東宗座代牧區被劃分為北滿洲代牧區和南滿洲代牧區，兩個代牧區都在巴黎外方傳教會的领导之下。

1847 年，巴黎外方傳教會的總會長给他的宗座代牧和傳教士們（當時該修會在亚洲各地管理着 19 所修道院）寫了一封公开信，强调檳城（Penang）修院在培养本土神職人員方面所起到的核心作用。多年來，巴黎外方傳教會都是派他們的大修生們去那里學習。

巴黎外方傳教會的神父們，还在四川、贵州、云南，和西藏展开了工作，這些地方在 1856 年都建立了宗座代牧區。廣東和廣西受澳門教區監護。但是在 1858 年，廣東凭借自己的實力成為一个宗座監牧區。後于 1875 年，廣東監牧區劃為廣東和廣西兩個監牧區，但均由巴黎外方傳教會監管。這兩個監牧區都在當地开办了小修院，但他們通常把他們的大修生送往檳城修院。

四川的教會分别在 1856 年和 1860 年被劃分為西北部、東部和南部的宗座代牧區。1861 年，西北部代牧區的洪主教（Annet-Theophile Pinchon, 1814 - 1891）在彭州建立了他的主教府，在白鹿买了一块地，建立一所小修院，並於 1894 年竣

⁹³ 参阅 L.M. Balconi, *33 anni in Cina*, op.cit., 第 119 页：从 1854 年到 1900 年，修道院培养了 16 位神父。何安业主教（Angelo Cattaneo）于 1905 年，重新开启了该修道院。

工，命名為聖母无染原罪修院，通常稱為‘白鹿初級學院’。1895年，杜署主教（Marie Julien Dunand, 1841 - 1915）开始興建‘白鹿高級學院’，于1908年竣工，並命名為“天使报喜”修院。建成後，小修院也搬到了那里。

巴黎外方傳教會的神父們，在叙府（今日宜宾）附近又开办了一所小修院，在那里他們也有自己的墓地。

1884年，廣西12位前途看好的青年被派往檳城學習。1895年，在貴縣建立备修院，並於1901年迁往南宁市。修生們在那里學習了拉丁文之後，被送往檳城修院，接受為期六年的哲學和神學教育。在他們回到家後，他們被分配到一個傳教士那里做其助手一兩年的時間，然後被接受聖品，被祝聖為神父。

宗座監牧，巴黎外方傳教會的羅主教（Joseph Lavest, MEP, 1852 - 1910），于1901年，从首批派往檳城的本土修生中，很欣慰地祝聖了三位神父，1904年又祝聖了一位神父。

在貴州宗座代牧區的贵阳市，在姚家关开办了一所大修院。該修院的兩位修生，陈昌品（Paul Chen, 1838 - 1861）和张文瀾（Joseph Zhang, 1831 - 1861），于1861年殉道致命（1909年5月2日列為真福，2000年10月1日封聖）。从1845年到1900年底，在檳城神學院培养的中國神父约有60位。

张文瀾，四川巴县人，陈昌品，生于貴州興仁。1860年，张文瀾因學業未及格，後又被姚家关修院錄取。同年的諸聖瞻礼日，陈昌品也进入了該修道院。

羅廷阴（若翰），1825年生于貴阳近郊的青岩，最初學医，後來受洗，他的妻子和父母都皈依了天主教，他在姚家关附近买了一个农场，幫助管理神學院的工作。

望羅曼德（瑪蘭大），1802年生于貴州遵义，1857年开始在修道院工作，担任厨師和洗衣婦。

1861年，一些地方官員發動了另一場宗教迫害。所有修生都离开了修院。但官員下令逮捕了仍在那里的羅廷阴。在押送他去監獄的路上，士兵們还遇到了张文瀾和陈昌品，他們正好从城里回來。士兵們于是也逮捕了他們。三个人都被关在一个破旧的寺庙里，又脏又湿，受到了虐待。望羅曼德到那里給他們送食物。羅廷阴生病。他的妻子想來看他，但他只要求她保持堅定的信仰和照顧好他們的兩個兒子。

7月29日，尽管皇帝已經下达了赦免基督徒的命令，但地方官員仍不张贴皇帝的命令，並秘密下令处决他們。他們被押往刑场的時候，望羅曼德正在河边為他們洗衣服，她便立刻跟随他們，决意要與他們同死。這四个人都表现出為快乐和位基督信仰视死如归的精神。他們一直祈祷到最後一分钟，全都被斩首，从而获得了殉道者的榮耀。

1845 年，道明會傳教士們在福建和台灣傳教。本地的聖召大多是在福安附近的“聖十字架修院”，或者，是被送到馬尼拉接受培育的。1870 年，中國神父有十位，1890 年增加到十三位。

1901 年，每個代牧區都有一所修道院：廈門的修院有 12 位學神學的學生，福州修院有 11 位學哲學的學生。與此同時，在這兩個代牧區，共有 22 位中國神父在工作。⁹⁴

聖言會于 1884 年負責魯南代牧區。⁹⁵ 安治泰主教（John B. Anzer, 1851 - 1903）在坡里莊開辦了一所修院。然而，他在 1889 年、1892 年和 1896 年祝聖的前四位神父都曾在他的代牧區之外的濟南和北京學習。1985 年初，學校遷至濟寧。1898 年 11 月 1 日，安主教把在當地修院畢業的首批七位修生祝聖為神父。

聖母聖心會士們自 1865 年到中國以來，他們從遣使會那里接管了蒙古的代牧區，並與兩位當地教區神父一起，接收了西灣子的一所修道院。1866 年，在那里祝聖了四位新神父。⁹⁶

1883 年，蒙古代牧區分為中部（中心為歸綏，今日的呼和浩特）、東部（遼寧，松樹嘴子）和蒙古西南部（寧夏）代牧區。在每一個代牧區，聖母聖心會的神父都開辦了學院，小修院或備修院，其目的是培訓小學教師，或為神職人員候選人做好被祝聖為神父的準備。對拉丁文有特別興趣的學生被派往西灣子或松樹嘴子修院學習。在蒙古南部代牧區，德主教（Alfons De Voss, 1841 - 1888）于 1887 年在三道河開辦了一所小修院。

1878 年，從方濟各會手中接管了甘肅代牧區後，聖母聖心會會士們在武威附近的西鄉定居下來，這裡成了他們傳教的中心：在那里建立了几所機構，其中有一所修道院。其它的修道院分別在玫瑰營子、三盛公（寧夏）和赤峰（內蒙古）開辦。

1845 年至 1900 年，在意大利拿坡里聖家修院接受培訓後回國的中國神父共有 33 位。他們主要在湖北和湖南工作，少數神父在江南代牧區工作。

歷史學家拉圖雷特（Kenneth Scott Latourette）對這些年本土修院的總體情況做了一份積極的報告：⁹⁷

事實上，每一個代牧區似乎都至少有一所修道院，在那里可以開始為陶成神

⁹⁴ 參閱 Jose M. GONZALES, *Historia de los Misionarios...*, op.cit., 第 62 頁。

⁹⁵ 參閱 Fritz BORNEMANN, *A History of Our Society* (Collegium Verbi Divini, Rome 1982)。

⁹⁶ 參閱 J. LEYSSEN, *Formatio Cleri in Mongolia* (Pekini, Typographia Lazaristarum, 1940)。

⁹⁷ 參閱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 in China* (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1967), 第 338 - 339 頁。

父職務作好准备，也有一些學校可以完成這種訓練。有時，由于害怕受到迫害，這些機構就藏在深山老林中，但有時也開設在較大的人口中心。神職人員候選人被要求的學習過程是漫長而嚴格的。他們要學習 10 年或 12 年的中國文學、拉丁文、哲學和神學。他們的拉丁文知識不僅要滿足施行宗教礼仪的需要，而且要能够精讀書籍，因為只有這樣，他們才能與整個教會的生活和思想保持溝通。至少有一個代牧區要求神職候選人在十歲或十二歲時開始接受教育，直到三十四歲或三十五歲才被祝聖為神父。在開始學習課程的學生中，顯然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完成功課。在中國，人們對獨身者有偏見、而且長期的准备工作對身體的壓力、以及從事這一職務容易遭遇的貧困和艱苦，使人望而却步。所以，只有那些更頑強和堅韌不拔的人，才能追求神父的職務。即使那時，其成果也不總是令人滿意的。本土的神職人員被認為是“虔誠和有道德的”，他們能够恰當地解決與同胞之間的困難，但他們這麼長時間不停地在學校學習，遠離了一般的社會生活，因此，他們往往很膽怯，在傳教救靈方面，缺乏單獨工作的經驗。而且，一般說來，他們的身體並不是很健壯。然而，令人欣慰的是，埃爾金勳爵 (Lord Elgin) 1858 年在上海遇到準備做神父的中國人，給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記錄道：他們有“一副聰明、開朗的面容”，總體上，他們遠遠優於歐洲天主教修道院的修生們。

第六章

1900 - 1930: “聯合修院” 的興起

聖召和地方修道院數目的增加，決定了兩個導向：第一，使屬於各修會的宗座代牧們產生興趣，希望藉此吸引神職人員候選人加入他們自己的修會，並使一些候選人的陶成工作與另一些候選人區分開來；第二，由於教學人員和訓練設施有限，特別是在處理攻讀哲學和神學的學生的問題時，有一種趨勢，就是把他們集中在普通的大修院中。因此，每個代牧區就可努力開辦自己的學校，教授拉丁文（屬於各修院一類）和小修院；與此同時，有越來越多的“聯合修院”由不同的代牧區或修會共同主辦，各自為不同的傳教任務，培養他們自己的候選人。這種陶成的模式是根據外國培育者的文化和精神而進行的。

6.1. 遣使會的神父們

北直隸代牧區遣使會的神父們，他們曾在北京開辦了自己的小修院和初學院。1904年，當他們在浙江嘉興建立了自己的另一所修院時，就把他們的初學生搬到了那里。與此同時，由於華北地區天主教徒人數和聖召的迅速增加，他們在北京的大柵欄興建立了一所新的修道院，院址就在利瑪竇神父墓附近，於1909年7月2日竣工。不久，住在嘉興的初學生搬回北京，因為他們無法適應南方的氣候。1911年，遣使會分別於利瑪竇墓地所在的大柵欄和嘉興設立了兩個地區，各自開辦自己的初學院。這兩個初學院自成立之初到1948年，受訓的初學生有360位在大柵欄，131位在嘉興。

1899年，東直隸代牧區以永平（今唐山）為中心，它靠自己的實力，脫離了北直隸代牧區，成為一個獨立的代牧區。隨後，在1910年和1912年，中央直隸（保定）和沿海直隸（天津）也分別建立了代牧區。每個教區都開設了自己的修道院。值得一提的是，永平的武致忠主教（Ernst Geurts, CM, 1852 - 1940）所做的不懈努力，在幾次失敗的嘗試後，他終於在1905年成功地開辦了一所修院，並在1915年祝聖了首位當地的神父。然而，在1918年，所有這些代牧區開始把

他們的大修生送到大柵欄修院。在 1920 - 21 學年，大柵欄的修生有 44 位。⁹⁸ 遣使會修道生在修院內有自己的宿舍，但 1921 年以後，為了給該教區修道生更多的空間，這些學生被送往嘉興修院。

1902 年，在浙江代牧區，遣使會在舟山的定海開設了一所修院，但當 1904 年 1 月嘉興修院建成後，他們就把他們的大修生轉到了那里。1910 年，該代牧區劃分為浙東（寧波）代牧區和浙西（杭州）代牧區。每個代牧區都開辦了自己的修道院。然而，1925 年以後，杭州的遣使會會士們把他們的大修生們派往嘉興修院，但仍在原地繼續開辦着小修院。

6.2. 方濟會的神父們

在湖南，黃沙灣修道院 1905 年有 11 位修生，1920 年有 22 位。1921 年，在武昌為湖北與湖南地區開設了一所聯合修院，學生要學習 2 年哲學和 4 年神學。後來，該修院搬到了荊州，在那里一直至 1928 年，修道院又搬到了漢口的聖文德（Bonaventure）修院，這所修院是為接受湖北和湖南兩個教區，以及為方濟各會的修生們而建的。

在山東，濟南的修道院由方濟各會照管，直到 1906 年在洪家樓建立了新的修院，在那里，代牧區擁有廣闊的土地，成為修院收入的主要來源。這個地方主要有一座新哥特式的大教堂和另一座大型建築，供給大、小修院使用。1925 年以前，這座建築一直是當地的一所聯合修院。1925 年，它曾成為山東和山西方濟各會的一所聯合修院。另外還建了一所本身的小修院以便將來能更多的學生進入大修院就讀。直到 1925 年，在這些修院接受教育的 59 位修生被祝聖為神父。⁹⁹

在山西北部，隨著義和團運動造成的損失所得到的賠償，1905 年，在太原市建成一座新的大教堂、主教住宅和一所修道院。這所修院在那里存在了 30 年之久。

1905 年，陝西北部的代牧區，通遠坊修院有 19 位修生攻讀神學和哲學。兩年後，在同一地點建立了一所大修院。1909 年，大修生的人數增加到 20 位，1911 年增加到 25 位，1916 年有 22 位。

同時，1911 年，該代牧區被劃分為陝中和陝北兩個代牧教區，後者由西班牙方濟各會的會士們管理，總部設在延安。1915 年，他們為教區學生開辦了一所小修院，翌年，又在甘谷驛開辦了一所大修院。

1923 年，在陝中代牧區，希賢主教（Eugenio Massi, 1875 - 1944）將通遠坊

⁹⁸ 參閱 Celso Costantini, *Con i Missionari in Cina*, Roma, PUMdC, 1946, 第一卷, 第 61 頁, 描述了他在 1923 年元旦訪問該修道院的經歷, 認為這“堪稱典範, 在歐洲找不到比這更好的修道院”。

⁹⁹ 參閱 A.CAMPS-P. McCLOSKEY, *The Friars Minor...*, op.cit., 第 21 頁。

修院搬到他在西安的主教官邸。該神學院开办到 1935 年 7 月，那時，太原神學院被認可為山西和陝西兩地區的總修院。通远坊修院繼續作為一所小修院，大荔（同州）教區亦成立他們的小修院，有 16 位修生。

6.3. 耶穌會的神父們

1901 年，上海徐家匯修院祝聖 8 位畢業生為神父。1905 年，祝聖 9 位神父，1920 年祝聖 10 位神父。自 1923 年以來，每年都祝聖 3 - 4 位新神父。從 1843 年到 1926 年，共有 575 位修生進入神學院，其中 157 位被祝聖為神父（其中 30 位是為耶穌會祝聖的神父）。¹⁰⁰

1922 年，安徽代牧區脫離南京代牧區，托付給西班牙耶穌會會士管理。1929 年，蕪湖、安慶和蚌埠代牧區相繼成立。而且，每個代牧區都開辦了自己的地區修道院。

在河北，耶穌會繼續管理在原直隸東南代牧區的聖若瑟修院，1924 年改為獻縣代牧區。聖若瑟修院後來成為一所聯合修院，接收來自鄰近的宗座監牧區的學生。這些是來自永年（1929 年），大名（1935 年）和景縣（1939 年）的修生們。

1926 年，海門主教耶穌會會士朱開敏（1868 - 1960）在當地開辦了一所修院，共有 10 位修生。

1910 年，由於政治原因，澳門的耶穌會會士們不得不放棄對聖若瑟修院的管理權，但幸運的是，他們能夠在 1928 年返回澳門，並在第二年重新管理這所修院。

6.4. 其它的傳教修會

豫東代牧區自 1916 年起自治，由米蘭外方傳教會的修道院管理，1920 年在馮橋創辦了一所修道院，後遷至開封。鄭州、洛陽、駐馬店、信陽、歸德 / 商丘和新乡等新的代牧區和監牧區相繼成立，且各已建立了自己的修道院。開封總修院於 1932 年成立，隨後，所有上述總修院的大修生們都被送往開封總修院。

漢中代牧區位於陝西省南部，由羅馬聖伯多祿和聖保祿修院的傳教士們管理。該修院的修生人數，從 1910 年的 18 位增加到 1924 年的 27 位，1928 年又增加到 45 位。

在福建，由道明會神父們所照管的廈門和福州兩個代牧區，於 1913 年進行了重整，另外，台灣的宗座監牧區與廈門代牧區分離。

¹⁰⁰ 參閱 P.D'ELIA, *Catholic Native Episcopacy*, op.cit., 第 56 -57 頁。

1915年，厦門有7位攻讀神學的學生，1921年有12位中國神父在該代牧區工作。1913年，位於福安的福州修道院有20位修生。1920年，在福州的宗座代牧的住處開辦了另一所修道院，招收了20位攻讀哲學的學生，同時，10位攻讀神學的學生仍留在福安市。1919年，在這個代牧區工作的中國神父共有19位。

1923年，成立了定州宗座代牧區，隨後，於1926年，成立了福寧代牧區，1929年和1931年，邵武和建甌分別成立了宗座監牧區。

1928年，福寧的主教趙炳文（Theodore Labrador Fraile, OP, 1888 - 1980）在郵亭創建了聖若瑟修院，後來遷移到羅江，這是首位中國主教羅文藻的家鄉。1947年，該大修院更名為文藻修院。1929年至1930年，福州共有18位大修生和15位小修生，而福寧則有30位小修生，厦門有10位大修生和12位小修生。

1914年，由巴黎外方傳教會的神父們監護的廣州監牧區，被劃分為廣州和汕頭宗座代牧區。1920年，邵州代牧區從廣州分離出來，由鮑斯高慈幼會的神父們管理。1921年，廣東西部代牧區被劃分，一部分繼續由巴黎外方傳教會照管，這包括海南和廣西的一部分（1924年北海代牧區，現名湛江），而江門監牧區於1924年被委託給瑪利諾會的神父們管理。

汕頭代牧區的一部分，於1929年劃分出嘉應（現名梅州）監牧區，委託給瑪利諾會的神父們管理。每個地區都開設了自己的修道院，而巴黎外方傳教會的神父們，繼續把他們的大修生送到檳城修院。

關於瑪利諾會傳教士們的工作，瑪利諾會的一位神父寫道：

1923年（陽江的福爾德神父 Ford）在他的堂區里召集了11位男生，開始培育他們，準備成為神父。1924年，福特神父給總部回信說：“這個備修院無疑是這一年工作的重中之重，因為在未來，中國的神父將成為中國教會的中堅力量。” 開辦修道院是我們來到中國的真正動機——要建立一個本土的教會。“1926年10月，在江門郊外的北街，開辦了一所修道院，現在叫做‘小白花’備修院… 1925年，福爾德神父搬到了嘉應。他還帶了十位會說客家話的年青人來堂區長住，為將來祝聖神父做準備。很快，他就有了13位修生，到第二年秋天，他已經有了21位修生。由於這超出了堂區住宅的容量，他便承建了聖約瑟修道院，該修院於20世紀20年代末開放，一直開放到1950年。馬奕猷神父（Meyer）在梧州—桂林地區，最初把修生派往在江門的小花備修院，由於修生的人數不斷增加，馬奕猷蒙席於1934年在梧州郊外的丹竹開辦了自己的修院。命名為聖家小修院。在撫順市，林化東神父（Alois Lane）開辦了‘聖方濟各亞西西’小修院，然而，由於日本入侵滿洲，該修院剛剛慶祝了它建立十周年。就被迫關閉，該修院的21名修生被轉移到奉天（今日沈陽）神學院。¹⁰¹

¹⁰¹ 參閱 Peter Barry,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Chinese Clergy to the Growth of the Catholic Church among the Hakka People of Guangdong Province, 1845 – 1961” (在廣東的客家人中國神職人員，對天主教成長的貢獻，1845 – 1961)，載於 R. LU An – P. VANHAELEMEERSCH, *Silent Force... op.cit.*, 第217 – 218頁。

1914 年以來，在廣西代牧區，巴黎外方傳教會會士，刘志中主教（Maurice Ducoeur, 1878 - 1929）祝聖了五位本土的神父。1920 年，該代牧區被移交給瑪利諾會的神父們。在廣西，1922 年和 1924 年祝聖的本土神父的數目，已達到 14 位。

1908 年，在四川西南部的代牧區，巴黎外方傳教會的神父們在距離成都約 40 公里的彭州白鹿建成了一所宏偉的天使報喜修院（被稱為白鹿高級學院）。1916 年，該修院把它的大修院和小修院合並在一處。1920 年，大修院遷往成都。然而，一些大修生繼續被送往檳城修院。¹⁰²

1922 年，在聖母聖心會神父們管理下的以前那些代牧區，又做了進一步的劃分。先後建立了綏遠、西灣子、寧夏、熱河代牧區，以及外蒙古、甘肅東部和西部代牧區，和大同監牧區。從那時起，甚至又建立了教會的一些領地：1924 年建立了東蒙古（熱河）代牧區，1929 年建立了濟寧（烏盟）代牧區，1932 年建立了赤峰監牧區。這最後兩個領地被委託給本地的神職人員。其間，在 1921 年 1 月，決定在西灣子開設一所聯合修院。與此同時，在山西的大同，為敬禮聖女小德蘭而建的新樓開始動工。它可以容納一百多位修生。大修道院於 1923 年搬到那里。

1922 年，¹⁰³ 在中國，包括澳門、香港和檳城在內為中國本土培育的大修生共約有 40 位。大約 70 位小修生，或備修院的學生（也稱為預科學校）也在運作之中。大修院（學神學和哲學的大修生）有 582 位：學拉丁文的小修生人有 1672 位，而在大學或預科學校的修生有 673 位。1923 年，大修生的人數增至 666 位，1924 年增至 701 位，小修生在 1923 年人數增至 1826 位，1924 年增至 1843 位。

對文化融入的注解

燕肅思（Joseph Jenness）寫了這個歷史階段，在他的《中國教理講授史》（Four Centuries of Catechetics in China）（田永正譯，1976，台北，華明書局。第 211 頁）中說道：與此同時，變得越來越清晰的是，在對中國修生的培育中，在（歐洲人）手冊中明確表達的古典護教學，仍在普遍地使用，它沒有完全響應中國使徒工作的要求，它必須與中國精神文化中越來越多的現實問題相適應。

光若翰主教（Jean B. de Guebriant）在 1919 - 20 年，訪問了中國的所有傳教區，並提議在天主教震旦大學開設神學系。1903 年，馬相伯（1840 - 1949）在上海創辦了震旦大學。但是主教蓋布瑞安的建議沒有實現。然而，在 1925 年，美國賓州拉籌伯（Latrobe）的聖文森大修院的本篤會會士們，在北京創辦了天主教輔仁大學。1929 年，中國教育部承認輔仁為正式大學。1927 年 9 月 26 日，剛恒毅總主教主持了這所大學的落成大典。1933 年，該大學委託給聖言會管理。

¹⁰² 參閱 Celso Costantini, *Con i Missionari in Cina*, Roma, PUMdC, 1946, 第一卷 第 19 頁，描述了他 1922 年在訪問中國途中對檳城神學院的訪問和他的美好印象。

¹⁰³ Hierarchy, Missions, Seminairs, Ecoles catholiques en Chine (聖統制、傳教區、神學院、學校在中國) (Shanghai, 徐家匯土山灣印書局, 1922 年 11 月 21 日, 1925 年和 1926 年)。

辅仁大學的中國美術系造就了一批卓越的艺术家和許多优秀的宗教艺术作品。中國神父們开始进入辅仁大學深造，並获得學位。¹⁰⁴

第七章

1930 - 1945 年：“總修院”的發展

教宗本篤十五世 (Benedict XV) 于 1919 年發表通諭“夫至大”(Maximum Illud) 後，建立各地區神學院成為一個迫切的問題。羅馬的傳信部也鼓勵建立總修院。中國首位宗座代牧剛恒毅總主教 (Celso Costantini) 是一位非常有遠見的人，他為實現這一目標付出了一切努力。1924 年，在中國天主教第一屆會議上，與會的神長們決定在中國不同的地區設立 14 所總修院，以便為神職人員候選人提供更高質量的哲學和神學教育。

*我來到中國後，按照羅馬的指示，對修道院的問題給予了特別的關注，特別是地區性的修道院。到達後，我發現了一些欣欣向榮的修道院，如上海由耶穌會開辦的、聖言會在兗州府開辦的、遣使會在嘉興和大柵欄開辦的、聖母聖心會在大同府開辦的、巴黎外方傳教會在重慶開辦的修道院等。但是，有幾個傳教區的神學院條件很差…*¹⁰⁵

1924 年和 1925 年，剛恒毅總主教曾幾次寫信給宗座聖伯多祿善會 (Pontifical Society of St. Peter)，尋求財政支持，因為他認為在中國急需建立至少四、五個新的總修院。¹⁰⁶

這位宗座代表立即開始鼓勵各修會的主教們，要更好地重組他們的“聯合修院”，甚至建立新的“總修院”，例如，為華東地區，在開封建立修院 (1925 年 3 月 30 日，曾在河南主教會議上討論此事)，為華南地區，在香港建立修院，為河北北部地區，在張家口建立修院。

¹⁰⁴ 輔仁大學一直開辦到 1952 年，那時，中國當局將它與其他大學合併，成為現在的北京師範大學。1959 年，台灣主教團、耶穌會、並與聖言會合作，在台北重建了輔仁大學。它於 1961 年開始上課。2012 年，台灣政府承認了輔仁大學的學術職稱。

¹⁰⁵ 參閱 C.COSTANTINI, *Con i missionari in Cina*, op.cit., 第 262 頁。

¹⁰⁶ 參閱 *Comunicanda a Consilio centrali superiori Operis Pontificii a S. Petro Apostolo pro Clero Indigena in Locis Missionum* (Romae, Typis Polyglottis Vaticanis, 1926), vol. 1, 1 January 1926, 第 33、25 頁。

在宗座監牧區宣化所建立的一所總修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宣化總修院在1926年自治，委托給中國籍的趙懷義主教（1880 - 1927）管理。這位主教曾是剛恒毅總主教的秘書，1927年他們一起成立了主徒會（Discipuli Domini）。1930年，在新主教程有猷（1881 - 1935）的推動下，成立了聖若瑟大修院，服務宣化。易縣（1927年，印五傷傳教會（Stigmatins）的神父們在易縣開辦了一所地方上的修院）、汾陽、洪洞、臨清等代牧區（在4個省有5個代牧區）。它位於張家口主教宅邸的東面。它是根據本篤會建築師葛斯尼（Dom Adalbert Gresnigt, OSB, 1877 - 1965）神父的中式繪畫建築的。聖若瑟總修院一直運作到1941年1月，後來被移到主教的宅邸，該修院的建築首先成為蒙古和新疆自治區政府的駐地，1944年又被日軍占領。那時，修生們不得不返回他們各自的教區。宣化修院的修生們就在宣化主教的宅邸居住下來，這裡被稱為“聖家修院”。它一直開辦到1947年。

1930年10月3日，華南總修院奠基儀式在香港的香港仔（Aberdeen）舉行。它也是按照葛斯尼神父（Dom Gresnigt）的圖紙建造的，完全是中國風格的。1931年11月1日，來自廣東、廣西和福建的修生們開始上課。愛爾蘭耶穌會會士負責管理和教學。從1900年到1930年，在香港本地原有的修院已培養出15位神父，該但自此他們的大修生都派遣到華南總修院。¹⁰⁷

1932年10月29日，開封總修院正式開辦，葛斯尼神父也是這所神學院的建築師，開封總修院接受來自河南省各地的大修生。陝南漢中代牧區也把他們的大修生們派到這裡，學習哲學和神學。

與此同時，在1930年，方濟各會會士們在漢口開辦的聖文德修院（St. Bonaventure）於1928年秋季開始運作，招收湖北和湖南兩省教區的和方濟各小兄弟會的學生。該修院得到了聖座傳信部的正式認可，成為一所總修院。教區的修生住在主樓，而方濟各小兄弟會的教授和修生則住在附近的無玷聖母學院。1932年，位於成都附近的天使報喜修院，開始接受四川省所有的大修生。它與一所小修院交換了院址。

北京大柵欄修院在遣使會神父們的照管下，繼續接受其它代牧區的修生。1934年，聖座傳信部明確承認它是一所總修院。它最多可以安置一百位修生的食宿。1923年至1937年間，那裏有128位修生被祝聖為教區神父，另有32位進入了修會。隨着1937年中日戰爭的爆發，該修院進入了一個困難時期，直到1954年修院被迫關閉。

1934年，巴黎外方傳教會的雍主教（Georges M. de Jonghe d' Ardoye, 1887 - 1961）邀請聖蘇比斯會（Society of St. Sulpice）的神父們到雲南來，管理貴陽的大修院。

1934年4月27日，傳信部頒布了總修院委托於修會或傳教會的辦法。’1935

¹⁰⁷ 參閱 S. TICOZZI, *Historical Documents of the Hong Kong...*, *op.cit.*, 第63 - 66頁。

年年鑑’¹⁰⁸ 將以下 15 所修院列為“聯合修院或總修院”：

- 1) 北京大柵欄修院，由遣使會管理，有 42 位修生學神學，44 位學哲學；
- 2) 獻縣修院，由耶穌會管理，有 14 位修生學神學，18 位學哲學；
- 3) 宣化修院，由教區神職人員管理，有 19 位修生學神學，26 位學哲學；
- 4) 山西大同修院，由聖母聖心會管理，有 43 位修生學神學，34 位學哲學；
- 5) 濟南市洪家樓修院，由方濟各會管理，有 17 位修生學神學，12 位學哲學；
- 6) 山東兗州修院，由聖言會管理，有 9 位修生學神學，5 位學哲學；
- 7) 山西太原修院，由方濟各會管理，有 6 位修生學神學，7 位學哲學；
- 8) 上海徐家匯修院，由耶穌會管理，有 27 位修生學神學，18 位學哲學；
- 9) 河南開封修院，由米蘭外方傳教會管理，有 6 位修生學神學，13 位學哲學；
- 10) 四川成都修院，由巴黎外方傳教會管理，有 21 位修生學神學，17 位學哲學；
- 11) 湖北漢口修院，由方濟各會管理，有 23 位修生學神學，21 位學哲學；
- 12) 江西九江修院，由遣使會管理，有 15 位修生學神學，7 位學哲學；
- 13) 浙江嘉興修院，由遣使會管理，有 16 位修生學神學，11 位學哲學；
- 14) 香港香港仔華南總修院，由耶穌會管理，有 21 位修生學神學，34 位學哲學；
- 15) 位於英屬馬六甲海峽的檳城修院，由巴黎外方傳教會管理，有 24 位修生學神學，9 位學哲學。

年鑑還提到下列其它的大修院：沈陽、吉林、通遠坊、延安、秦州、鄭州、衛輝、福州、重慶、綏遠、兗州、貴陽和澳門。小修院有一百多所。

1935 年，巴黎外方傳教會邀請里昂的聖母升天會的神父們，來管理當時滿洲國的總修院。1936 年，第一批聖母升天會的會士們來到滿洲，管理吉林代牧區的新京（今日長春）的總修院。

¹⁰⁸ *Annuaire des Missions Catholiques de China 1935*, 上海 i, 徐家匯 Bureau Sinologique, 第 34 - 37 頁。

通远坊和甘谷縣的大修院在方濟各會會士的管理下，為陝西和山西的傳教事业服务。由于共產黨人在該地區的推进，後者于 1935 年 10 月关闭。修生先去了大荔，然後在孟高维諾 (Montecorvino) 修院建成後，便去了那里。事實上，凤朝瑞主教 (Agapito Fiorentini, 1866 - 1941) 已經开始計劃在太原附近的下庄建造一个更大规模的修院。它始建于 1932 年，于 1935 年竣工。1935 年 7 月 17 日，第二位宗座代表蔡宁 (Mario Zanin) 出席了孟高维諾修院的落成典礼。它于次年 9 月开始运作，大约有 30 位修生。該修院作為傳信部指导下的一所總修院。方濟各會同意為修生三年學習哲學、四年學習神學，提供教授。這所修院从头到尾由一组國際人士领导。由傳信部任命修院的院長。

在荷兰方濟會會士們管理的晋南代牧區，从 1895 年到 1935 年，他們在潞安（今日長治）為修生們教授哲學和神學，然後又把他們送到孟高维諾總修院。

1936 年，山東濟南洪家樓修院，成為由羅馬傳信部直接负责的一所總修院。來自魯北地區的修生人數增加了。方濟各會管理的聖若翰修院歷經日本占領山東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災難，幸存了下來。几位优秀的教授培养了教區的和方濟各會的許多修生，他們最終被祝聖為神父了。¹⁰⁹

曾委托给聖母聖心會的大同總修院，來自所有代牧區（热河、察哈尔、大同、绥远、宁夏、西宁等）的修院的修生們都去了那里。1936 年，哲學部與之分离，迁至新建的绥远修院。¹¹⁰ 到 1939 年，在那里接受培训的修生有 124 位。1925 年至 1943 年，大同總修院先後有 100 多位修生在這里陶成，被祝聖為神父。

1936 年，耶穌會士在芜湖开办了聖類斯修院，招收安徽傳教區的修生。

1937 年，由于中日战争的爆發，聯合修院或總修院的數量有所变化，其中包括福建大修院。因此，當時在香港學習的福建的修生，與福建省其它代牧區的修生一起搬到了這所大修院。1939 年，該省有 34 位大修生，福建的每个代牧區各有一个小修院，其中，福州有 21 位小修生，厦门 21 位，福宁 50 位。

1937 年，开封總修院的一部分房屋变成了一所军人伤病員的医院。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 1938 年初，那時，所有的士兵都在日军进攻前撤离。當日本在第二年夏天占领开封後，該修院便成為數百名難民的中心。日本开始轰炸，許多人受伤，這使城市中的每个人都感到恐惧。住在开封東部的人們到修院里避難，修院内接收了 4 百多名伤者，而數千名難民，主要是妇女和儿童，都在修院周围住下來。修院的全体成員肩负着照顧伤者和難民的重任。兩年後，難民們可以返回自己的家园；但他們仍然深情地、虔诚地與修院保持着联系。許多曾在修院避難的人每星期天都回到那里，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動，修院的教堂很快就成為一个新基督徒社區的搖籃。1942 年，修院周围的 15 个村庄的领导人，在許多心

¹⁰⁹ 同上，第 24 - 33 页和 52 页。

¹¹⁰ 参阅 Celso Costantini, *Con i Missionari in Cina*, o.p.cit. 第一卷，第 261 - 263 页：描述了他的访问，他非常赞赏该修道大同地区神学院院的良好管理：“神学院之间存在着完美的和谐，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呼吸到家庭的温馨气氛”。

存感激的人們陪伴下，在修院的外院竖起了一块巨大的牌匾，以纪念曾在那里發生的動人的往事。

1938 年，在山東南部，大修院及其修生們，與聖言會的大修士一起，从兗州转移到戴家莊，安置在為聖言會的初學生及修士所建的大樓里。該修院一直存在到 1945 年，那年，修院又搬回兗州。

1938 年 10 月，由宗座代表倡导的“中國北京司鐸书院”（Collegium Sinicum Pekinensis）在辅仁大學举里办了中國神職人員的首次學習班，由管理者聖言會的神父們做指导。1940 年，這所大學建造了一座新的大樓，作為 54 位神父的住所，這些神父當時正在辅仁进一步深造。然而，1943 年，书院停止了講課，神父和其他修生一起到大學去上課。

1938 年，由于中日战争的影响，獻县由耶穌會會士管理的聖若瑟聯合修院，从张庄迁至河间，仍在獻县境内。冀南傳教區，即：獻县、永年、大明，和景县的修生們，到此學習。1939 年 7 月 15 日，日军残忍地活埋了該修院的 24 名师生，声称他們與共產黨八路军有联系。悲劇發生後，1940 年，修院迁往景县（1939 年 4 月，景县成立了一个新的宗座監牧區）。它一直运作到 1944 年 1 月，那時，日军查抄了修院。修院的所有工作人員都被拘留了 14 天。然後，修院的教職員和學生到北京避難。

1939 年，西庄的孟高维諾修院有 46 位學生。在日本人占领期间，這裏的建筑被用作難民中心，修院的學生则搬到了太原市。1940 年 4 月，伤寒病严重袭击了所有住在那里的教授和 80 名修生，造成大约 10 人死亡。後來，修道院的學生回到了西庄。但是在 1942 年 4 月，由于中日战争和土匪猖獗，迫使神學院又重新搬回到城里的一所學院。

1941 年 10 月，由于太原被共產黨控制，陝西學生不能再往返太原，在西安的郊外开办了一所大修院，後來因安全原因，修道院转入城内。該市还有一所小修院。出于同樣的原因，大修道院只留在大荔（同州）和凤翔境内。

在那些年里，特别是在北部省份，由于战争活動的扩大，情況非常困難。人們的流動变得相當危險。因此，有些傳教會只能照顧當地的修生。“1940 - 1941 年鑑”¹¹¹ 中报导说，中國教會有 20 多个大修院和 35 个小修院。

1945 年，16 所大修院仍在运作。遣使會管理着三个修院：大栅栏有 94 位修生，九江有 13 位，嘉興有 40 位。道明會的神父們在福州管理着一所修院，有 27 位修生。耶穌會管理的三个神學院：香港有 64 位修生，北京（包括从獻县來的逃難者）有 29 位修生，徐家汇有 59 位。方濟各會管理着兩個修院，一个在漢口，有 25 位修生，另一个在太原，有 54 位修生。巴黎外方傳教會在檳城中央修院培训了 15 位中國的修生。米兰外方傳教會管理着开封的修道院，共有 39 位修生，而云南的修道院则由苏比斯會（Sulpicians）管理，共有 22 位修生。聖

¹¹¹ 参阅 *Le Missions de Chine, 1940 - 1941, Peitang Lazarists*, 上海, 1942 年。

言會的神父們管理着戴家莊修院，修生有 27 位。大同修院在綏遠設有哲學學部，由聖母聖心會的神父們管理。這兩所修院共有 89 位修生。聖母升天會（Assumptionists）的神父們開始在滿洲的新京（今日長春）修院工作，有 51 位修生。宣化修院有 40 位修生，由中國教區神職人員管理。此外，在中國不同的地區還有六所由當地開辦的大修院。

第八章

1946 - 1976 年：在共產黨的統治下

8.1 修道院的數目減少

尽管教會傳來重大喜訊：1946 年 2 月，中國產生了首位樞機主教田耕莘，並於 4 月 11 日，中國建立了聖統制，但接下來的十年，中國教會遭遇了許多困難。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創傷仍不息止，共產黨當局控制了不少修院。在神職人員候選人的陶成方面，最嚴重的問題是修生人數的急劇減少。這是由於可供陶成的地點減少，以及許多神職人員候選離開了中國，去外國學習和生活。1949 年出版的“中國傳教公報”評論說：“從 1942 年到 1947 年，這五年間，大修生的人數減少了 300 位。小修生人數也不足為繼。尽管中國的主教們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來尋找、歡迎和組織新的神職人員候選，但是，要經過幾年的正常招募後，才有可能重新向前邁進！”¹¹²

考慮到神學院的修生人數，1949 年 7 月 1 日，教廷公使黎培里總主教（Antonio Riberi）向中國所有的教區主教發表了促進神父和修會聖召的一封信，強調了增加神父人數的迫切需要。¹¹³ 這位公使遵照近代教宗們的訓令，強調陶成本地神職人員應該是所有神父，特別是正權人士（包括主教和傳教區首長）中“重中之重”（*praecipua*）的宗徒使命，以確保基督信仰的保存和傳揚。他細心地提供了有關統計數字和圖表，以顯示神父的人數是如何增加或減少的，以及需要多少聖召才能使福音工作有良好的進展。他鼓勵主教們以各種方式培養本土的神職人員候選，為聖召增加而祈禱，並更好地分配神職人員。

黎培里總主教于 1950 年 11 月 19 日，再次給所有的教區主教寫了一封信，題目

¹¹² 參閱 *China Missionary*, 1949 年 3 月 3 日，第 294 頁。

¹¹³ 參閱 *China Missionary Bulletin*, 1949, No.3, 11 月, 第 209 - 216 頁。拉丁文本 *Epistula ad Ordinarios Sinarum de Sanctis Vocationibus Promovendis*。

是“关于我們的修道院”，¹¹⁴ 他在信中首先提到大修道院的情況，其中，許多大修生不得不离开他們自己的修道院。然而，他們當中有 14% 的人，又得以在其它地方繼續修道。他提供了修道院的人數：1949 年，修道院修生的人數是 4106 人，而在 1950 年，這個數字降到了 3710 人。然而，让這位教廷公使非常担心的是：“小修院的危機”。

我們必須认识到，修院修生的人數有了进一步的和相當大的减少。對於大修院的修生來說，這是由于从前几年开始，修院修生人數大幅度减少所造成的严重後果；但我們對小修生和备修生的人數又能说出什么呢？

他重申了傳信部的方針，將小修生們合並在一起，並允許修道生进入公立學校學習。與此同時，他呼吁加大對他們精神培训的关注，使他們的人格和使徒精神都能成熟起來。他还敦請各家庭在促进聖召方面要發揮積極作用，並請傳教组织在這方面提供财政援助。

在這一點上，有必要發表评论。通過對中國 145 个教區性地域的預算作的考察，我們發現，往往有一大筆錢用于不同的社會服務（孤儿院、學校、醫院、診所、幼儿园等），而用于神學院的錢却少得多…

最後，他鼓励每个人都要作出“認真而果斷的努力”，向年青人灌輸聖召的种子，因為每一個神父聖召的首要和基本需求，都是對神父職務的真诚渴望。然而，不幸的是，政治局勢在恶化，使我們尚无法看到這種新努力的成果。

8.2 大修院

1946 年，區域性的總修院有 17 个，有 1076 位教區大修生和 138 位各修會的大修生，小修生的人數為 4,143 位。

在 1946 - 47 年鑒的報告中，聯合修院或地區總修院”如下：¹¹⁵

- 1) 大柵欄，北京，由遣使會管理，有 54 位學神學的修生，和 42 位學哲學的修生；
- 2) 長春市，滿洲，由聖母升天會管理，有 34 位修生；
- 3) 福州，由道明會管理，有 13 位學神學的修生，和 4 位學哲學的修生；
- 4) 漢口，由方濟各會管理，有 22 位學神學的修生，和 24 位學哲學的修生；

¹¹⁴ 參見 *China Missionary Bulletin*, 1951 年 3 月第 3 期，第 202 - 206 頁。

¹¹⁵ 參閱 *Annuaire de L'Eglise Catholique en Chine, 1948*, 上海，土山灣印刷社，1949。

-
- 5) 香港，由耶穌會管理，有 10 位學神學的修生，和 15 位學哲學的修生；
 - 6) 洪洞，山西，由教區神職人員管理，有 15 位學神學的修生，和 8 位學哲學的修生；
 - 7) 开封，河南，由米兰外方傳教會管理，有 17 位學神學的修生，和 14 位學哲學的修生；
 - 8) 景县，由耶穌會管理，有 32 位學神學的修生，和 46 位學哲學的修生；
 - 9) 九江，由遣使會管理，有 2 位學神學的修生，和 6 位學哲學的修生；
 - 10) 兰州，由聖言會管理，有 12 位修生；
 - 11) 嘉興，宁波，由遣使會管理，有 4 位學神學的修生，和 10 位學哲學的修生；
 - 12) 兗州，由聖言會管理，有 15 位學神學的修生，和 37 位學哲學的修生；
 - 13) 太原，由方濟各會管理，有 24 位學神學的修生，和 19 位學哲學的修生；
 - 14) 绥远（归绥），由聖母聖心會管理，有 40 位學神學的修生，和 33 位學哲學的修生；
 - 15) 濟南，由方濟各會管理，有 17 位學神學的修生，和 8 位學哲學的修生；
 - 16) 芜湖，安徽，由耶穌會管理，有 7 位學神學的修生，和 14 位學哲學的修生；
 - 17) 徐家汇，由耶穌會管理，有 24 位學神學的修生，和 14 位學哲學的修生；

在上面的列表中 提到洪洞，没有提及宣化。事實上：

战争结束後不久，宣化總修院迁至山西洪洞，照管五个教區的修生。1946年8月，共產黨人第一次來到洪洞。他們接管了修院作為他們的宿舍，但给修生們留下了一部分住处，所以修院的課程得以繼續。共產黨人在那里停留的時間很短，因為國民黨在1946年10月回來把他們赶了出去。1947年6月，共军重新占领了洪洞。大约一半的修生與國民黨军队一起离开了，因為他們意识到他們无法在共產黨的统治下繼續學習。然而，兩個比利時神父與12位修生留下來，繼續在這裡上課……1947年11月，共產黨接管了整个修院，但修院的神父和修生們被允許在同一洪洞市的天主教傳教會那里，繼續上課。總而言之，這所修院不僅受到共產黨人的骚扰，而且还受到山西省阎锡山军队的干扰。1948年，阎锡山的军队突袭洪洞，带走了十位修生，只留下兩位修生和神父們。六個月後，共產黨人占领了阎锡山部队关押修生的临汾市。他們被共军释放，又回到洪洞繼續學習。尽管受到战争的干扰和來自共產黨人不断造成的困難，這所修院还是能够坚持到這一年（1954年

3月，這兩位比利時神父被驅逐出中國)¹¹⁶

上面的名单没有提到大同修院，因为它所有的大修生都在绥远避難。這份名单中也没有提到其它教區，這些教區一直仍為大修生和小修生开办着自己的修院。如：陝西的周至、通远坊和同州，甘肅的兰州，吉林的四平，福建的福州和福宁，四川的白鹿和南充，¹¹⁷ 以及昆明、南宁和贵阳等地區的修院。其它正在运作的大修院是在澳门和檳城。1947年，嘉興修院的校舍成為省立医院。1948年初，來自共產黨控制地區的10位主教、50多位神父和400多位修生，都來到北京居住。1948年5月20日，主教們祝聖了22位新神父。這一年全年，全國共有104位新神父被祝聖。¹¹⁸

1949年，在北京的聖母聖心會（Scheut）傳教士用拉丁文出版了“中國修院名錄”（Directorium Seminariorum in Sinis）。1949年，在修院的名单中，長春、吉林和太原修院的名字被指為“已关闭”。事實上：

當時负责滿洲長春大修院的聖母升天會的神父們，关闭了他們的修院，並於1947年返回歐洲（其中一些神父轉而从事使徒工作）。該院的一些修生加入了北京大柵欄修院。方濟各會的神父們也暫時关闭了山西太原的總修院。因為這種情況，湖北漢口總修院吸收了這些修院的一批修生。遣使會的神父們，在他們浙江嘉興的中心聚集了來自全國各地的修生，和來自南區的修生們。由耶穌會管理在徐家匯的聯合修院，在傳信部的贊助下，已成為一所在地區總修院。¹¹⁹

來自滿洲的33位修生被分配到北京和天津繼續學習。1947年，由于共產黨對東北的占領，吉林的小修道院和大修道院均已关闭，修生們被遣散回家。在太原，孟高維諾總修院——它曾經平均每年接收30至40位修生——于1948年7月被迫关闭，其學生被分配到北京和漢口。其中36位學生經由天津和上海，最終到达澳門。

1949年2月，由于共產黨军队占領了整个華北地區，羅馬教廷指示各大修道院，要让修生們搬到安全的地方繼續學習；如果可能，小修道院要搬到偏遠地區。羅馬教廷还鼓励所有神職人員要各自留守在原地。

1949年夏，學年結束時，中國天主教會还开办着14所地區總修院。然而，每一所修道院都曾面临或正在面临各种严重的困難。

在北京，从1945年10月到1946年2月，國民黨军队占用了大柵欄修院的許多建筑，尽管修生們仍可以繼續上課。1948年12月晚些時候，該修院变成了一

¹¹⁶ 参阅 *Mission Bulletin*, 1954年6月，第576页。

¹¹⁷ 南充的大修道院由本篤會神父門管理，他们在1949年被逮捕，然后被驅逐出中国

¹¹⁸ 参阅 *Mission Bulletin*, 1954年6月，第525页。

¹¹⁹ 参阅 *Annuaire de l'Eglise Catholique in China 1949*, 上海, 土山灣印刷社, 第VI页, 直到1949年6月30日的统计报告。

个军营，迫使修院的修生們搬到北京城里，在北京，聖母聖心會的神父們為他們提供了學習的場地。然而，一些修生去了馬尼拉、香港或台灣。1949年2月1日，該修院的師生又可以返回大柵欄。然而，在1950年，60位共產黨的武警長住在該修院內。留下的75位修生被迫參加洗腦課程。凡沒有通過這門課的修生都被遣送回家。1951年9月，該修院重新開放，招收了92位修生，但警方認為六位外國神父的存在是不可取的，因此將他們全部驅逐出了中國。李斯定神父出任大柵欄修院院長，直至1954年該修院被關閉為止。¹²⁰

北京教區修院延續了一段時間。1955年7月10日，一份來自首都的電報稱，在那一天，“自共產黨接管中國以來，第一次有一位神父被祝聖”。但是，這條消息是不準確的，因為1949年以後，中國許多地方都舉行了祝聖神父的儀式。這條新聞的意思是，這是自北京這個“進步的教會”“首次”祝聖神父，因為北京總教區及其修道院已落入數位“革新”的神父之手。¹²¹

在首都，由耶穌會會士管理的聖若瑟大修院，接受了許多其它修院的修生。1948年，天主教新聞的一份報告告訴我們：

*來自河北、山西、山東、滿洲等29個教區的372位修生，于今年秋季進入聖若瑟修院就讀。大多數修生的家庭現在都處在被共產黨占領的地區。*¹²²

1949年，共產黨接管北京後，一些修生就分散了，200多位修生與他們的耶穌會老師們，先搬到了安全的地方，後來，在耶穌會宗座視察員的命令下，他們以小團體的形式，前往菲律賓，在馬尼拉繼續他們的神職陶成任務。¹²³到1959年，北京所有的教會機構都被政府接管，所有的教堂都關閉了。

1947年，甘肅蘭州修院首批四位修生完成了神學課程，被祝聖為神父。1948年和1949年，當地主教濮登博(Theodor Buddenbrock, 1878 - 1959)每年都祝聖三位神父。1949年，該修院有來自7個代牧區的30位修生。即使在1950年“解放”之後，仍有5位新神父在春天被祝聖，隨後，在1951年又祝聖了2位神父。由於主教于1951年秋被驅逐出境，在該修院學習的一些修生，連同修院的幾位教授，到了其它的教區，其中18位修生在那裡被祝聖為神父。那一年，15位大修生在一位中國籍院長的指導下，繼續在該修院學習。1953年，其中7位被關進監獄。然而，該神學院在1954年4月仍祝聖了4位新神父。1956年9月，有消息說，這所修院仍照常運轉。實際上，它只關閉了相對較短的一段時間，¹²⁴但於第二年，它不得不永久關閉。

¹²⁰ 參閱 E. MALATESTA - GAO Zhiyu (編輯), *Zhalan the oldest Christian Cemetery in Beijing*, op.cit., 第 67 - 69 頁。它寫道：“1697 年至 1950 年間，共有 800 位遣使會會士在中國服務。其中，中國神父 349 位，中國修士 30 位”。

¹²¹ 參閱 *Mission Bulletin*, 1955 年 9 月第 624 頁。

¹²² 參閱 華明出版社，1948 年 9 月 1 日：載於 *China Missionary* 1948 年 5 月，第 629 頁。

¹²³ 他們被祝聖為神父後，便被派往菲律賓及周邊國家和地區（主要是新加坡和台灣）等地，建立堂區和學校，為那裡的華人社區服務。

¹²⁴ 參閱 *Mission Bulletin*, 1956 年 11 月，第 692 頁。

在山東，1948年夏末，因為共產黨军队的压力，濟南的洪家樓總修院被迫关闭。外國教授不得不离开中國，修院的27位修生途經上海，在漢口避難，並繼續他們的學業。其他人則分散而去。修院的建筑後來成了一個纺织厂。

在兗州，1948年7月12日至13日那天夜里，數發炮弹落在聖言會管理的聖堂、學校和修院内，虽然120位小修生和大修生都没有受伤，但造成建筑物的严重破坏。小修生們搬到了芜湖，而55位大修生在共產黨占领該城後逃往南方。他們在上海附近呆了半年，在福建呆了三个月。福宁教區主教牛會卿(Thomas Niu, 1895 - 1973)于1949年3月和4月，將這些大修生中的十位祝聖為神父。一些大修生隨後前往羅馬深造，一些修生完全离开了修院，余下的35位修生在香港短暫停留後，在菲律賓找到了新归宿，繼續他們的學業。1954年，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在那里被祝聖為神父。

在整个战争期间，福建總修院一直在开办着，課程照常进行。在1942 - 45年间，有7位新神父被祝聖，另外7位也完成了他們的學業，开始从事牧灵工作。1945年，大修生有18位。1948年，福建省大修生有57位，厦門教區11位大修生在香港的總修院學習。由于道明會的神父們在1950年被驱逐出境，此後不久，福建總修院就被迫关闭了。

1948年，上海徐家匯修院成立了修院難民委員會，為難民服务。1949年9月，學校新學年開學，共有52位學生，其中26位是中國人。1950年至1955年9月，徐家匯修院的院長是金魯賢神父(Aloysius Jin, 1916 - 2013)。六位外籍教师仍获准在修院任教，使這所修院得以繼續运作。耶穌會的士林哲學課已經关闭。1955年3月4日，該修院最後三位耶穌會外籍教授离去，前往香港。

1955年9月8日晚，上海各大、小修院及备修院的院長、教师，與龔品梅主教(1901 - 2000)及其他神職人員一起被捕。後來，修道院經受了第一次改造，成為“进步神職人員培训中心”。1956年2月，許多修生被遣送回家。1957年，該修院又变成了一个“青年培训中心”，有800位青年在上課。修院的樓上变成了女生宿舍。教堂被用作思想改造課程大厅，1959年改為“反對天主教的博物馆”，最終成為人民委員會的驻地。¹²⁵

1954年，獻縣教區派往徐家匯學習的7位修生被迫返乡。他們聚集在張庄，想在那里繼續學習，尽管有种种困難。1955年，張庄修院有16位修生，第二年，該修道院可招收河北南部四个教區的修生。該修院修生曾到达近60位。然而，該修道院在1958年不得不采取半工半讀的制度時，許多修生便离开了修院。其余的修生都去了天津，兩個修院就此合並。那里的修生總數只有11位。不久之後，宗教事務局把這個修院变成了一个塑料厂。

河南開封總修院在1949年有34位修生，1950年增加到40位。1950年，小修院

¹²⁵ 所有這些数据和资料来自羅漁，“大陸中國天主教四十年大事記，1945 - 1986”，輔仁大學出版社，台北，1986年。

被勒令关闭，军队占领了該修院四分之三的建筑。修院的修生們必須首先参加土地改革，而後又必須参加“思想改造”課程。自1951年10月起，該修院由馬昌仁神父（Anthony Ma, 1886 - 1961）担任院長。

1953年鑒的一份報告說：

1949年，共產黨接管了修道院，修院的一部分變成了工廠，另一部分變成了培養共產黨員干部的學校，還有一小部分空間留給了神父和18位修生。他們還能夠在狹小的地方繼續生活，自5年前“解放”以來，已祝聖了21位新神父。其中兩位新神父已被捕入獄，其他的神父則從事體力勞動，並盡其所能地履行神父的職責。有一位修生于這一年（1953年）6月17日被投入監獄。他設法給捎出一封信給其他的修生們，讓他們不要為他擔心，說在監獄里的日子還過得去。他鼓勵他們要堅強，並敦促他們：“你們應該為聖座勇敢地作見證”。這一年10月20日，共產黨派了20位领导干部到修院給修生們上課。不僅在課堂上，甚至在娛樂活動中，他們與修生們都在一起，試圖用共產主義思想影響他們。¹²⁶

最後三位在該修院工作的意大利傳教士，于1953年11月初抵達香港。在嚴重的壓力下，馬神父和修院的修生們繼續勇敢地生活和學習，直到1958年7月，這所地區修道院關閉。該修道院的房地成為工人的住宅。馬神父和兩位大修生被捕入獄。其他的修生們則被送往再教育營，或被遣送回家。1948 - 49年，漢口聖文德修院有100位修生，他們隸屬於漢口、濟南和太原三個地區總修院。共產黨占領這座城市後不久，認為這所神學院是反革命的。在1949年4月的聖周，羅錦章（Giuseppe Maurizio Rosa, 1888 - 1961）總主教祝聖了29位新神父。其他的神職人員候選人在他們最後一學年則被送回他們自己的教區或其它地方。在韶州的鮑斯高慈幼會接受了其中的四位大修生，而其他修生則前往澳門完成學業。

漢口修院及其留下的修生們繼續工作和學習，還有一些修生是1950年下半年從兗州轉來的。與此同時，在武昌的小修院和百泉方濟各會修院仍繼續順利地開辦着。

1952年，一個軍隊醫院佔據了該大修道院的全部四翼的房屋，迫使修生們在一個傳教會的會院寄居。修道院的老師們住在神父的宅邸，教堂也用作宿舍，課程在要理班的房子里舉行。

儘管受到共產黨的各种壓力和攻擊，漢口的大小修院一直運轉良好，直到當今（1952年）。截至7月1日，40位小修生和30位大修生，仍像往常一樣，繼續學習和生活。¹²⁷

¹²⁶ 參閱 Mission Bulletin, 1954年2月，第192頁。

¹²⁷ 參閱 China Missionary Bulletin, 1952年12月10日，第557頁。

1953年7月14日举行了該修道院成立25周年的庆祝活動。¹²⁸

可以说，修院為繼續其課程而进行了生死搏斗。當共產黨索取他們已在使用中的這些房屋時，修生們已經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好几次了。修生的家里都接到政府的通知，建議甚至威胁他們要把修生从修院召回，但修生們坚持下來，度過了所有難关。他們最後一个學習的地方是在基督君王教堂。教堂上层的阁楼可以安置修生們在那里睡觉，而上課和吃饭都在楼下的教堂里举行，他們在教堂内使用的地方用一个帐幕與聖所隔开。祝聖神父的事，共產黨宗教事務局局長是在事後才知道的。因此他命令说，修道院安排祝聖神父的儀式時，必須事先得得到他的許可才能举行祝聖儀式。¹²⁹

1953年和1954年，所有外籍教师被驱逐出境。該修院在中國方濟各會的领导下繼續运作。1956年9月14日的一份报告指出，漢口總修院的中國神父“積極參與工作，該修院共有52位修生”。他們要求30套伦理神學和其它宗教著作。這些书平郵給他們，他們收到了…”¹³⁰ 然而，在第二年，神學院就关闭了，修生們各自散去。在江西，嘉興修院于1949年夏天关闭。修生們去了菲律宾或意大利。1960年，這里变成了一所养老院，後來，于1969年，嘉興海军运總輪公司又占据了這里。

1948年12月，內蒙古綏远的归綏總修院，有6位教师和59位修生，他們迁往宁夏，在宁夏的一所學校里安置下來。1949年底，修院的修生可以返回綏远。那時，军队甚至占据了小修院，修院的師生們搬到了其它地方，直到後來與大修院合並。1954年，修院内建了一个地毯厂。修生必須同時工作和學習，直到1959年，修院的修生們全部离去。

1949年，在成都，巴黎外方傳教會的彭道全主教（Henri Pinault, 1904-1987），將天使报喜大修院和小修院搬到了另一个地方。同年9月，他派遣了11位修生到檳城繼續學習，只有18位修生繼續在這新地点上課。1949年12月，共產黨接管成都後不久，白鹿下书院就变成了养老院。修生們被轉學到琼萊的一所中學。养老院在1950年被政府接管，变成了白鹿中學。在接下來的几年里，大修院和小修院（白鹿上书院和白鹿下书院）、敬老院、孤儿院，以及教會开办的其它機構都陸續关闭。¹³¹

1949年11月27日，云南昆明的一所大修院向檳城派遣了12位大修生，只留下几位正准备接受祝聖的神父，新神父被祝聖後，修院就关闭了。

在安徽，1949-1950學年，由耶穌會管理的芜湖總修院有33位修生。然而，

¹²⁸ 参阅 A. SERNAGIOTTO - E PIZZOLATO, *Un Francescano in Cina (1947-1954)*, Poligrafia Montebellunese, Montebelluna 1995, 第150-157页。

¹²⁹ 参阅 *Mission Bulletin*, 1954年4月, 第393页。

¹³⁰ 参阅 *Mission Bulletin*, 1954年4月, 第393页。

¹³¹ 尽管这个有百年历史的修道院的旧址在2006年被列为国家遗产,但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就在它百年庆典的前一周,完全毁坏。政府计划将重建该遗址,使其恢复原状。

他們必須把學習和體力勞動相結合。第二年，有 19 位大修生和 23 位小修生在這里上課。1951 年，修院被占據，修生們搬到了宣城。1951 年 12 月 14 日，9 位“進步的天主教徒”以政府的名義接管了修院。修生們經過兩個月的思想教育後，有 20 位中國修生或返回家鄉，或分散到其它地方。修院的兩位院長被捕，分別被判處監禁 8 年和 9 個月。¹³²

在陝西，共產黨于 1949 年占領西安後，南裴家、大荔和鳳翔的三所修院被關閉，但在西安開設了一所中心修院。從 1951 年到 1958 年，教區神父在修院任職。1958 年，該修院也關閉了，因為政府不允許任何修生被祝聖為神父。

8.3. 在共產黨統治的中國之外

到 1958 年，中國大陸所有的大修院都關閉了。只有澳門的聖若瑟修院、香港的華南總修院，以及檳城修院，繼續培訓着中國的修道生。

在日本占領香港期間，澳門的聖若瑟修院，在 1944 - 45 年的一段時間內，對華南總修院的修生們給予庇護。從 1949 年起，聖若瑟修院接受來自中國的修生，他們主要來自湖北和湖南兩省。1954 年該修院有修生士 91 位，其中 36 位來自歐洲，37 位來自澳門教區的其它地方，12 位來自廣州，4 位來自北海，2 位來自汕頭。該修院一直開辦到 1967 年，那時中國文化大革命（1966 年 - 1976 年）蔓延到澳門。修生們隨後被送往香港。¹³³

在香港，從 1949 年春季起，華南總修院也開始接收來自華北地區的修生。它成立了一個特別委員會來研究新的需求，並設置特殊的課程，“以便讓修生們做好準備，以適應中國大陸變化的新形勢。”到 1949 年 8 月，委員會已提出了一攬子建議。然而，新修生的流動性打亂了實際的培訓計劃。隨着難民的到來，該修院的修生總數已達 120 位。1953 年 9 月 29 日，修院的院長，耶穌會的倫若瑟神父（Joseph Garland, SJ, 1909 - 1997）寫道：

這里的生活當然很忙碌，但也很有趣。我們不僅要照顧這里的修生，還要考慮他們接受聖職後的去向，讓一些主教接受他們。他們當然要有自己的主教歸屬，找到工作的地方。但最難的是，必須安置那些半途而廢的學生。我們不能把他們送回在紅色中國的家庭，因為他們已沒能力和已在那里找工作的人們相競爭。¹³⁴

¹³² 參閱 *China Missionary Bulletin*, 1953 年 2 月，第 184 頁。

¹³³ 空空蕩蕩，整個建筑群多年來一直關閉，但幸運的是，由於當地歷史學家特西拉神父（Manuel Teixeira）和旅遊部的興趣，修道院和教堂已被修葺一新，成為一所博物館，向公眾開放。最近，澳門聖若瑟大學也在使用這里的房產。

¹³⁴ 引用 Thomas J. MORRISSEY, *Jesuits in Hong Kong, South China and Beyond, Irish Jesuit Mission - Its Development, 1926 - 2006* (Xavier Publ., Hong Kong 2008), 第 358 頁。

在香港黃竹坑 (Aberdeen) 的華南總修院，最初是為了培訓中國南部省份廣東和廣西的中國神父而設立的。現在 (1954 年)，由於中國的情況，該修院正在培養來自中國北方和南方的神職人員候選人。共有 83 位修生註冊 (41 位攻讀神學和 42 位攻讀哲學) 包括來自 24 個傳教區和中國主徒會的修生。該修院有 39 位來自長江以北地區，一位來自遙遠的毛里求斯，43 位來自南方。今年 (1954 年) 7 月 1 日，該修院祝聖了 9 位神父。這些修生都渴望回到他們本地的傳教區，但在目前的情況下，這當然是不可能的。修院的領導們現在正在設法在世界各地尋找地方，以便讓新祝聖的神父們可以在那裡為他們的同胞工作。修院的神父現已分別在溫哥華、華盛頓、蘇門答臘島附近的班卡、雅加達、爪哇的三寶壟、英屬北婆羅洲的沙撈越，以及台灣的華人中間工作。事實上，語言是修院最大的問題之一。沒有一種語言是修院里每一個人都懂得的。所有修生都懂一些普通話，但南方人只熟悉他們家鄉的廣東話、客家話、福建話或閩南話，這些南方的方言彼此差別很大。有些人英語說得好，有些人只懂一點；少數人懂法語或德語。拉丁語的要求很高，但第一年的修生用拉丁文日常會話有很大的困難……目前修院已經滿員，但並不擁擠。它目前最需要的是要有一個合適的聖堂，來取代目前正在使用的臨時教堂。¹³⁵

1958 年，該修院的修生有 77 位，1960 年減少到 54 位，1961 年又減少到 33 位。隨著時間的推移，不僅修生人數減少，且財政負擔增加，而且一些教學和陶成方法也成為批評的對象。1961 年，這所地區修院努力找到補救辦法，並改進管理。然而，它正在接近關閉。1964 年 2 月 17 日，傳信部做出最後決定：“自本學年結束時起，停止該修道院的活動”。1964 年 6 月底，六位修生被祝聖位神父，其中三位來自香港，兩位來自廣州，一位來自北京。隨著新學年的開始，這所總修院成為香港教區聖神修院。由耶穌會士管理的馬尼拉聖若瑟大修院，繼續培訓修生，直到 1958 年他們完成了學業，並被祝聖為神父為止。

關於檳城修院：位於馬來西亞普勞提庫斯 (Pulau Tikus) 的檳城總修院，在上世紀四五十年代末，接納了來自滿洲和中國各地的流亡修生。他們受到共產黨的迫害，迫使許多年青的修生逃離他們的國家。他們中的許多人在完成學業後仍無法返回祖國，他們便選擇在馬來西亞、新加坡，和遠至加拿大溫哥華的華人聚居地服務。¹³⁶ 當時，檳城修院接納了 50 多位教區修生，這些修生不僅來自華南，也來自華中和華北的許多教區。

8.4. 小修院

在 1947 年，傳信部給中國各教區首長 (主教) 發出指令，允許那些無法開辦小修院的教區，將他們的修生集中放在聯合修院內，或者送到普通中學，為使這些未來的神職人員，至少能獲到與世俗學生同等的文化教育。他們所稱的“地區

¹³⁵ 參閱 Mission Bulletin, 1954 年 11 月, 第 893 - 894 頁; 同一刊物: 1956 年 1 月, J. Garland, The Regional Seminary, Aberdeen, Hong Kong, 1930 - 1955) 第 33 - 35 頁。

¹³⁶ 參閱 The College General's 網站。

的小修院”，1948年全年都在组建。

當時的一份報告詳細介紹了，在湖南省是如何開展這項工作的：

在湖南省，除了一所修院外，所有的修院都在戰爭期間被迫關閉，這讓有關的主教們非常失望。所以，教廷公使黎培里總主教 (Anthony Riberi) 于 1947 年春召開了一次湖南全體主教會議，與會主教們果斷地通過了一個完整的傳教復興計劃。討論的議程包括一項旨在改組該省修院制度的決議。許多有關的主教認為，在當時特別的時期，修院的問題是一項非常困難的工作。基金不足，尤其是缺少神父，申請進入修院的人數太少。但是，對使徒工作而言，克服這些困難是必須的，而且是迫切的職責和任務。他們必須為此採取一些切實可行的措施。這一屆特別會議的目的是建立一個總區的聖心小修院。該修院選址於衡陽。事實上，這是當時唯一可能的選擇。因為這地點又大又寬敞，足以容納大量有潛質的修生。這所修院的建築急需修葺。它先後被日本和美國軍隊占用過，後來被當地政府接管；因此，會議決定對該建築進行全面整修，並為下一學年的修生入住做好準備。1947 年 9 月 7 日，聖心地區的小修院正式舉行了開學典禮。¹³⁷

有 27 位修生註冊。在 1950 - 51 年間，修生總數增加到 73 位。關於湖北的情況，是這樣報導的：

在每個總主教區都建立一個地區的小修院，這是這位教廷公使的一個計劃項目。襄陽的宗座監牧易宣化 (Francis Yi Xuanhua, 1900 - 1974)，為推廣此計劃得到了羅錦章主教 (G. Maurizio Rosà, 1888 - 1961) 和宜昌主教的同意，派送來 13 位修生，作為寄宿生，到‘文沱中學’學習。這是這所地區的小修院的開始。現在已宣布，漢口羅大主教將小修院的院址選在武昌。宜昌修院的修生于 1948 年 7 月去了武昌，老河口的 11 位修生也去了那里。從今以後，在武昌將有來自十個傳教領地的許多修生。¹³⁸

那些年，開辦小修院的地方有：北京、天津和河北的張莊；內蒙古的三盛公、西灣子、玫瑰營；山東省的濟南和青島；山西省的榆次、洪洞；陝西的三元、漢中；甘肅的蘭州、平涼；江蘇的海門及蘇州；安徽的安慶、蕪湖、蚌埠；河南的南陽、衛輝、開封、新鄉；四川的成都、西昌、康定、南充；湖北的武昌；湖南的衡陽；江西的九江、贛州，吉安；南昌；上海的徐家匯；浙江的台州；福建的廈門，漳州、建甌，邵武；廣東的海門、廣州、嘉應、北海、江門；廣西的南寧，平南，梧州；貴州的貴陽、安龍；雲南的昭通、大理等地。

1950 年以前，在東北地區，由於戰亂和共產黨軍隊的佔領，多個小修院不是關閉就是南遷，或者，讓修生們主要在北京、天津、張莊、徐家匯等修院學習。在

¹³⁷ 參閱 Reginald ARLISS, *The Regional Seminary of Hengyang, China Missionary*, 1949 年 1 月，第 43 頁。

¹³⁸ 參閱 *China Missionary*, 1948 年 12 月，第 883 頁。

其它總修院繼續正常地开办着。但是，從 1950 年起，各修院的困難几乎无处不在。

1950 - 51 學年期間，前宗座代表處的宅邸空無一人，因為黎培里總主教已搬離南京。這個宅邸托付給易縣教區的主教馬迪懦(Tarcisio Martina, 1887 - 1961)照管。這位主教就把該宅邸變成了易縣和汾陽教區的小修院。然而，1951 年 3 月 5 日，共產黨當局佔據了所有這些房舍和建築物，並遣散了所有的修生們。到 1951 年，福建、四川的小修道院，以及華南所有教區的小修院都悉數關閉。

20 世紀 50 年代初，所有的小修院都採用了學習和勞動相結合的制度，但在隨後的幾年里，它們被迫關閉，其房地產都被用於其它用途。

小修院的學習系統

衡陽小修院

在宗座公使的正式認可和該省主教們的批准下，修生們在天主教仁愛中學開始了他們的古典文學課程。這所學校提供普通初中的全部課程。去年又增加來高中部。郭神父(Anthony Kwo)是這所中學的校長。他在羅馬完成了他的學業。副校長為張神父(Bartholomew Chang)。在他們的卓越領導下，這所學校享有盛譽，遠遠超過了市內其他幾所中學。目前學生人數 520 位。由於缺乏食宿條件，許多申請人在本學期開始時必然被拒絕。此外，這所學校是一所嚴格的寄宿學校。

宗教陶成

這所學校為中國學生的宗教陶成提供了一切可能的宗教設施。學校的小教堂坐落在大院的中央，這裡的教友男生每天都參加彌撒，而且他們傍晚在這裡再次聚集做晚禱。方濟住院兄弟會的張方濟神父(Francis Chang OFM)每周為他們上兩次基督信仰教理課，學校的校長在每主日的大彌撒上對他們進行生動的講道。不用說，這所學校的天主教氛圍與其它高中的氛圍形成了解明的對比。事實上，許多外教的男生都踊躍地上基督信仰教理課。

靈性的陶成不會缺少

從過去和現在學年所積累的經驗來看，對修院修生聖召的安全幾乎沒有什麼可擔心的。首先有長上們的仔細監督。負責修院的兩位神父就在這所高中教書。其次，規定修生們和在俗的男生們之間的社交僅限於宗教話題。這一規定明確地區分了修生們和世俗學生的生活。在每學年的開始，校長都會向學生們介紹修院生活的理想和目標。我們可以很真實地說，修生們對世俗男生們有着深遠的影響，並且，自然地受到後者的高度尊重。

缺少教友教师和教科书

由于缺少教友教师，許多教师都是外教人。當然，他們都是經過慎重挑选才聘用的。這些外教人教师中，有些人已在教會學校教书多年，而另一些人則對教會很有好感。誠然，主教最渴望修院的工作人員完全由天主教的精英教师組成。他正在為這個理想而努力。

學校教科书是另一個難題。由于高中使用的教科书都必须事先得到教育委員會的批准，而且，這些教科书的選擇決不是按天主教的标准，因此不可避免地會包含一些與天主教教义相抵触的思想和观点。可悲的是，迄今还没有天主教的一套教科书，但我們確信，這種情況將會得到补救。為了消除這一障礙，一位神父事先就教导修生們，明确告訴他們，天主教會對某些特定問題上的立场和观点，以便修生們能辨別教科书中被歪曲的，或與天主教教义相违背的内容。

良好的心理补药

慈母教會一直把理想放在她年輕的修生們的心里，這理想不僅是要做一位好神父，而且是一個熱情和積極的使徒。在他被祝聖位神父以後，他便是“雖然在世界上，但不屬於這個世界”。然而，對他來說，與世俗學生打交道，看和聽他們對當前問題的反應，沒有裨益嗎？……要知道，修生們現在所建立的這些聯繫，很可能對他們將來的傳教工作會有很好的幫助。

靈性操练

…早上五點半醒來後，在高聲說“讓我們讚頌主”（Benedicamus Domino）之後，他跪在床前，與他的同伴們齊聲誦讀使徒奉獻的晨禱。在默想、彌撒、領聖體和謝聖體之後，他忙碌的一天便開始了。拉丁文是聖教會傳統的语言，在學習時間表中居于首位。他經常在上課和下課的路上短暫地去聖堂里拜聖體。晚飯前，他和其他同伴一起聽屬靈的讀經和念玫瑰經。在晚上的最後一節課結束後，方濟住院兄弟會的叶神父（Cherubino Elzi）就靈修生活做了十分鐘的講道。如上所述，正規的基督教教义在一周內講授兩次；他在每個周日早上，聆聽一次靈修的會議。修生們通過實際的礼仪訓練，在每主日早晨舉行大禮彌撒，並在晚上日課的夜禱。最後，我們還要補充說，修生們領聖體的次數和他們的虔誠精神表明，他們的靈修陶成情況，絲毫沒有因為與世俗男生們在一起學習而受到不利的影響。

目标要确定，方法要灵活

在中國教會歷史上，這種還未曾嘗試過的神職陶成新方法，成敗將由未來的歲月驗證。但不可否認的是，在慈母教會漫長的歷史記載中，始終都見證了，只要教會能更好地執行她的使徒使命，加增天主的榮耀，她總能適應不斷變化的時代環境，而決不會在原則問題上妥協。當然，原則問題沒有任何妥協的余地。唯一的問題是，要為她年輕的神職人員提供更有機會，使他們在被祝聖為神父後，能勇敢地履行他們肩負的神聖職責。

羅神父 (Reginald Arliss) 的文章, China Missionary,
1949 年一月刊, 第 43 - 46 頁

上海徐家匯的模式

在上海, 神職人員候選人在小學畢業後, 要在徐匯公學 (St. Ignatius College) 繼續他們的中學學業。徐匯公學對全上海市的學生開放, 包括天主教徒和非天主教徒學生。

在最初的三年里, 這些神職人員候選人和其他普通學生在一起, 學習同樣的課程, 遵守同樣的規則。他們並不形成一個單獨的群體。

從高中開始, 持續三年, 他們雖依然參加聖依納爵學校其他學生的所有課程, 但他們處於一個特殊的群體, 與其他學生分開生活, 遵守特定的規則。在高中期間, 他們特別要上一門拉丁文課程: 這就是為什麼他們被稱為“拉丁文學生”, 他們的群體被稱為“備修院”, 即進入修院之前的階段。然而, 他們尚未算是修道生, 所以也不被稱為“修生”。

六年的中學畢業後, 他們便進入徐家匯的所謂“小修院”。在“小修院”期間, 他們再深入學習拉丁文, 而他們在中學的最後三年里, 只是曾把拉丁文作為一門選修課, 同時更深地學習了中文。這三年的課程是按照震旦大學 (Aurora University.) 文學系的教學大綱來規劃的。

即使在徐家匯學習了這些課程, 大部分的“小修生”還是報名要在這個院系就讀。在三年的學習結束之後, 這些修生和該大學文學系的其他學生一樣, 經過考試拿到大學學位。這樣, 徐家匯修道院几乎所有的學生, 都同時獲得了正式的中學文憑和大學文學系的文憑。

修生們只有在“小修院”期間, 完成三年的大學學習後, 才可以進入“大修院”攻讀哲學和神學。

與中國其他修道院的修生們相比, 徐家匯修生們的在校學習時間, 多出了三年。

總而言之, 他們在中學學習了六年, 其中最後三年是在備修院度過的; 再加上三年在大學學習, 構成他們整個“小修院”的學習時期; 最後, 還要在大修院再學習了六年的哲學和神學。他們在學習神學三年後, 被祝聖為神父。



第三部分

中國天主教修道院的復興 1978 年之後





第九章

地下修院（1980 - 2011）

9.1 开办地下修院

1978年12月，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非官方或称地下修院或称「静默修院」的团体率先开门招生。

静默修院的成立早于公开修院。由于静默修院的隐秘性，外间对它的具体情况所知甚少。然而，肯定它们与两位重要的教会领袖人物有关，就是河北省保定教区的范学淹主教（1907 - 1992）及陕西省凤翔教区的周维道主教（1905 - 1983）... ..（范主教）至1979年才获释，获释后，他自动按情况需要而培育神职人员，祝圣神父，甚至祝圣主教...¹³⁹

在20世纪80年代，培训新一代神职人员的势头逐渐涌现。这种势头在中国北部更为显著，因为那里有大量的天主教人口。起初，神职人员的候选人，既有从劳改营回来的前修生，也有愿意成为神父的新年轻人，他们都和教他们一些神

¹³⁹ 参阅 汤汉：“大陆修院的近况与前瞻”，（“Seminary Formation in China Today and Prospects for the Future”）载于鼎/Tripod，59, 1990，第7-12页。

學和牧灵經驗的老神父們住在一起。後來，他們找到一位主教，便把他們祝聖為神父。不久之後，特別是在有着悠久天主教傳統的地區，如河北、福建、山西和陝西，當地的主教們花了很大的努力，來開辦他們自己的修道院。這包括大修院和小修院的課程，以及各修院的課程。

在未經民政和宗教事務局批准的情況下，這些修院隨時都有被關閉的危險。起初，由於缺少教師和教材，他們往往沒有固定的地點，也沒有固定的課程。後來，教師和教材都有所改善，但地點仍然不穩定。培訓的時間從2年到6年不等。

他們很快也開始把修生送往國外，主要是去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國，後來又去了菲律賓和美國。

1988年9月3日，教廷的萬民福音傳播部（傳信部）發布了“教廷關於中國大陸教會若干問題的指導”文件，處理與范學淹主教有關的地下教會起草的“13條”的問題。羅馬的指示（通常稱為“8條”），除其他事項外，涉及到官方教會所舉行聖事的有效性，並允許在必要時，可派遣修生到公開修院接受培訓。該指示還鼓勵一些無法開設自己修院的教區，將修生送到公開修院。

9.2 直到 2011 年，地下修院的發展情況

對神父候選人的個別培訓，包括對仍在監獄和勞改營中服刑的神父候選人的陶成或甚至祝聖。由於當時政府相對自由的政策，以及神職人員隊伍的恢復，神職人員陶成工作在許多地方都有了較大的發展。主教們便把可能的候選者聚集在一個共同的地方，通常在一個天主教村莊的住宅里。利用老神父們的記憶和一些手抄的舊書，老神父們開始教導年輕人，為他們成為神父做準備。除了20世紀50年代修院畢業生（他們仍保守著自己的聖召），還有其他的年輕人也紛紛前來，尤其是在教會嚴重缺乏人手的情況下，他們都希望獻身為教會服務。雖然神父的陶成和學習計劃等許多方面的條件都相當不足，但這些候選人的信心和承諾是相當堅強的。在周維道主教（Anthony Zhou, 1905–1983）與李鏡峰主教（Lucas Ly, 1924–，在1980年3月被祝聖為主教）的推動下，陝西成立了第一個非官方的修道院。范學淹主教（Joseph Fan, 1907–1992）和他出獄後祝聖的幾位新主教，為河北省地下修院的神職人員陶成提供了同樣的動力。這些舉措主要發生在河北的易縣、保定和正定。

在陝西鳳翔教區，教區的和方濟各會的修院都已開辦了。由於方濟各會的傳統仍然很強大，而且也得到了國外會士兄弟們的幫助，他們歡迎中國學生來美國學習，這便使方濟各會的神職陶成計劃得以發展。於是，鄰近的其它教區，尤其是周至和三元的強大的地下教會社區，也紛紛效仿。

20世紀80年代初，在周善夫主教（？–1989）的倡議下，並在劉書和主教（1922–1993）和劉冠東主教（1919–2013）的幫助下，河北義縣教區先後開辦了聖方濟各沙勿略修院和小修院。很快，他們開始將一些修生送往國外，主要是去歐

洲。為了方便和安全起見，修道院的地点辗转迁移华北各地。這些修生最初來自當地教區。但很快，修院也開始招收鄰近地區的修生。

在河北，正定教區于 1985 年左右開辦了“善牧大修院”，平均約保持有 50 位修生，他們來自不同的地區，但主要來自本地教區。在他們學業結束時，要么由正定教區主教賈治國（1934 - ）祝聖他們為神父，要么他們回到自己的教區接受祝聖。他們先作為執事，已做了一兩年的牧靈羊工作。從 2007 年開始，一些外籍教師也幫助來他們。

在 2010 - 2011 年，該修院的大修生的人數減少到 15 位。他們來自本教區，來自一個非常嚴格的，被稱作“祈禱和補贖社區”。三位培訓教師都有外國學位。教區至少還有另外七位神父在國外獲得了教學資格，他們都參與了牧靈工作。

在河北省保定市，范學淹主教于 1987 年建立了地下修院。後來，史純潔主教（1920 - 1991）、陳建章主教（1920 - 1994）和蘇哲民主教（1932 - ）先後負責修院的管理工作。後由蘇哲民主教為紀念兩位殉道的前任范主教和史主教，在 1995 年將大修院命名為“保定學淹神哲學院”，將小修院命名為“純潔小修院”。

修生來自河北、內蒙古、黑龍江、甘肅、四川、安徽（蚌埠教區）、浙江（溫州教區）、河南（南陽、開封教區），江西（余江教區）、遼寧（熱河），天津（從 2000 起），等地。在比較開放的最後一年 95 年，大小修院人數達到頂峰近 120 人。

有系統的課程逐漸形成。修生們的學習分成四個階段，一共需要大約 8 - 9 年的時間。第一年是一個識別和調整的時期（靈修基礎培養及聖召分辨）。接下來的 3 年學習哲學和聖經，和 3 - 4 年的時間學習信理神學，倫理神學和聖教法典和禮儀神學、牧靈、教會社會訓導等。在被祝聖為神父前的最後一年，是牧靈實踐的時期。修生的課程還包括中國語言和文化。課本來自香港和台灣，也來自互聯網網站和老師們的個人筆記。為了安全起見，修道院的地点不固定在一處，通常會搬遷到若干地点。

修道院每年的經費在 10 萬元到 12 萬元（人民幣）之間，由本地和外部給予奉獻。在院長的領導下，修院的管理是相當自治的，當地教會不大涉入其中。

2001 年 12 月，來自四個教區的九位修生畢業，被祝聖為神父。

2003 年，該神學院有來自 10 個教區的 80 位修生。五位培訓老師負責監督和指導。2007 年，修院有 70 位修生，但在 2009 年，這個數字減少到 40 位。教職工由 12 位教授組成。國外的老師也幫助了他們。安樹新主教（1949 - ）加入了天主教愛國會，成了官方教會的主教之後，地下神職人員的候選人就拒絕接受他的祝聖。

在 2010 - 2011 學年，修生人數為 36 位，其中約 10 位參加了備修課程。哲學課程為兩年，有兩位教師和 12 位修生。修院氣氛很好，教授們都很投入。但是，學神學課程的修生人數減少，使人感到憂慮：4 位修生學習信理神學，10 位修生

學習倫理神學，他們主要來自北京，也有的修生來自河北的其它教區，甚至個人來自溫州。根據一份機密報告報導說：

對於保定修院的修生來說，他們教區的混亂局面讓事情變得複雜：他們中的一些人期望被祝聖，已經等了三、四年了！他們住在另一個住處，忙於學習大學里的一些課程，但他們似乎浪費了很多時間... 他們中的一些人已經灰心喪氣，回到了世俗生活。有一些神父曾在國外學習，但他們似乎不願意參與修院的組織和教學工作，甚至不肯為修生開設短期課程。

宣化教區也在河北，從 92 年開始派修生到保定，一小部分送到了易縣修院。2005 年有 9 位備修生。但自從他們的管的神父被關進監獄（2008 年至 2013 年 2 月）後，修生們就各奔他鄉了：一些人加入了公團的河北修院，另一些人則出國留學了。

河北的其它教區有強大的地下教會團體，也很快開始將修生派往國外，以便為他們的修院培養合格的教師。邯鄲 / 永年的地下教會社區開始執行這項政策，因此，它的聖若瑟修院後來得以配備合格的教師。2007 年，它有 4 位大修生和 13 位小修生。邢台教區的地下修院也採用了同樣的做法。

在內蒙古，呼和浩特市郊區開設了一所地下修院，修生人數很少，還有一組修女加入該修院的學習。修院的院長一人幾乎教授所有的課程，但自 2007 年以來，一些外國神父一直在幫助他。學校的學術水平很低，但修女們比修生們更勤奮，對學習更感興趣，但修院可用的教科書並不多。

1988 年至 2000 年，福州的地下修院培訓著約 80 位修生，其中 65 位來自福州，其餘來自福建的其它教區。修道院分為三個班級，每班 20 至 25 位修生。第一班學預備課程，第二班學哲學課，第三班學神學課。預備課程有靈修、教義問答和高中的課程，包括中國古代和現代文學課程。

在福建省，閩東 / 福寧教區於 1980 年重新開辦文藻修院。在這大學的四年里，學生們必須學習當代哲學課程。只有在此大學畢業後，他們才正式被視為修生，並可在修院繼續攻讀神學。

在江西，余江教區於本世紀初開辦了一所修院，有十幾位修學生。由於該省的天主教會的強烈反對，該修院就遷往鄰近的福建省。修院的三位老師陪同修生們一同搬到那里。然而，這所修院後來關閉了。

在黑龍江，魏景儀主教（1958 - ）於 20 世紀中期在齊齊哈爾開辦了一所大修院。2006-2007 年，學校有 20 位修生，3 位教師曾在國外留學。2008-2009 年，該修院有 10 位修生，3 位在國外學習，7 位在本地學習。為了幫助這三位老師的教學，有時還會從國外邀請一些教授來此工作。然而，修院最大的問題是聖召明顯減少。事實上，在 2010 年，他們只有 2-3 位修生，遂被派往國外學習。

在河南，一所修院為河南省的地下教會社區（即：鄭州、洛陽、開封、新鄉、

大明和濮阳) 服务了數年。該修院當時有修生 15 位左右，由张维柱主教(1958 -) 管理。他还祝聖了几位新神父。陶成的情况不佳。到 2011 年，由于缺乏修生，該修院就关闭了。

2005 年前後，在內蒙古乌海，一个天主教家庭提供了一个处所，在此开办了一所特殊的修院，7 - 8 位修生在那里學習法语和隱修院灵修學。最初的計劃是在中國建立一种默观修會。但不幸的是，由于中國當局的控制，該計劃最終被放弃。後來一些候选人被派往法國繼續他們的陶成，一小部分送到了易县修院。

其它教區也开办了自己的地下修院：天津在 1996 年开办了一个，吉林四平修院在 2010 年已招收了 9 位修生。

第十章

公開修院

10.1 中國公開修院的建立 (1980 - 1992)

1979 年 2 月在昆明召開的全國宗教工作會議，制定了恢復宗教活動五年規劃。它不僅有利于宗教特質的恢復進程，而且还發起了愛國會的改組。1979 年 5 月 22 日，天主教愛國會決定重新開辦修道院。1980 年，天主教愛國會第三次會議決定建立一所全國性的大修院，“以培養優秀的神父和神哲學家”。

兩年後，1982 年，國務院發布“關於設立宗教研究機構的通知”第 60 (82) 号文件，批准了宗教事務局關於設立宗教教育機構的建議。後來，完成了立法程序。1998 年頒布了“聘請外籍教師規範”，2007 年頒布了“設立宗教研究機構規範”。

公開修院開幕

由于對年青神職人員的需要，北京教區開始招募修生。1981 年，它在北京郊外開辦了教區修院，有九排低矮的房屋，建在中國基督教(新教)理事會的果園里。該修院最初只有 6 位修生，他們于 1983 年接受了剪髮禮 (tonsure)，這是 20 年來首次施行剪髮禮。1989 年，該修院搬到了北京北堂後面的一處地方。1992 年 9 月，修院再次遷往北京東北部的平房區繼續運作。平均每年有 30- 40 位修

生。

1982年10月11日，華東地區第一所地區大修院——佘山修院在上海正式成立。它的服務對象是上海教區，以及江蘇、浙江、安徽、山東、福建和江西等六省的教區。¹⁴⁰

大修院院址使用的是一个昔日年老神父們的住所，開始時有 31 位修生，1984 年增加到 96 位。1985 年 5 月，上海主教张家树 (1893 - 1988) 主持了位于畚山西南部的這所新建築的奠基儀式。大修院及其現代化建築群于 1986 年 9 月落成。它有一个很好的图书馆，大约有 20 萬本书，大部分是由美國耶穌會的學院和大學捐贈的。1988 年，理事會決定，每個省都應該關心修生們人文學科的素養。因此，江蘇于 1989 年 9 月在蘇州開辦了一所備修院，有 14 位修生，該地區其它的省份也紛紛採用了同樣的做法。

1983年3月，沈陽修院開辦，它緊挨着沈陽大教堂。修生們來自東北三省（遼寧、黑龍江和吉林）。在起初，該修院提供了四年的課程。1987年，首批畢業生 41 位，其中 24 位被這聖為神父。第二批有 25 位修生，于 1990 年畢業，其中 21 位被祝聖為神父。1990 年，該修院將課程由四年制改為六年制。

1983年9月，中國最高的神學教育機構——中國神哲學院在前北京輔仁大學司鐸書院開辦，學制 6 年。修院的院長為湖北省蒲圻的涂世華主教（1919 - 2017）。1989 年，新院址的建築工程開始，這座位於北京西北部海澱區的建築于 1992 年 5 月舉行了落成典禮。涂世華主教仍然是院長。修院共有 62 位修生，來自全國 14 个省。

1983年10月18日，由漢口董光清主教（1917 - 2007）任校長的中南神哲學院在武昌開課。該修院招收廣東、廣西、湖南、湖北、河南五省的修生。學制五年。1991 年，18 位畢業生被祝聖為神父。

1984年3月15日，中國西南地區大修院¹⁴¹在剛復修的主教座堂附近的成都主教府開辦。有 34 位修生。它服務於重慶市和中國西南三省（即：雲南、貴州和四川）。開始時，學制 5 年，在 1996 年改為 6 年。1989 年，該修院開除了所有的修生，原因是“缺乏紀律性”。1991 年恢復上課。

河北修院于 1984 年 12 月在石家莊市教會大院開辦。計劃為河北省的十個教區服務，學制為期四年（1999 年起，增至六年）。1989 年遷入正定附近的前熙篤會（苦修會）會院。1985 年 6 月，內蒙古修院在呼和浩特大教堂旁，開辦了為期四年的“更新的神哲學課程”。1989 年，有 14 位新神父被祝聖。1990 年該修院更名為內蒙古天主教神哲學院，學制 6 年。

¹⁴⁰ 1986 年 9 月，在它的新建築和教堂進行了祝福禮。

¹⁴¹ 2006 年，彭州市白鹿區以前的天使報喜修道院被列為國家遺產，但不幸的是，2008 年汶川大地震時，這座百年建築，在它百年大慶的前一周，完全倒塌了。政府計劃要根據它的原始面貌來重建。

1985年9月，西安修院在西安市聖方濟各堂的地址开始上課。西安教區主教姬怀让(1909 - 1987)是該修院的负责人，修院有來自該省各教區的30位修生。後來，李篤安主教(1927 - 2006)成為修院院長。1991年5月，該市北堂的新建築物落成，大修院迁到當地。隨後，國家宗教事務局正式批准了該修院，並將其定為一所地區修院，接受來自陝西、甘肅、青海、新疆，和宁夏等的修生們。

1985年3月28日，山西省孟高維諾修院在太原市的圪撩沟正式开办，面向山西省各教區修生。開始時，該修院有45位修生，而且多年來一直保持着每年平均都有這個數目的修生。

1987年，吉林修院成立，面向吉林省的修生。它于1987年11月10日在長春市教堂的地址開學，開始時有14位修生，其中7位是从沈阳修院召回到吉林的。1989年2月26日，首批三位神父被祝聖。1990年，這所修院迁至吉林市教區的路德聖母朝聖地，那時共有15位修生。

1988年12月，山東省濟南市聖神修院开始培养山東省的修生。

與此同時，1986年，中國天主教主教大會正式成立了全國性的修院教育委員會。其目的是統一和集中管理修院的陶成工作。上海著名主教金魯賢(1916 - 2013)是該委員會首任主席。沈斌主教(1970 -)于2010年接替金主教職務。然而，到目前為止，該委員會似乎只參與頒布條例的工作。

10.2 1992年對公開修院的評估

到1992年，官方天主教會开办了12所大修院：即，位于北京的中國神哲學院；五个地區的修院：沈阳、佘山(上海)、武昌、西安、成都等地區修院；五个省級修院：石家庄、呼和浩特、太原、吉林、濟南，以及北京教區修院。到1992年，這些大修院的315位毕业生已被祝聖為神父。

每个修院都有一个董事會，负责修院的管理工作。他們有义务执行黨和國家的宗教政策。教區的天主教愛國會的高级领导人，和修院的工作人員都是董事會成員。當地的主教要么成為董事會主席，要么成為修院名义上的院長。修院的實際工作则由副院長或常务董事负责，他們通常是本地的神父，受到主法院長和當地宗教事務局官員們的信任。

1992年9月19日，宗教事務局政法部發布的“中國大陸關於宗教院校辦學情況的調查報告”，這個文件在社會上廣為流傳。¹⁴²

¹⁴² 參閱林瑞琪，*半世紀徘徊* (“The Attitude of Authority towards Seminaries” in *Decades of Vacillation*) (香港聖神研究中心，1997) 第107 - 125頁。

這份正式報告提到當時修道院存在的五個問題：

首先，宗教院校領導體制存在的問題：…… 一是本身執行教學和管理任務的院務委員會理子不健全；…… 二是全國和省級宗教團體對院校教育的管理體制不健全；

第二：宗教課教師隊伍量少質弱，難以完成教學任務。教學體系不合理，也不統一。教學質量差，方法陳舊，只要求修生死記硬背。

第三：教師短缺的另一個原因是他們的工資太低。四位在四川修道院生活和教學的年青神父因薪酬低而離職。與此同時，四位來自中南部修道院的年青神父申請離開，他們也表示，他們需要改善生計。¹⁴³

修院教育沒有達到政治與精神陶成的雙重目的。由於缺乏教材和很差的教學方法，政治課收效甚微。相當多的修生，自從他們懷着不正確的動機進入修院後，就不重視在宗教課程中學到東西。因此，他們的信仰很薄弱，靈修生活淺薄。

缺乏資金阻礙了修道院的活動。宗教院校辦桌經費來源是：全國性宗教院校由其所隸屬的宗教團體在事業經費中列支，由中央財政撥給。國務院批准開辦的地方性宗教院校，原則上由各地宗教團體自籌。不足部份按當年在校實有學員人數，由中央財政給予適當補助。

1984年確定的全國修院經費標準是，每人每年1300元人民幣。然而，補貼的金額並沒有跟上成本增加的速度。

綜上所述，這份報告顯示，中國政府雖然為宗教留出了一定的空間，但在這一空間內，它要求宗教必須採取明確的政治立場。政治立場包括接受“四項基本原則”，其中包括承認和接受共產黨對修院的領導…¹⁴⁴

在20世紀80年代，天主教修院的輟學率估計在30%左右。

10.3 1993年至2010年公開修院的發展

關於北京的中國神哲學院，2006年9月28日，政府提供了超過7300萬元人民幣（920萬美元）的資金，幫助建設新的中國神哲學院，它位於北京南部，占地4.8公頃。新建成的建築群由10棟樓組成，包括教室、演講廳、圖書館、教堂和宿舍。它自稱是亞洲最現代化、最好的天主教修道院。

2005年9月，山東省濟南市聖神修院的修生們併入到中國神哲學院，濟南的修

¹⁴³ 參閱同上，第58頁。

¹⁴⁴ 參閱同上，第67頁。

院关闭了。2006年9月，內蒙古修院的修生們也發生了同樣的事情。事實上，中國神哲學院2008年3月的報告告訴我們：

2002級最初有來自原山東聖神修院12位修生，內蒙古呼和浩特修院8位修生。來自山東的12位修生于2000年開始陶成培訓；然後，2005年9月轉入中國神哲學院繼續學習神學。來自山東的12位修生中，有9位最終完成了四年的神學課程，並取得了優異的成績。來自內蒙古的8位修生，1997年進入呼和浩特修院開始陶成培訓，2006年9月進入中國神哲學院神學班第二年的學習。內蒙古的8位修生中，有6位完成了神學教育。

2009年，中國神哲學院有60位修生在學，並有20位修生在做牧靈實習工作，教師有14位。

1983年至2006年，中國神哲學院共招收了419位修生，前後共分成10個班。其中240多位修生被祝聖為神父。教學人員中包括大約二十位中、外教授。

北京教區修院于2001年8月再次遷址，由於他們的宿舍樓已成為敬老院，修院遷至北京北郊的海淀區，即目前的院址。到2009年，它已經培訓出100多位神父，那一年它有22位修生。

與此同時，由於該修院也開始接受天津和其它教區的修生，因此它被正式指定是一所地區性的大修院。2002年7月，沈陽修院搬遷到現在的地址，位於繁華街道的現代化高層建築內，更加舒適，設施也更加完善。

這些修生平均每年約有50位，來自多個教區。然而，現在修生的數目正在逐漸減少。到2009年，該修院已經在9個畢業班的239位畢業生中，祝聖了136位神父。

從1997年起，國外留學的神父開始回國任教，提高了教學水平。教授人數約12位，國外客座教授也開設短期課程。1997年，河北修院遷至石家莊北郊雄偉的新校舍。1999年，它將學制從4年改為6年。2009年，該修院有151位修生和15位教師。

1995年，陝西地區的大修院遷至西安市南郊的原來校舍。到2009年，它已經接收了476位修生，其中219位被祝聖位神父。那一年，該修院有39位修生，教師人數有20多位。

2000年5月25日，山西孟高維諾修院遷往下莊新址。2001年4月19日，對它的聖心教堂施行了祝福禮。2009年，該修院有74位修生和15位教授。

1994年4月，四川修院的修生們組織了一次罷工，反對省宗教事務局干預修院的管理工作。省宗教局任命了他們的一名官員為該修院的副院長，替換萬州的副主教徐之玄（1916 - 2008）。由於這是共產政權下的首次此類事件，中國媒體對此進行了廣泛報道。該修院是中國所有修院中設備最簡陋、資金最不足的一個。

這就是為什麼它只提供一個不合格的四年學制，而不是一個大修院標準的六年學制。

1996年，該修院遷至成都市郫縣新址，將教育體制延長至6年。2005年，它又搬到了同一地區的，**現在所在的紅光鎮**。2009年6月，該修院慶祝成立25周年。那時，由7位神父和12位兼職教師指導着25位哲學生和28位神學生。

1984年至2010年，該修院共培養了8個班的修生，畢業生237位，其中有100位被祝聖位神父。上海佘山修院繼續享有良好的聲譽。到2009年，它已經培養出大約300位神父。那一年，佘山修院共有78位修生和15位教授。吉林修院平均每年都有15位修生。2009年，在十多位教授的指導下，修生的人數增至19位。

第十一章

修院現狀（2011年至2015）

11.1 地下修院

2011 - 2012年，易縣教區地下教會社區開辦了一所小修院和一所大修院。後者有12位修生和5位教授。另有七位修生在國外學習。

同時，有人提議修改正在施行的陶成計劃和修院的管理工作，並提出改變福傳的方法，更重視文化和知識領域。2013年9月，該修院共有9位修生，其中4位來自本教區，另有7位修生在國外學習。

2012年，正定修院有22位修生，來自不同地區。有12位修生讀神學已第二年，10位修生讀哲學已第二年。八位教授在指導學生，四位教神學，四位教哲學。由於從國外留學歸來的新教授，哲學課的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教授的團隊工作得很好（包括靈修指導），並得到修生們的一致好評。

至於這兩所修院的院址，政府當局近年來並沒有過多干預，因此修生們的住所相當穩定。

2011年9月，保定修院有修生36位。2011年12月11日，該修院發生了一起可怕的悲劇。修道院一位教授及六位修生在一次交通事故中喪生，另一位修生受重傷。這一悲劇不僅造成了巨大悲痛，而且給喪親家庭的生活造成沉重的負擔，他們與當地民政當局的交涉也遇到重大困難。這特別涉及到傷者住院，死者

安葬，以及對受難家屬的財政補貼等問題。這種困難的形勢一直持續了很長時間。

2012年，該修院約有30位修生，其中12位來自保定教區。2012年6月，約有15位修生畢業，被祝聖位神父，其中8位是剛剛完成學業，其他人則一直在等待被祝聖。因為他們都拒絕接受（已參加天主教愛國會的）安樹新主教的祝聖。2013年，有8位修生成功地請另一位主教把他們祝聖位神父。與此同時，保定修院有四位修生在法國學習，兩位在西班牙，兩位在意大利。

在新的2013 - 2014學年，大修院共有16位修生，其中8位攻讀哲學，4位學倫理神學，4位學信理神學，另有少數修生在備修院學習。

2010 - 2011學年期間，在內蒙古的呼和浩特，另一位剛從國外留學歸來的神父加入了該修院教職工的行列。11位修生和6位修女在此上課。然而，總體來說，這裏的學術水平還相當低。

不幸的是，2012年1月30日，公安局拘留了在該修院工作的兩位神父，而且修生們則被遣送回家，導致該修院在2011年2月14日關閉。

2012年，鳳翔教區修院有12位修生和7位教師。方濟各會的會士們為自己的會士管理着另一所修院，他們大約有10位修生。

2012年，福建省福州市地下修院約有10位修生。院長和一些兼職教授照顧着他們。大約15位修生已經完成學業，正在等待被祝聖神職。2011年，閩東修院共有14位修生，其中2位學神學，12位學哲學。在哈爾濱，一所大修院於2013年春天開辦，有12位修生。他們參加了聖保祿神哲學院的學習課程，這所神哲學院剛開始運作，大約有30位修生參加了為期兩年的課程。後來，一些修生出國深造。2014年，齊齊哈爾教區重新開辦了修道院，有6位修生。該修道院的修生們在一所大學學習漢語、文學和文化。四位老師負責他們的靈修和神學陶成。

11.2 對地下修院的評估

****人數減少:** 1996年，地下的大修院修生人數約為700位，1998年為800位。這些數字一直維持到2006年。2007年，這個數字開始下降到400位，2008年下降到350位，2010年下降到300位，2012 - 2013年下降到150位左右，現在是130位修生。

**** 神父聖召及其陶成問題受中國整個社會環境的影響，社會環境有以下特點：**人口老齡化，社會的城市化（從一個農業社會轉化為城市社會），長期的一胎化生育政策，獨生子在家庭中肩負的重擔，在文化大革命之後，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和倫理價值在教育系統的喪失，消費主義和唯物主義蔓延的趨勢，以及年輕一代的脆弱和被溺愛，等等。此外，中國的官方控制比以前更加嚴格，當局正在升

級他們的安全人員隊伍，以使其對教會的控制更加有效。

** 修生們通常來自農村和未受過教育的家庭，甚至在其家庭內都經歷過不公正的對待，因此，他們有情感的障礙，對性的問題有錯誤的理解，不能以成熟的态度接近異性，缺乏一個教育環境，且受到社會意識形態和輿論的壓力，等等。在中國，修生們的陶成工作確實比在其它國家要困難得多。

** 有些教區仍在培訓他們自己的小修生，但修生的人數有限。修院為他們提供了良好的環境，來彌補他們家庭的教育背景所欠缺的。這些青少年在沒有接觸社會之前，年幼時就進入了修院，因此，修院特別注意培養他們人格的成熟。然而，他們通常沒有得到太多的幫助，以正確地辨別自己是否度神父獨身生活的聖召。

** 目前，有各種紀律規則，但卻缺乏對修生們如何修練內在和精神自由的教育。¹⁴⁵ 修生們受到的教導，不是如何自律，而是只需遵守規則，關注自己的面子，沒有任何個性化和內在價值觀的教育。由於缺乏訓練有素的老師或培訓者，修院似乎缺乏一套完整的陶成計劃。

** 進入大修院的修生多為初中或高中畢業生；他們中很少有人受過高等教育（這種情況大概都是 2010 年以前的）。一般說來，他們都是品行良好的青年，但是，在開始時，他們需要得到堅實的宗教和文化知識的教育。他們很單純，但信仰堅定和勇敢。由於沒有政府的控制，宗教教學是自由的。修生們的神學和法典陶成似乎很好，但哲學和靈修陶成尚需改進。

在修生們畢業後，被祝聖為神父之前，通常會給予他們一個機會，讓他們參加牧靈工作，取得一些經驗。但是，關於接受聖職的問題，可能發生的情況是，神職人員候選人幾乎同時被祝聖為執事和神父，舉行兩個儀式之間只有一天或兩天的時間。因此，他們幾乎沒有從事執事服務的實際經驗。

11.3 公開大修院的活動

2011 年 9 月初，在沈陽召開了全國五大宗教培養機構的工作會議，對五大宗教的陶成工作進行了總體評價，並提出了今後工作的總方針。

與天主教會更直接有關的緊急需要，特強調如下：

1. 加強對這些機構的承諾，通過招收更多的修生，因為目前修生的數量不足以為教會提供服務（目前全國只有 3000 位神職人員為全國 6000 個天主教教堂服務，全國只有 9 所大修院，每年只培養 120 位神職人員候選人...）；

¹⁴⁵ 在保定修院，每年有固定的國外或歸來的人在修生的人性成熟和靈性生活方面給與指導。只重視規矩的年代差不多是在 95 年以前。

2. 提高教师队伍的素質，因為普通群众和信徒的教育水平提高，他們的素質就有望提高。
3. 要培训聖召陶成工作的专家、學術研究专家、社會服务专家、對外关系专家(外语水平好)。
4. 要在傳統文化的价值、科學知识、和社會主义觉悟等基础上，促进智力和聖召陶成工作，並使各宗教適應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义，以及防范外國勢力的滲透。

這內部的文件也強調：我們特別需要注意外國實體，利用宗教滲透來影響信徒和宗教事業的嚴重現象。一些國家和地區的人士利用非法渠道進入我國，招募我們的學生並將他們送往國外，吸引他們離開我國，並雇用他們在他們的機構中工作。一些外國勢力在我國神學院和聖經學校內秘密活動，即建立秘密的宗教組織，非法培養宗教工作者。一些宗教組織在互聯網上開設了遠程修道院，開設了宗教教學和宗教陶成的課程。一些外國宗教組織在中國大陸以及鄰近地區，如：台灣、香港、澳門等地區組織宗教活動，幫助有關人員非法出境。我們要做好宗教陶成機構的管理工作，這對防止外來勢力以宗教的名義滲透，以及贏得未來宗教事業的接班人，具有重要的價值和作用。

宗教陶成機構的主要目標需反復強調的是，要培養這樣一批宗教工作者，他們熱烈愛國家，接受黨和政府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維護國家統一，能團結少數民族，並熟悉自己宗教的知識，致力於教會事業，善於與廣大信教群眾保持密切聯繫。

這就是為什麼在 2011 年 6 月，所有的大修院都要載歌載舞，慶祝共產黨建黨 90 周年，這些慶祝活動甚至在教堂里舉行。

2009 年 11 月 26 日，中國主教團的領袖們與天主教愛國會，召開了聯席會議，並於 2009 年 12 月 28 日，討論和建議，並頒布了“中國天主教神職人員身份鑑定標準”：

第三條：天主教神職人員（神父和一切聖職人員）應當具備下列基本條件：

- a) 熱愛祖國，擁護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遵守憲法和法律，維護國家統一。*
- b) 有堅定、正統的信仰，堅信以伯多祿為首的至一、至聖、至公和從宗徒傳下來的教會，堅信教義的統一和正統性。*
- c) 立志將一生奉獻給教會，獻身於福傳和牧靈事工，過貞潔、貧窮、聽命的生活，品行端正。*
- d) 堅持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原則，本着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引導廣大信眾，走愛國、愛教的道路，為光榮天主，為全人類的福祉服務。*

特別是對神父和執事：

第 6 条：神父及執事除符合本准则第三条规定之外，還應具备下列资格：

- a) 要在一所大修院里以优异成绩完成了所有哲學、神學和灵修方面的課程。*
- b) 神父的候选人應至少要年滿 25 歲，執事年滿 23 歲。但因教會牧灵的需要，經教區主教或领导的同意，上述候选人的年齡可放低，但不得超過一歲。*
- c) 執事在被祝聖為神父之前，必须先从事一段時間的牧灵活動。*

因此看來，修院的修生陶成工作必須以達到上述所有資格為目標。與此同時，政府當局正在盡一切努力強使所有的神職人員，包括官方和地下的，必須公開登記為神職人員，並領取神父身份證。當局也關心向修院已完成培養計劃的修生們授予學位。2013 年 7 月 30 日至 8 月 2 日，中國天主教主教團聖召培育委員會在遼寧沈陽召開會議，與會的有天主教的領導人、國家宗教事務局的成員，以及各大修院的代表。他們討論了兩項准則，即：確定天主教大修院教師資格的准則和天主教大修院獲得學位的准則 及其實施細則。

因此，2015 年 6 月 29 日，在天主教中國神哲學院學年結束典禮上，有 28 位畢業生第一次獲得了政府認可的，正式的碩士學位。其它的大修院亦於學年結束時，給畢業生們頒發了碩士學位證書：河北修院 16 位、中南神哲學院 8 位、沈陽修院 15 位、陝西修院 9 位，及北京教區修院 3 位。獲得學位的總人數為 79 位。

大修院

中國神哲學院

2011 年 9 月，該校招收了 20 位新生，使修道生的總數達到 82 位。入學後，新生們按照本篤會隱修生活的榜樣，接受為期一年的靈修生活訓練。2012 - 2013 年，學生人數增加到 95 位，其中 13 位是新生。該修院於 2013 年 10 月 25 日慶祝成立 30 周年。在新學年，學生人數增加到 116 位，在增加的 31 位新生是從其它修院轉來的學生。

馬英林主教（1965 - ）任院長。但組建了一個新的教師團隊。官方仍然控制着。2015 年 9 月，楊曉亭主教（1964 - ）任新常務院長。修生有一百位，外加四位新生。

中國天主教神哲學院繼續為神職人員進行陶成課程計劃（這是一年和一個夏天

的課程計劃)。該計劃旨在應對教會所面臨的社會挑戰，以及滿足教區神父們的需要：1) 了解神學發展的新動態；2) 根據中國的現狀，開始採取步驟，進行神學概念的融入；3) 從精神和文化方面發現和認識基督教，這對構建和諧社會非常有益。修道院還開設了宗教藝術課程。

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的河北修院

截至 2011 年，該修道院共培養了 14 個班的修生，畢業生多達 472 位。在這些畢業生中，有 427 人被祝聖為神父。

2010 年冬天發生了一件嚴重且重大的事件。11 月 11 日，省民族宗教事務委員會辦公室，宣布將該委員會中的一名政府官員任命為該修院的副院長。這引起了這所大修院全體師生的強烈反對，他們便要求見董事會所有成員。可是，後者却不予接見。11 月 15 日，修生們開始罷課，要求該委員會收回成命。11 月 17 日，該委員會副主任到修院來了，承諾不會有任何實際的改變。然而，所有修生們都參加了省民族宗教事務委辦公室外的遊行示威活動。連續 18 天，他們都一直在阻止這項任命，表達了對政治干預的憂慮。大多數修生身穿白色或黑色的長袍，舉着橫幅和標語牌，重申要求省民族宗教事務委員會“就撤銷任命官員為修院副院長一事，要求發表書面聲明”。在示威期間，該委員會官員曾兩次在其辦公室與修院代表進行討論。但他們唯一未能同意修生們的要求是，即：他們不能以書面聲明撤銷對修院副院長的委任。冒着嚴寒，學生們在政府辦公樓外繼續抗議，周圍是數輛警車和保安人員。修院的學生們一直在抗議，直到 12 月 2 日，政府終於發表書面聲明，撤銷對該官員的任命。於是，在隨後的星期一，修生們回校復課。

2011 年 1 月 12 日至 14 日，即將離任的董事會主席。劉景和主教（1919 - 2013）與董事會新董事們參觀了該修院。全體教職員和修生們都歡迎了他們。劉主教介紹了董事會新任主席方建平主教（1962 - ）和董事會的新董事們。

2010 年 12 月 11 日至 12 日，與石家莊信德文化研究所合作，舉辦了“聖召與陶成”專題研討會。作為研討會的後續活動，2011 年 7 月，為來自中國所有大修院的 150 位修生舉辦了夏令營活動。

在 2011 - 2012 學年，125 位修生在河北修院學習，其中一些修生甚至來自地下教會的社區。因此，該修院成為促進團結的重要場所。2012 年 9 月新學年伊始，該修院共有 133 位修生（6 位新生），2013 年 9 月，這一數字增至 159 位（來自 19 個教區和 5 個修會）。有 24 位新修生，其中包括來自佘山修院的轉校生。修生們被分成三組：神學生 82 位，哲學生 53 位，處於牧靈年實習的 24 位。2015 年 9 月，該修院修生的總數為 124 位，其中新修生 19 位。

該修院有十幾位全職教授，其中大多數擁有外國學位。修院也繼續為來自華北的若干個修女會上級會院的 42 位修女開設神學課程，其中 24 位修女學習四年的課程。河北修院還決定為年輕的畢業生開始一項培訓計劃，為將來能使他們成為修道院的教授做準備。

中國西部的西安修院

2011年4月7日，由“全体修生”签名的一封公开信被寄到董事會的主教們，抱怨該修院的生活和學習条件，以及管理阶层的问题。不久，主教和董事會其他成員访问了該修院。全体教職員、修生們和修女們热烈地欢迎了他們。這几次访问為解释和讨论修院的實際需要、改善生活和學習条件，以及防止天主教愛國會企图完全控制修院的管理提供了可能性。

在2012 - 2013學年，情况相當平靜。修生有52位（包括12位新修生）和12位教授组成了教师队伍，他們都拥有學位。董事會享有更大的控制權。2013年6月，11位修生完成了學业，9月，該神學院迎來了17位新修生。一些新修生來自山西孟高維諾修院。這使修生的總人數增加到58位。2015年9月，新招收了8位修生，那時，修生人數达到54位。

位于附近的一个學習中心，繼續為60位至80位的修女开办培訓課程。

中國西南的成都修院

在過去的几年里，該修院一直在天主教愛國會的強力控制下，气氛相當世俗化。

在2010 - 2011學年，該修院有45位修生。2011年6月15日，有24位修生毕业。2012年9月，修院招收了兩位新修生，該修院修生總數為22位（神學生15位，哲學生的7位）。修院計劃在大院内建造一座教堂，旨在使修院更具有宗教氛围。

該修院也开始為教授教理的人員举办課程，以及為修女們举办為期兩年的神學課程。在2013 - 2014學年，由于該修院的气氛不佳，部分修生转往其他修院就读，致使成都修院的修生人數減至16位，其中14位學神學，2位學哲學預科。一些老师不很合格，一些最好的教师，因為修生短缺而离开此地，转到其他地方。所以該修道院的教育水平下降了。

2014年，14位學神學的修生毕业後，修道院的人數大幅度減少。隨後，成都修院开始了為期兩年的办公室文秘課程，共有12位修生。2015年9月，有36位新修生开始了此課程的第一年學習，另外10位修生参加了第二年該課程的學習。希望他們中的一些人將能成為神職人員的候选人。

山西孟高維諾修院位于太原

2010 - 2011年，該修院有來自20个教區和3个修會的70位修生。許多人對院長处理财政问题的方式和独断的作风表示不满。2011年6月18日，修院董事會，當着主教們的面，罢免了這位院長。霍成主教（1926 - ）接替他的職務，作為代理院長。然而，當地政府宗教事務局官員拒不接受院方的這一决定。

2011年10月底，董事會開會選舉了新的董事長，自從霍主教辭職後。董事會還必須為新院長人選和修院的行政制度問題，找到解決辦法。修院的修生們在11月初返回來，打扫了修道院後又重新上課（由於其他修生已經轉到其它的修院，所以，來上課的修生大約只有30位左右）。截至2012年6月底，該修院約有10位修生完成了他們的學業。

孟高維諾修院目前陷入了僵局。從2012-2013學年伊始，修院共有35位修生，他們與6位已復課的教師一起，開始上課。但是院長的問題仍然沒有得到解決。2013年初，當局正式將該修院關閉了兩年。除了處於最後一年學習的11位修生而外，其他所有的修生都被遣散回家了。與此同時，一個由兩位主教和一位神父組成的小組，受命提出一項改革該修院管理的計劃。夏秋兩季，主要來自太原教區一些修生被召回，進行“革新工作”，其他的修生們則全部轉入其它的修院。在2015年，該修院仍然處於關閉狀態。

北京教區修院

2012-2013學年，該修院共有43位修生，在10位中外教師的指導下學習。2013-2014年，該修院的修生人數增至47位。2015年9月，有修生48位，其中5位在國外深造。

自2010年起，該修院為教區神父開始了為期三年的培訓計劃。

遼寧省沈陽修院

2011-2012學年，有42位修生在校學習，其中9位於6月畢業。2012年至2013年，該道院有48位修生（13位新修生）。2013年6月，有9位畢業生，而這年9月，有4位新修生，使修生總數達到43位。2015年9月，該修道院共有26位修生、9位新修生。教授大約有十位，其中大多數人都有學位，教學水平相當高。

（編者附註：沈陽修院於2019年因收生不足而停辦）

吉林省修院

2012年9月，有25位修生。在2013-2014年，這一數字增加到39位，其中13位是新修生，他們來自9個教區，其中20位來自吉林教區。有教授8位，其中5位曾在國外留學。2015年9月，該修院修生人數為42位。

華東上海佘山修院

院長邢文之主教（Joseph Xing, 1963-）於2011年12月辭職，對該修院的情況造成很大影響。2012年7月，馬達欽主教（Taddheus Ma, 1968-）被祝聖時發生的事件，對佘山修院造成更大的負面影響。2012年6月，有17位修生完成了學業，新學年本來預計將有60位新修生到來。然而，2012年8月21日，

金鲁贤主教宣布：大、小修院的开学日期已被推迟，具体日期尚未公布。2013年9月，上海教区约15位修生和部分教授重返佘山修院，但尚未正式开课。2015年9月，佘山修院仍然处于正式关闭状态，但大约有10多位当地的修生还住在那里。

华中和华南地区的中南神哲学院

2012年2月，随着新院长的任命，以及三位新教授的到来，陶成计划有了改善。然而，修生人数却有所下降：2012年9月有37位，而2013年9月只有28位，其中6位是新修生。2015年9月，该修院修生人数降至19位，由8位教授照管他们。

(编者附注：中南神哲学院于2017年因收生不足而停办)

11.4. 正式的小修院或备修院

许多教区开办了自己的地区小修院或备修院。他们的目的是为神职人员候选人提供基本的人文、学术和灵修方面的知识和素养，然后再把他们选送到大修院去。

公开的小修院数量最多的省份是河北省，当地的大多数教区都开办着小修院，尽管修生的人数正在减少。河北省有大约10所小修院，即：石家庄/正定、景县/衡水（圣若瑟小修院始于1996年）、献县（张庄圣方济各沙勿略小修院）、邢台（边村）、邯郸（圣心修院于1989年开办，现在位于大名）、赵县（修生超过一百位的地區小修院）、威县，以及唐山等。

在华北中部的其它省份，在呼和浩特（内蒙古）、榆次和洪洞（山西）也有小修院。在中国东北，只有吉林有一所小修院。在中国西北部，陕西省天主教会继续在西安和渭南设有小修院，甘肃和新疆的小修院分别设在兰州和乌鲁木齐。

在中国的中部和东部地区，小修院设在济南（山东）、漯河（河南）、¹⁴⁶ 苏州（江苏）、上海、温州（浙江）、福州（福建）和汉口（湖北）。

在中国南方，四川省的成都、南充、西昌、贵州省的贵阳，以及广西省的南宁都设有小修院。

一些备修院在他们自己的场地上，开办了初中和高中，而另一些备修院则把修生送到了公立学校去学习。

¹⁴⁶ 1989年，驻马店教区方济各会神父刘亚敬在漯河开办了一所为期两年的备修院。到1997年，漯河修道院在四届毕业班结束后，已有56位修生进入了大修道院。1997至1999年，第五届班级中，有二十位修生在学习。

11.5. 观察及對未來的展望

根据中國主教团修院教育委員會的正式統計，截至 2000 年 7 月，中國共有 12 所大修院和 24 所小修院在运行中。

至 2014 年為止，中國有 10 所公開的大修院和 20 所小修院。

** 修院聖召陶成的最大问题是，灵修的培养和方向。2007 年，辽宁沈阳教區的裴军民助理主教（1969 -），在他从美國留學回國後说：“我們仍然非常需要努力做好聖召陶成的工作”，他在 2006 年被祝聖為主教之前，作為該修院的副院長、教导主任和教授，他在美國花了十年的時間做研究。他承认：“我們真的没有足够的人手來指导灵修的方向。”“我們可以教授課程，但我們不知道在修院該怎樣對修生們做好聖召陶成的工作。”最近，這種情況已得到改进，但在修生聖召陶成方面仍有很長的路要走。

到目前為止，修院陶成工作似乎主要是，提供基本的宗教知识和實踐训练（似乎神父只是一种職業）。很明显，修院需要修生們进行属灵的修练，並學習灵修神學課程，但他們的属灵的實踐應是多方面的：每日祈祷、領聖體、默想和反省、與老师和同學們分享属灵生活的问题、學習聖人們的灵修生活榜樣、實踐對天主的爱和為他人服务（如：探访病人和老人、教导儿童等）。在課堂上，修生們學習聖經、神修學、信理和伦理神學課程。然而，问题是修生們該如何真正吸收這些課程的內容，改进自己的品格。大多數修生似乎把修院的時光當作是一种經歷，一种課程來學習，而不重视塑造和锤炼他們个人的品性，建立他們自己的灵修生活。

** 因為受民政當局的控制，修道院的氛围有時會相當艱難，當局强调修生們在思想上要成為忠诚的“國家干部”，致使一些修生學習的動機不明。

** 在過去的二十年里，所有的修院都先後邀請了來自國外：从美國、比利時、法國、德國、意大利、菲律賓和韓國等聘請來神學家和教授。但最近，外國教授的數量已經減少，或者，他們只被要求开设短期課程。

** 从 1990 年代早期，中國的教會通過非正式的渠道，派出修生和神父們到國外學習，主要到欧洲（到意大利‘主要通過教廷傳信部’，到法國、比利時、德國、爱尔兰、英國和西班牙），並通過修會的傳教士們和有关機構的幫助，到菲律賓和美國學習。其它國家也欢迎有宗教信仰的中國學生前往那里學習，但這一類的學生人數不多。在台湾，于 2011 年开始，天主教辅仁大學聖博敏（St. Bellarmine）神學院的神學系，為來自大陆的神父、修女及修院院長提供為期三年的學習課程。目前，辅仁神學院每年接受约 100 位學生。据官方消息，到目前為止，在國外學習的教會修生總數約為 500 位。大约有 200 位已取得學位回到中國，他們現在在各修道院任教，或担任教區的领导人。

** 由于聖召數目的減少，地下修院的前景有點暗晦。為了提高存活率，它

們之間迫切需要加強合作。然而，未來這種合作的可能性有幾多尚是未知之數。

公開修院還必須處理以下主要問題：聖召的減少，公開修院合並的趨勢，對優秀教師和管理人員團隊的急切需求，以及這些人員可能會與官方行政當局在修院的指導，及人文和靈修陶成的內容等方面，發生競爭。

聖召減少的趨勢將會繼續下去。原因有幾個：特別是在城市地區，計劃生育和獨生子女政策的推行（最近，政府允許父母生兩個孩子），社會上普遍存在的物質主義問題，以及世俗化和現代享乐的誘惑。此外，教會內部的不確定性和困惑也可能成為年輕人考慮神父聖召的障礙因素，一些修院還存在着各種各樣的問題，以致不能為有效的陶成工作提供堅實的基础。

儘管他們遭到各修院的反對，官方當局的政策仍提倡把修院合並。如前所述，中國神哲學院先後吸收了內蒙古修院（2005年）和濟南修院（2006年）。現在，山西和上海的修院暫時被關閉，人們擔心它們會被永久關閉。成都和武漢的修院的修生人數減少，也引發了人們對這些修院未來的擔憂。

** 自從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各大修院已開始舉辦牧靈學、靈修指導和教會禮儀等課程，對神父和修女進行持續的教育。這是為了幫助已經在教區工作的神父們和修女們，使他們以保持更新。最近，由於修生人數的減少，一些修道院也為教授教理的人員和平信徒領袖們，舉辦相關課程。

** 另一個嚴重的問題是，修生們目前接受的這種陶成的形式。這是一個令人很擔憂的問題，因為他們中有不小比例的人（估計占總數的約 30%）在被祝聖後僅僅幾年，就拋棄了神父的職務。

主要原因已經在其它地方指出。¹⁴⁷ 這些原因大致如下：年青的神父在被祝聖後不久，被派往偏遠教區的鄉村單獨地工作；由於年青神父和年老神父有年齡的代溝，沒有可以更适合他們模仿的榜樣；很快，他們的困難就開始堆積，幻想破滅；經濟壓力和金錢的誘惑也使一些神父去從事另一份工作，他們是出於經濟原因逐漸離開了神父的職務（不清楚這些神父離開神父職務是因為他們覺得自己很窮，還是因為他們控制了太多的錢）；孤獨、疏離感和性欲，人格和靈性的不成熟，缺乏適當的性教育和情感的訓練；在牧靈方法或對服從態度上的差異；主教和神父之間，以及神父與神父之間缺乏應有的信任，以及嫉妒和競爭心，所有這一切不可避免地會造成各種問題和困惑；此外，還要面對一些民事當局給予的誘惑；官方和非官方教會之間的衝突，以及缺乏持續的陶成工作計劃，等等。

對中國所有修院的教師或培養人員而言，無論對公開的還是地下的修院，當他們試圖為修生們提供一個合適的陶成形式時，以上這些原因對他們都會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¹⁴⁷ 參閱 陳開華：“Why do they leave?（他們為什麼要離開？）”，*Sunday Examiner* 2001 年 10 月 14 日。

附錄：

A. 中國籍神父的數字

1848:	135			
1865:	167			
1886:	320			
1900:	470			
1903:	499			
1905:	547			
1910:	638	从 1980s 致 1991: 600 神父們左右回復牧民		
1915:	809	+ 400 新祝聖的神父們		
1918:	834	1992: 1, 106		
1920:	963	1993: 1, 200		
1924:	1, 132	1994: 1, 300		
1925:	1, 203	1996: 1, 000 官方,	950 非官方	
1930:	1, 504	2000: 1, 200	“	1, 000 “
1935:	1, 753	2005: 2, 000	“	1, 100 “
1940:	2, 044	2009: 2, 000	“	1, 180 “
1946:	2, 348	2011: 2, 150	“	1, 250 “
1948:	2, 661	2013: 2, 350	“	1, 300 “
1950:	2, 842	2015: 2, 500	“	1, 300 “

B. 中國籍修生的數字

1913:	總數 1,638
1918:	2,448
1922:	2,939 (大修生 582, 小 1,672, 备 1,672)
1923:	3,022
1926:	4,048 (大修生 763, 小 2,013, 备 1,272)
1932:	大修生 734
1935:	大修生 802
1936:	大修生 843
1937:	大修生 819
1942:	大修生 1,122 (修會員之内)
1945:	大修生 952
1946:	大修生 1,076 (修會員之内), 小 4,143
1947:	大修生 818, 小 2,900
1948:	大修生 780
1949:	總數 4,106, 大修生 908 (修會員之内), 小 1,889, 备 1,311
1950:	總數 3,710, 大修生 723, 小 1,730, 备 1,257

1991: 總數: 800

1993: 大修生: 1,050, 小 450

1996: 官方大修生 1,000, 非官方 700

2000: “ 900, “ 700

2005: “ 640 (大, 550 小), 非官方 450

2010: “ 630 (大, 530 小), “ 300

2013: “ 540 (大, 400 小), “ 150

2015: “ 425 (大, 300 小), “ 150

参考书

- Alexandre BROU, “Not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s origines du clergé indigène en Chine” in *Revue d’Histoire des Missions* (II, 4, Déc. 1926)

- Celso COSTANTINI, Ricerche d’Archivio sull’Istruzione *De Clero Indigena*, emanata dalla S.C. De Propaganda Fide il 23 novembre 1845 (Roma: Edizione di Storia e Letteratura, 1947)

- *Clergé Chinois au Kiang’nan sous les Ta’ Tsing*, Bureau Sinologique de Zi-ka-wei, Shanghai, T’ou-sé-wé, 1933.

- Pasquale D’ELIA, *Catholic Native Episcopacy* (Shanghai, T’usewei Printing Press, 1927)

-
- Robert E. ENTENMANN, “Chinese Catholic Clergy and Catechists in Eighteenth-Century Szechwan,” in *Actes du VI^o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e Sinologie*, Chantilly 1989 (Paris 1995), pp. 389-410
 - Id. “Chinese Catholic Communities in Early Ch’ing Szechwan”, in *Actes du VII^o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e Sinologie*, Chantilly 1992 (Taipei-Paris 1995), pp. 147-161.

 - P. DE MOIDREY, *La Hiérarchie Catholique en Chine, Corée, Japon* (Variétés Sinologiques).

 - Elisa GIUNIPERO, “Propaganda Fide between European Missionaries and Chinese Clergy” 载于 A. GIOVAGNOLI-E. GIUNIPERO (eds), *The Catholic Church and the Chinese World between Colonialism and Evangelization (1840-1911)*, (Rome Urbanian University, 205).

 - Alph HUBRECHT, C.M. “Les origins du Clerge Indigene en Chine” in *Collectanea Commisisonis Synodalis*, 1935, No.4, pp. 8-21.

 - Anthony S.K. LAM, *Decades of Vacillation, Chinese Communist Religious Policy an dIts Implementation* (Hong Kong: Holy Spirit Study Centre, 2003): ch. 6 “Attitude of Authorities towards Seminaries” (pp. 54-68).

 - Gennaro NARDI, *Cinesi a Napoli* (Napoli, Edizioni Dehoniane - PIME, 1976).

 - Arnaud Olichon, *Aux Origines du Clergé Chinois. Le Pretre André Ly, missionnaire au Se-tchoan (1692-1775)* (Paris, 1933)

 - Nicholas STANDAERT (ed.),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Vol. 1, 635-1800* (Leiden: Brill, 2001), “Chinese Clergy”, pp. 462-470.

 - R.G. TIEDEMANN, “The Controversy over the Formation of an Indigenous Clergy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atholic Hierarchy in China, 1846-1926, 载于 R. MALEK-G. CRIVELLER (eds.), *Light a Candle, Encounters and Friendship with China* (Sankt Augustin, Institut Monumenta Serica, 2010), pp. 337-375.

 - John TONG Hon, “Seminary Formation in China Today and Prospects for the Future”, 载于 *Tripod*, 1990, No. 5, 59, pp. 37-46.